

目 錄

時 評

中共召開與東協政黨會議之戰略意圖評析.....	陳鴻瑜	1
教宗首度公開聲援新疆維吾爾人對梵「中」關係之影響.....	劉國興	7
從和平崛起到霸權崛起－從中國大陸對澳洲和印度的外交 報復談起	宋國誠	14
由 2020 年回顧與展望兩岸關係的走向.....	顏建發	21
2020 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評析.....	李志強	28

學術論著

日韓經貿摩擦：以 GSOMIA 為中心的分析	郭永興	35
------------------------------	-----------	----

專 題

Media Warfare: How Taiwan Can Win the Battle for the Cognitive Domain.....	Kerry K. Gershaneck	66
---	---------------------------	----

論 壇

從拉達克到太平洋：印「中」邊境衝突與對「中」包圍網 的形成	廖哲偉	102
--	-----------	-----

※ 展望與探索月刊第 18 卷研究論文索引.....	113
----------------------------	-----

Contents

News Commentary

An Analysis of Strategic Implication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PC and ASEAN Political Parties	<i>Chen, Hurng-Yu</i>1
The Impact of the Pope's Words on Supporting Uyghur to Holy See-China Relations.....	<i>Liu, Kuo-Hsing</i>7
From Peaceful Rise to Hegemonic Rise-China's Diplomatic Retaliation against Australia and India.....	<i>Sung, Kuo-Chen</i>14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2020: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Yan, Jiann-Fa</i>21
Comments on the 2020 CPC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i>Li, Chi-Keung</i>28	

Academic Publications

Japan-South Korea Trade Dispute: An Analysis Centered on GSOMIA.....	<i>Guo, Yung-Hsing</i>35
---	--------------------------------

Monograph

Media Warfare: How Taiwan Can Win the Battle for the Cognitive Domainnn.....	<i>Kerry K. Gershaneck</i>66
---	-----------------------------------

Forum

From Ladakh to Pacific: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ncirclement of China.....	<i>Liao, Zhe-Wei</i>102
---	-------------------------------

※ Article Index of the Prospect & Exploration Vol. XVIII, No. 1-12 (Jan. 2020 – Dec. 2020).....113

中共召開與東協政黨會議 之戰略意圖評析

An Analysis of Strategic Implication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PC
and ASEAN Political Parties

陳鴻瑜 (Chen, Hurng-Yu)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壹、前言

在當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而中共和東南亞國家還未能脫離疫情困境之際，去(2020)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以「促進新時代中國—東協合作：政黨的責任和擔當」為主題，在廣西南寧共同舉辦「中國共產黨和東南亞國家政黨首次對話會」，大張旗鼓擬透過跟東南亞國家之主要政黨進行交流，顯有其考量和背後的意圖。

貳、會議背景

本次對話會以「促進新時代中國—東協合作：政黨的責任和擔當」為主題，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共同主辦。東南亞國家近四十個政黨，包括二十多位黨魁、5位議長以及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駐東協國家大使等透過視訊連線方式與會，東協各國駐陸大使則是現場出席會議。

中聯部部長宋濤在會上介紹中共第19屆5中全會精神，並表示在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東協國家領導人共同引領下，中共與東協率先開展區域抗疫合作，雙方政治互信進一步提升，中共願同東南亞國家政黨一道，凝聚政治共識，促進務實合作，推動中共與東協關係更上新臺階，為世界和平發展貢獻力量。

這次會議參加者是中共和東南亞國家的政黨，各國政黨都有其各自的政治主張和立場，要有政治共識是很難的。宋濤在會上呼籲各國「凝聚政治共識」，是很耐人尋味的說詞，到底要凝聚哪種政治共識？仔細觀察中共最近所遭到的黨的危機，是在其信用地位方面。在將近一年多美、「中」貿易戰爭中，連帶地爆發了美國川普政府嚴厲批評及制裁中共黨員，川普政府指控中共黨員滲透、顛覆美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公私機構，並偷竊美國的科技和智慧產權，把中共定位為一個邪惡的政黨，制裁中共黨員，嚴格限制入境美國及金融往來。美國這波嚴厲的制裁手段，使中共的聲望倒流至改革開放前的狀態。

川普政府對於大陸沒有在新冠肺炎病毒爆發時盡到通報世衛組織之責任，且與世衛組織勾結，虛報疫情，在武漢封城時卻讓武漢機場的國際班機繼續進出，將病毒傳播到世界各地，川普率先禁止大陸班機入境。川普總統指控大陸對疫情不當的處理方式，其遮掩疫情顯有不可告人之隱情。川普甚至要求大陸對疫情負起責任。貿易和疫情兩事，激起川普嚴厲批評中共，視其為邪惡的政黨。

因此隨著美、「中」衝突的加劇，國際媒體充斥著對中共貶抑和不懷好意的報導。回顧過去，每當大陸遭逢國際封鎖時，就會尋求從東南亞找突破口。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大陸遭到國際經濟抵制，先找臺灣和香港商人進入大陸投資，給予優惠條件，以挽救其經濟。進而在 1990 年和印尼及新加坡建交，使其外交和經濟獲得活絡出口。

這次會議召開的背景，跟天安門事件後的情況類似。美、「中」貿易戰使其出口美國市場的機會大減，受美國撤出在大陸投資公司之影響，臺灣、日本和南韓的工廠亦相繼撤出大陸，疫情亦連帶影響其經濟成長，面對此一困境，除了強化與東南亞的經貿關係外，就是透過與東南亞各國政黨的關係，洗刷其政黨形象。彰顯中共是一個願與外國政黨交流、共策政治、經濟合作的政黨，而不是像川普政府所說的邪惡政黨。

由於該會議剛好是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下簡稱 RCEP)簽署後召開，而東協和大陸是簽約國，因此許多與會者都認為該項會議可提供一個對 RCEP 再度確認和保證的場合，相關政黨領袖也在會上發表對本地區國家加強合作、共克時艱的積極看法。大陸和東協面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全球疫情的惡化，經濟成長衰退之困境下，趕緊結束近 8 年的 RCEP 談判進程，在去年 11 月 15 日正式簽署 RCEP，希望透過多邊合作，打開一條經濟成長振興之大道。中共和東協都是依賴商品出口的國家，都想將商品外銷，市場在哪兒呢？印度怕變成該集團待宰的肥羊，成為大陸、日本和南韓商品傾銷的市場，導致印度出現嚴重的貿易逆差，乃宣布不參加該協議。就此來看，沒有市場的大集團，其成果可能不如預期。

在該項對話會後，接著在 11 月 27 日至 30 日，例行性舉辦第 17 屆「大陸—東協博覽會」、「大陸—東協商務與投資峰會」，因受疫情影響東南亞國家參加人數大為減少，沒有往年的盛況。然而，疫情雖嚴峻，大陸和東協雙邊的貿易和投資卻持續增加。去年，東協成為大陸最大的貿易合作夥伴，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國對於大陸商品課徵高關稅，只好銷到東南亞國家，而大陸因為在東南亞增加投資，所以雙邊貿易也跟著增加。

參、各國政黨與會概況

東南亞國家近四十個政黨，包括二十多位黨魁、5 位議長以及大陸駐東協國家大使等，透過視訊連線方式與會，參加的政黨有柬埔寨人民黨、寮國人民革命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建國陣線中央委員會主席賽宋蓬、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緬甸傈僳民族發展黨主席瑞民、緬甸聯邦鞏固與發展黨代表丁烏倫、緬甸聯邦議會議長兼人民院議長迪昆妙、菲律賓民主人民力量黨、菲律賓民主人民力量黨總裁、前參議長皮門特爾三世、菲律賓國家團結黨副主席羅米歐·阿克普、泰國國民力量黨、泰黨外事工作委員會主席納麗妮 (Nalinee Taveesin)、泰國前首相阿披實、泰國國會主席兼下議長川立沛 (民主黨)、越南共產黨、馬來西亞印度人國大黨代表諸葛曜 (Kishva Ambigapathy)、印尼大印尼行動黨副總主席蘇吉約諾 (Sugiono)、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副總會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和工業部副部長林萬鋒、新加坡貿

工部兼文化、社區及青年部政務部長劉燕玲（人民行動黨）等人。

綜合言之，這次參與的東協各國政黨，主要是執政黨，反對黨很少，參加者只有印尼的大印尼行動黨、泰國為泰黨、菲律賓國家團結黨、緬甸僑僕民族發展黨、緬甸聯邦鞏固與發展黨。東協國家中唯一沒有派代表參加者是汶萊。新加坡在野黨沒有參加，有其國情之特別處，因為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向來不歡迎外國與其反對黨來往，以前美國和臺灣都因為與其反對黨接觸而引發不悅。

在參與的政黨中，大陸、越南和寮國等三國是一黨專政的共黨國家，與民主國家的政黨交流，並非要吸取民主經驗，也非推動多黨民主體制，而是為了洗刷其形象。其次，中共也知道這些採取民主體制的東協國家，會因為選舉的成敗而輪替執政，因此同時邀請執政黨和在野黨交流，可以有備無患，反對黨將來有機會成為執政黨，亦可以順利駕輕就熟成為盟友。

觀察與會各政黨黨要發言，總括之，包括強化抗疫合作，儘快恢復經濟活力；推動新興數位技術合作、對話交流將有助於探索合作新形式提供重要契機。個別國家的政黨代表也因為國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強調重點，分別包括：

寮國人民革命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建國陣線中央委員會主席賽宋蓬表示，感謝中共在抗疫過程中始終與包括寮國在內的東協國家團結一致、共克時艱，並提供資金、醫療專家、醫用物資援助。

緬甸僑僕民族發展黨主席瑞民表示，希望透過共建「一帶一路」，使地區國家更多民眾脫貧致富；緬甸聯邦議會議長兼人民代表院議長迪昆妙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對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至關重要，有助於消除貧困，實現永續發展；緬甸駐北京大使吳苗丹佩表示，感謝大陸研發出來的新冠肺炎疫苗將成為全球公共產品，東協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無法獨善其身，因此需要堅定地維護多邊主義，克服困難。

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副總會長、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和工業部副部長林萬鋒認為，RCEP 的簽署將為整個亞太地區帶來更好的前景，能夠為各參與國的企業帶來更大的共用市場，讓整個亞太區域內的供應鏈出現一個永續的、更強的發展及規劃，營造一個更好的投資大環境，並加強各國在技術和科技等方面的合作。

新加坡貿工部兼文化、社區及青年部政務部長劉燕玲也強調，RCEP 的簽署有助於強化大陸與東協國家持續加強經貿往來，對於地區經濟復甦和維

護地區乃至全球供應鏈十分重要。

菲律賓民主人民力量黨總裁、前參議長皮門特爾三世則強調，透過政黨的聯繫，可以增進東協和大陸在政治安全合作、經貿往來、人文交流等各領域的友好關係；菲律賓國家團結黨副主席羅米歐·阿克普表示，希望本次對話會進一步強化地區政黨在各國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推動大陸—東協關係不斷邁上新臺階；菲律賓民主人民力量黨領導人、眾議長貝拉斯科表示，需要加強科研協作，促進人才交流，開展符合國際衛生健康標準的疫苗和藥物生產合作，確保疫苗和藥物有效性、可負擔性和可及性。

肆、大陸推銷防疫疫苗前哨戰

此次會議上各國政黨發言呼籲持續團結抗疫，謀劃下一步經濟復甦和共同發展，且期待大陸在抗疫疫苗上給予協助。目前國際間已開發疫苗並開始接種的國家有美國、英國、俄國和大陸，東協國家要分配到疫苗相當困難，因為疫苗生產量不足，必須排隊等候，唯有大陸基於戰略考慮，已開始從去年12月提供給菲律賓和印尼疫苗進行施打。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去年9月的《求是》雜誌發表文章，要求發揮「全球抗疫物資最大供應國」作用，「全面深入參與」相關國際標準、規範、指南的制定，分享「中共方案、中共經驗」，提升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考察大陸之所以急於開發疫苗，一在彰顯其醫療衛生技術已達國際水準。二在利用疫苗做為其拉攏第三世界國家之戰略手段，因為只有第三世界國家才敢施打大陸研發的疫苗。由於疫苗稀少又價格昂貴，老早被富國搶訂一空；相對地，大陸所產的疫苗價格便宜，運送方便，加上大陸承諾「優先」給第三世界需要的國家，還提供用於支付疫苗的鉅額貸款，所以普受第三世界國家歡迎。三在扳回顏面，扭轉「疫情自大陸傳出」的國際負面形象。

在推動疫苗外交之大目標下，至去年底前大陸疫苗年產量預期可達到6億1,000萬劑，並預估今（2021）年可望提升到至少年產10億劑。大陸並已在全球15個國家地區簽妥協議試驗，包括疫苗合作、啟動抗疫基金、提供抗疫物資、建立核酸檢測實驗室等合作項目。

目前大陸優先供應疫苗給擁有廣大穆斯林人口的國家，包括波斯灣國

家、伊朗與土耳其等，以及非洲國家。去年 8 月，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承諾疫苗將優先供給湄公河流域的東南亞國家，以緩和這些國家人民近期因大陸在湄公河上游進行大型水壩工程而增加的敵意。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去年 10 月訪問東南亞 5 國期間，也承諾將優先提供疫苗給菲律賓和印尼。印尼政府已經引進大陸科興（Sinovac）製藥公司生產的 120 萬劑新冠肺炎疫苗，隨後還有 180 萬劑疫苗。此外，印尼政府還確定 6 種疫苗，可供採購，這 6 種疫苗分別由 BioFarma 製藥公司、英國阿斯利康公司（Astra Zeneca）、大陸國家製藥集團公司（Sinopharm）、現代製藥公司（Moderna）、美國輝瑞公司（Pfizer Inc.）與德國生物技術公司（BioNtech）研發的疫苗和大陸科興生物技術公司（Sinovac Biotech）所生產的疫苗。菲律賓政府亦宣布與大陸科興生物公司達成採購協議，目標在今年 3 月購進 2,500 萬劑疫苗。

儘管大陸生產的疫苗較為便宜，但其有效性仍受質疑。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去年 12 月 15 日表示，「柬埔寨不是垃圾桶，也不是疫苗實驗場」，只會購買經世衛批准的疫苗。此無疑是對大陸輸出疫苗外交的冷水澆頭，柬埔寨過去一直是大陸的得力盟友，當新冠肺炎剛剛爆發時，洪森還專程到北京表示支持大陸的抗疫行動。洪森的動作可能影響其他東協國家採購大陸疫苗的態度，例如新加坡已購進美國輝瑞公司和德國生物技術公司共同研發的新冠疫苗。

伍、結語

美國川普政府對大陸採取的是「硬圍堵」，透過經濟制裁、加增關稅、打擊中共黨員封鎖其在美國的銀行戶頭、限制大陸軍方背景的科研人員在美國求學和工作、撤出在美國的孔子學院、要求大陸在美國上市公司需符合美國金融管制規定、限制抖音、微信等科技軟體、華為硬體在美國使用，以及撤出在大陸投資之美國工廠等手段。繼任美國總統的拜登，屬於民主黨，過去民主黨對大陸是採取軟圍堵，圍堵手段較為溫和，有討價還價之空間。無論如何，美國基於其國家利益，對大陸還是會持續實行圍堵政策，防止其經濟擴張所帶來的軍事威脅力增強。面對未來國際新形勢之可能變化，大陸開始調整戰略步驟，重視東協國家的政黨重要性，透過召開政黨對話會議，或許能為其呈現停滯的「一帶一路」計畫打開一條活路。

教宗首度公開聲援新疆維吾爾人 對梵「中」關係之影響

The Impact of the Pope's Words on Supporting
Uyghur to Holy See-China Relations

劉國興 (Liu, Kuo-Hsing)

退休大使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兼任教授

壹、前言

理念與做法可謂背道而馳的教廷與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能否建交，長期以來是全球關注的議題。尤以 2018 年 9 月 22 日雙方突破性地簽署了《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建交一說甚囂塵上。始終不變一意追尋重返大陸宣教的教廷，長期以來也刻意漠視大陸侵犯人權不良記錄而不發一語，以避免衝擊雙方關係進一步改善的可能。然而 2020 年 12 月 1 日教宗方濟各發表新書，內有首度公開聲援新疆維吾爾人之語，一時輿論譁然，是否梵「中」關係突變？對話可能不再？建交日遠？或者沒有這麼嚴重，建交仍有可能？一連串疑問尤為我國人所關切。本文試就上述各疑問一一加以剖析解答。

貳、教宗到底說了什麼？為什麼要這樣說及其影響

天主教耶穌會發行之《美國》(America Magazine) 期刊，常被視為教宗推動各項改革的重要風向球。該刊於 2020 年 11 月 23 日報導，12 月 1 日教宗將出版英文新書《讓我們夢想－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道路》(Let

Us Dream – The Path to a Better Future），由教宗的英文自傳作者伊凡里（Austen Ivereigh）執筆，描寫教宗對於「後新冠肺炎疫情時代」的願景，包括反種族歧視。在書中教宗呼籲「我們必須從社會邊緣去看待這個世界，這其中包含社會上充滿罪與痛苦的地方、充滿遭排擠與受折磨的地方，還有充滿疾病與孤寂的地方。……在那些受折磨的地方，我時常想到遭迫害的人們：羅興亞人、可憐的維吾爾人、受伊斯蘭國（IS）虐待的亞茲迪派信徒、在埃及與巴基斯坦教堂中被炸彈殺害的基督教徒。」

就是這樣一句話「我時常想到那些遭迫害的人們：……可憐的維吾爾人……」，尤其是「迫害」、「可憐」等字眼，被認為是首度公開聲援維吾爾人，甚至是首度批評大陸，¹ 因而對梵「中」互動投下震撼彈，可能不利梵「中」關係之進一步發展。

教宗歷來為《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而做政治考量不願破例批「中」，大家可以理解。那為何 12 月 1 日出書開始批「中」？邏輯上的解釋是該協議已於 10 月 22 日完成續約，故 12 月 1 日新書出版時已無政治壓力。但畢竟是第一次批「中」，而且梵「中」關係尚待長期努力或可有成，是以開始破例批「中」，有必要嗎？其動機頗值深入探討。筆者認為其動機有四：

首先，教宗一向關心弱勢族群，即使囿於國際現實環境而暫時隱而不表，但事後仍會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表達：例如 2019 年香港爆發大規模「反送中」撐傘運動，教宗十分關心，但適值教廷企圖與大陸加強對話之際，教宗只在 2020 年教廷官方月曆封面特意選用一張教宗矗立在撐傘群眾中的照片，此被解讀是間接表達對香港人的關心。又如 2017 年 11 月教宗訪問緬甸時，因為當地主教建議勿觸怒執政當局，故全程未談國際矚目的羅興亞難民議題。然而在下一站孟加拉時，教宗不但會晤羅興亞人，還率直地向媒體透露雙方都曾掉下眼淚。是以被眾多國際媒體嚴厲批評醜化的所謂「新疆再教育營」，必然也引起教宗的關注，雖未即時批判，但在臨時協議續簽後發聲實非驚人之語。

其次，欲維持道德權威形象：人權團體不斷寫信要求教宗替新疆維吾爾

¹ 2020 年 7 月 5 日教宗在羅馬的聖伯多祿廣場公開接見信眾的「三鐘經」祈禱活動中，據教廷半官方網站《Sismofrafo》透露，教宗本已備妥要求大陸尊重香港自由的講稿，以示間接反對大陸甫經宣布的「港版國安法」。但當日教宗卻一字未提。事後被解讀為教宗期盼即將到期之《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能順利延期，故首度批「中」之語按下不表。

人發聲，復以 2020 年 10 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問教廷時，在梵美合辦的宗教自由會議上火力全開批判大陸壓迫新疆維吾爾人，認為大陸迫害宗教變本加厲，故若梵「中」延長《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將危及教廷道德權威。雖然教宗未接見蓬佩奧，但其所言促使教宗必須守住道德權威形象的防線。

第三，在談判技巧上，一方若太遷就對方而不敢講批評對方的話，則談判將失去對等、平等的原則，結果反可能不利己方。故教宗新書批「中」之言，可謂並不過分。

第四，批評「新疆再教育營」者眾，教宗可算附和而非創舉，故批「中」言論尖銳性降低很多。

批「中」之後是否影響梵「中」關係的進一步發展？這要看被批的大陸如何回應，此節將稍後析述。不過可確定的是教廷一向積極主動尋找與大陸對話的機會，甚至予人一頭熱的感覺，此次可算適時適切地批「中」，亦非無的放矢或未經考量輕率發言。

2020 年 10 月 21 日《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成功續簽前一天，教廷國務卿樞機主教帕羅林（Pietro Parolin）先告知記者表示，對續約感到滿意，但協議本身並沒有替梵「中」雙方存在的許多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這種看似自我矛盾的講法，給人有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感覺。有總比沒有好，仍對梵「中」建交存一線希望，教廷「隨時可以捨臺投中」的心態不變。

此種仍存希望的想法另由義大利《晚郵報》一則報導加以證實。據報導大陸內部對是否續簽《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意見分歧，舉棋不定。但由於在最後時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訪教廷，對教廷發出若梵「中」延長《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將危及教廷道德權威近似威脅之論，故教宗拒不見面，含有教廷與大陸進行對話的做法不會受到任何約束之意，大陸幡然感到滿意，同意續約。

教廷外長蓋拉格（Paul Gallagher）亦曾於 10 月 6 日接受了天主教媒體《十字架報》（Crux）的專訪表示對梵「中」續簽臨時協議的意見，他認為若沒有臨時協議，教廷在大陸的處境會更困難。因此即使遭受批評，續約仍是值得的。蓋拉格續強調，教廷是一個小國，而且與大陸沒有正式外交關係，需要找方法和大陸保持交流。大國與大陸交流有許多經濟或軍事策略可以運用，教廷只有對話，而且有對話和完全沒有差別是很大的。

參、大陸對教宗首度批「中」之反應及意義

當 2020 年 11 月 23 日《美國》期刊報導，12 月 1 日教宗將出版新書並批「中」後，24 日大陸外交部在例行記者會中，發言人趙立堅嚴詞駁斥指控，聲稱教宗方濟各的評論沒有事實根據，大陸共有 56 個民族，維吾爾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員，大陸政府一貫一視同仁地保護少數民族合法權益。但稍後大陸外交部官網登出的記者會逐字稿中，卻沒有收錄這段。部分大陸媒體原已報導此事，也紛紛從網路上移除。此動作意味著什麼？有點色厲內荏之回應引發議論。極可能是大陸認為教宗所言並不嚴重，理由如下：

首先，大陸主其事的開明派認為，教宗並沒有指名批評大陸，不必對號入座。

其次，大陸自己認為做得正，外有奧援，不怕批評：大陸從未稱「再教育營」，而是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簡稱「培教中心」，大陸媒體有時也稱其為「去極端化培訓班」。集端化是指什麼？這就和成立此類機構的動機有關。

此要追溯到 2013 年底在敘利亞東部及伊拉克西部，開始發跡的極端殘酷回教遜尼派組織「伊斯蘭國」(IS)，於短時間內獲得極大回響。風起雲湧廣募世界好戰人士，攻城略地，殘殺無辜而囂張一時。世界各國乃高度警戒緊張，美國雖於 2011 年底自伊拉克完成撤軍，結束自 2003 年 3 月開始的「伊拉克戰爭」，但亦不得不重新調整其中東政策，再度派兵前往清剿 IS。IS 興起之際適逢 2014 年 3 月至 7 月在大陸昆明及新疆多處，連續發生多起與維吾爾族分裂勢力組織有關的類似 IS 恐攻事件。此距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 年 3 月就任領導人為時不遠，習近平乃即時提出一系列的反恐措施，防止再有「集端化」的恐攻發生，所謂「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乃應運而生。

西方媒體慣稱此「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為「再教育營」甚或「集中營」，人數可能達到上百萬。再教育內容有洗腦、強制婦女絕育等。大陸自然予以反駁，聲稱一切是以為反恐為目標，所附職業技能之培訓是為提高就業率。並稱培訓中心已於 2019 年年底結束。有影射 IS 威脅不再的意思。

海外流亡新疆維吾爾族人 2020 年 7 月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交大量證據和

檔案，指控大陸將一百多萬名主要為維吾爾族人的穆斯林監禁在「再教育營」，並強制女性絕育，要求調查大陸犯下的種族滅絕與違反人道罪。此控訴被該院要求提供更多證據而駁回。

是以到底是「新疆再教育營」還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雙方之爭議在聯合國的兩次對嗆中更是壁壘分明：

2019年7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22個成員國（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冰島、愛爾蘭、日本、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國）聯名發出一份聲明，批評大陸在新疆地區大規模拘押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並要求大陸讓聯合國和獨立的國際觀察員進入新疆。隨之有37國（阿爾及利亞、安哥拉、白俄羅斯、布吉納法索、蒲隆地、葛摩、剛果共和國、古巴、朝鮮、剛果民主共和國、厄利垂亞、加彭、寮國、緬甸、奈及利亞、菲律賓、俄羅斯、索馬利亞、南蘇丹、敘利亞、塔吉克、委內瑞拉、辛巴威、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多哥、柬埔寨、阿曼、卡達、阿聯、巴林、蘇丹、土庫曼、科威特、喀麥隆和玻利維亞）大使致信聯合國，表達對大陸新疆政策的支持，認為大陸的防恐、防極端化的措施使得新疆安全，各民族人權也有保障。

2019年10月30日，英國駐聯合國大使代表美國、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荷蘭、紐西蘭、挪威、瑞典等23個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大陸停止拘押維吾爾人和穆斯林，尊重新疆與大陸各地的宗教信仰自由。而白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也代表巴基斯坦、俄羅斯、埃及、玻利維亞等54個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講話，認為新疆已經恢復了安全，大陸政府在新疆反恐和去極端化的過程中尊重和保護人權。

雙方爭議我們不介入，但至少可以解釋大陸自謂外有奧援，故可不必太在意教宗的首度聲援維吾爾人，以致在其外交部發言人反駁後，就將官網、媒體報導均予下架。同時也可嗅出大陸暗示願與教廷繼續對話。

肆、梵「中」簽訂《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後，大陸迫害教會行為加劇

雖然大陸的《憲法》名義上也保障宗教自由，但並非單純的一般自由，

而是要「宗教中國化」，最終目的是為國家服務。並且中共也毫不隱瞞點出中共是共產主義無神論者，強力反對宗教干預政治，嚴密防範外來宗教誤導人民思想。

大陸近年不斷升溫對宗教的管制與迫害，因其將宗教視為對政府統治的嚴重威脅，此眼中釘必須拔除。自 2018 年 6 月中共開始推行「四進」的宗教整頓運動，以求「宗教中國化」。四進包括：「舉行唱國歌、升國旗儀式」、「向信徒宣講中共憲法和其他法律法規」、「宣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9 年開始將天主教、基督教奉為圭臬的「十誡」刪除最重要的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變成九誡。2019 年 6 月更要求受政府豢養領導的「三自」² 教會內的十誡必需除下而改掛上習近平語錄，並威脅如果做不到教堂必須立即關門。進而，宗教之定期或不定期、公開或不公開聚會勢必是中共所最忌諱的，與中共理念格格不入的宗教聚會，往往人數又不在少數，豈是中共可長期容忍者。

由上述可見此次《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得以續約，大陸是採用兩手策略，一方面表示願與教廷繼續往來對話，以示自己不是一個封閉政權，或仍寄予遐想欲教廷接受「一中原則」與之建交，而離間我與拉丁美洲天主教信仰邦交國間之關係。另一方面打壓國內宗教力道反而加強，尤其是在 2018 年 2 月起新《宗教事務條例》生效之後。

即使《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於 2018 年 9 月首簽之後，一般認為是大陸讓步，而由教宗取得了大陸主教的最後任命權，但在實例上並非如此。兩年多前臨時協議簽訂之後，效忠教宗的「地下教會」福建閩東教區主教郭希錦仍被迫降職讓位。2020 年 10 月 4 日臨時協議將續簽之際，郭希錦心灰意冷宣布離任，並退出教區管理組織。

新《宗教事務條例》是將大陸對所有宗教之嚴厲鎮壓和迫害予以合法化。其中最嚴厲的限制實際宗教活動是第 35 條：教堂、清真寺、佛寺或道觀之外的場所，只有經過大陸政府明確批准，才可以做為「臨時宗教場所」使用，藉此堵絕許多甚為活躍的「家庭式」宗教聚會。但此並非表示既有的教堂、清真寺、佛寺或道觀的宗教活動不受干擾，據十分關注大陸宗教自由

² 三自愛國教會或稱三自教會是指受中共的「自治、自養、自傳」大陸基督教教會。包括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等三大基督教派之三自愛國教會各有一套組織體系。

和人權狀況的義大利線上雜誌《寒冬》(Bitter Winter) 報導，2020 年 1 月至 4 月安徽省就有超過 250 處的教堂十字架被拆除，而且這些教堂是隸屬於服從大陸政治領導的「三自愛國教會」。

2020 年 9 月開始，大陸為滅絕基督教，突襲並大量關閉家庭教會，強行沒收遭抓捕信徒的相關物品，威逼教會負責人簽保證書，甚至以拆除房屋、取消醫療保險及罰款等要挾信徒不得再度舉辦集會。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 蔓延期間，大陸政府先是藉防疫之名禁止寺廟開放，之後更是大力展開全國性「滅佛運動」，包含四川、福建、山東等多處露天佛像，甚至是百年千年廟宇、文物保護古寺，都遭強拆、砸毀，單是河北省邢台市 2000 年 5 月至 6 月期間，就多達 57 座廟宇遭拆除。

伍、結論

教宗方濟各選擇在梵「中」完成《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後出書批「中」，是經過政治考量後的設計，既能不妨礙教廷熱切寄望與大陸繼續對話，以期打開前往宣教的大門，又能兼顧關心弱勢族群及維繫道德權威的立場。大陸的回應則虎頭蛇尾，因為教宗所批議題在國際上仍有爭議，大陸認為不乏奧援，故無必要小題大作，同時也顯示大陸願意繼續與教廷對話。

雙方都願意繼續對話，表面看來是正面的，但更應注意實質上的現況。教廷一本熱忱希望進入大陸宣教，期使「浪子回頭」，但對大陸共產政權本質卻認識不清或刻意漠視。大陸願續簽臨時性協議，看來絕不是「浪子回頭」，而是對藉教宗權威以影響拉丁美洲我天主教邦交國對我國之向心力仍存幻想。

大陸在 2018 年 9 月梵「中」首簽《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後，迫害教會行為反而加劇，慈悲為懷的教宗豈可能視而不見，故是否有必要繼續與大陸對話必然內心十分煎熬，並且看不到痛苦解除的曙光。因此，臺梵邦交相對穩固不變。

從和平崛起到底權崛起—從中國大陸對澳洲和印度的外交報復談起

From Peaceful Rise to Hegemonic Rise—China's Diplomatic Retaliation against Australia and India

宋國誠 (Sung, Kuo-Chen)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壹、前言

自 2003 年中共前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論壇」上首次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思想以來，國際間對「中國崛起」的議論可謂卷帙浩繁。17 年後的鄭必堅，在 2020 年 11 月 20 日廣州「讀懂中國」國際會議上，再度以「大合作」為概念，重申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的和平崛起絕非新霸主取代舊霸主，強調大陸要以做為國際秩序和體系的維護者、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堅持高揚全球治理、多邊主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來應對霸權主義。百年來，都是西方國家入侵大陸攻城掠地、燒殺擄掠，大陸從未入侵他國一吋土地，在大陸強大之初，能以「和平」為重，確屬不易。

然而，在這 17 年之間，大陸依然處於崛起之中，但自美「中」貿易戰開打以來，大陸已經拋棄了「大合作」概念，代之而起的是「大鬥爭」，「和平」一字悄然退去，代之而起的是改寫國際規範、重構地緣版圖、奪取全球支配地位的「霸權崛起」，並通過一連串的口頭威嚇、關稅制裁、經濟脅迫、外交懲罰，乃至生態報復手段，實現其「新霸主取代舊霸主」的目標。實際上，據媒體報導，2019 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自下令，要求外交官面對美「中」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必須立場強硬，展現「鬥爭精神」。

換言之，面對國際新形勢，大陸已經從過去的「維護者」轉變為「挑戰者」。

不禁懷疑，「和平」一字似乎從來就不是大陸崛起的手段、方法或途徑，也不是價值或目標，而是一種「策略修辭」或「障眼法」。做為一種具有麻醉作用的掩護，「和平」是用來降低西方國家對大陸崛起的警覺與戒心，消除國際社會對大陸崛起的防備和阻礙，以實現世界各國歡迎大陸崛起的目標。

貳、大陸對澳洲的外交報復與經濟制裁

澳洲是大陸重要的進口國，21世紀以來，澳「中」關係一直保持友好穩定。2015年6月，雙方簽署了《中澳自貿區協定》，約定在出口貿易中超過85%的產品逐步實現零關稅，並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根據澳洲外交貿易部（DFAT）統計，2018年至2019年澳洲對大陸雙邊貿易額達2,350億美元，占澳洲外貿總額約26.4%；澳洲統計局最新統計，2019年1至7月，澳「中」雙邊貿易額達到了創紀錄的2,080億澳元的水準。澳洲每年出口的大麥至少有一半運往大陸，2018年大麥貿易額約為15億澳幣，從2018到2019年，大陸是澳洲94%龍蝦的出口市場，總額7.52億澳元（約5.27億美元）。這種貿易規模，對雙方來說都至關重要。然而，以2017年為起點，澳「中」關係開始急轉直下，緊接著就是大陸對澳洲史無前例的貿易制裁。

2017年澳洲安全情報局（ASIO）在年度報告中指出，外國勢力一直以間諜活動，暗中左右澳洲公眾、媒體和政府官員的觀點，這裡的外國勢力指的就是大陸。在此之前，媒體披露了澳洲最大的政治獻金捐贈者之一（大陸商人）參與了「推進中共利益」的秘密活動，許多大陸動機可疑的政治捐款隨之曝光。

2018年6月，澳洲國會參議院通過了《反外國干預法》，矛頭指向大陸。2018年8月，澳洲率先禁止華為參與國家5G網路建設。2020年5月，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呼籲國際社會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除此之外，澳洲多次指責大陸在南海的軍事化行動，在南海與美國進行聯合軍演；印「中」

衝突之際，澳洲與印度簽署了國防協議，相互允許使用對方的軍事基地。澳洲的這些舉動被大陸視為敵對行動，進而引爆大陸一連串的報復。

由於面對美國這隻「大象」的貿易制裁而無力招架，大陸把怨氣轉移至美國身邊的「小貓」—盟國，以宣洩其受辱的憤怒。對於澳洲，大陸祭出了所謂「新監管措施」，儘管沒有政府正式公告，大陸至今已經要求貿易商從 2020 年 5 月起，停止進口龍蝦、葡萄酒、大麥、食糖、木材、煤炭及銅礦共 7 類澳洲商品，此外還包括禁止 4 家牛肉商向大陸出口，對大麥徵收 80.5% 的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另外，澳洲約 65% 的棉花出口到大陸，每年貿易額約 6 億美元，10 月 16 日，大陸下令棉紡廠停止採購澳洲棉花。11 月 28 日起，大陸對澳洲葡萄酒進行反傾銷措施，加徵保證金最高達 212.1%。在一連串新監管措施下，數以噸計的澳洲龍蝦、櫻桃等新鮮農漁產品滯留大陸各地入境口岸，數十艘煤炭散貨船也被困在港口無法卸貨，導致貨品逾期腐敗而廢棄。

除此之外，2020 年 6 月初，大陸發布了澳洲旅遊警告，宣稱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提醒大陸遊客提高安全防範意識，勿前往澳洲旅遊。6 月 9 日，大陸教育部表示，由於全球疫情擴散蔓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提醒留學人員做好風險評估，謹慎選擇赴澳或返澳學習。據估計，國際教育占了澳洲第 4 大外匯收入，大陸是澳洲國際學生的最大來源，澳洲每年將因此損失 380 億澳幣（約新臺幣 7,797 億元）。

自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澳洲一直是大陸重要的貿易夥伴，但大陸將此一夥伴關係視為「澳洲靠中國吃飯」、「澳洲依賴中國生存」，而不是視為提供大陸民生消費、保障糧食安全的來源。大陸無視國際貿易的本質，依然本著「政治掛帥」的教條，推翻現代外交關係的慣例與共識，以領導人的意志來壓制雙邊貿易的正常規律。

參、戰狼外交官的「辱澳事件」

被稱為「戰狼外交官」的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020 年 11 月 30 日在推特（twitter）上貼出一張造假照片，畫面中一名身穿澳洲軍服的男子，左手挾持一名被裹著澳洲國旗的阿富汗小孩，右手則握著匕首，刀鋒架

在小孩的脖子上，圖片上還寫著「不要害怕，我們來為你帶來和平」(Don't be afraid, we are coming to bring you peace)，這是趙立堅轉推一名大陸網路畫家「烏合麒麟」用數位軟體改製的諷刺漫畫，要求澳洲對阿富汗的戰爭罪行進行調查。趙立堅在轉發的推文中寫道，大陸政府對「澳洲士兵殺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驚。我們強烈譴責這種行為，並要求追究他們的責任」。圖文一出，立即引起澳洲政界一片撻伐。

儘管推文的依據來自澳洲國防部對其軍隊在 11 年間殺死三十多名阿富汗平民和囚犯的一份調查報告，但圖文改以「兒童」為受害對象，確實是經過改造和重製的誇大訊息。澳洲總理莫里森怒指大陸做法「令人非常反感」，莫里森指控，「沒有任何藉口可以合理化這種行徑，而中國政府應為這則貼文感到十分羞恥」，他要求大陸政府就此事件道歉。然而，大陸非但沒有道歉，外交部另一位發言人華春瑩還加碼對澳洲進行二度羞辱。實際上，澳洲國防部對其軍隊的不法行為進行了罕見而嚴厲的調查，這在大陸是絕無可能的。大陸在強烈譴責澳軍的戰爭罪行時，完全忘卻了大陸至今毫不允許人們要求對「六四天安門」殺害學生事件進行調查，遑論追究此一事件的責任，大陸也完全不提如何阻撓西方記者對大陸拘押上百萬新疆維吾爾族「再教育營」的報導，以及對報導者粗暴的監視與威脅。

肆、大陸對印度施展生態霸權

據相關媒體報導，「中國電力建設集團」將依據「十四五」計畫，確定執行「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計畫，預計發電量將超過世界規模最大的三峽電站，相當於再造 3 個三峽水壩。

經過多年研究、勘查、規劃之後，大陸決定在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拐彎處興建「墨脫水電站」，此處年均流量 600 億立方公尺(有說 1,400 億立方公尺)，上下游落差最大達到 600 公尺(有說 2,000 公尺)，彙集了近七千萬千瓦的技術可開發資源。僅僅從流量與落差來看，此處十分適合建立水電站，但實際上，這座高原電廠涉及許多極為複雜的自然條件因素和世界尖端工程技術難題，包括水文資料缺乏、土壤地質條件惡劣（山體滑坡與泥石堵江）、地震高發率、工程施工世界級超高難度、遠距輸電和穩定管理等等問

題，特別是它將澈底改變大陸西南與南亞的生態戰略格局，牽制此一區域的經濟命脈和億萬人民的生存，掐勒印度的經濟咽喉。但就在印「中」關係交惡之後，大陸執意興建。

雅魯藏布江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北麓的昂色洞冬冰川，源頭位於西藏阿里地區的普蘭縣，是大陸第五大河，平均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在墨脫大拐彎處（Great Bend）形成世界最大的雅魯藏布大峽谷。在流經印「中」有爭議的藏南地區之後進入印度阿薩姆邦（Assam）和阿魯納查省（Arunachal Pradesh），改稱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流入了孟加拉之後，改稱為亞穆納河（Yamuna River），再與恆河匯流之後流入孟加拉灣，若包括其支流在內，也流經尼泊爾與不丹，是南亞多國重要的經濟命脈。

雖然印度擁有三大河系—印度河、恆河、布拉馬普特拉河，印度的水經濟命脈主要是境內的恆河，從天然徑流量上來說，印度河、恆河和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在大陸境內的比例只有 4.83%、2.55% 和 14.61%；整個「恆河三角洲水系」在大陸境內產水量的比例只有 8.88%，大陸興建墨脫水電廠似乎對印度經濟影響不大。

但是如果離開這些地理條件的客觀分析，從「生態戰略」—資源優勢與外交策略的混和運用來看，大陸完全可以對雅魯藏布江流域所有電廠進行政治操作，諸如雨季放水、旱季攔水，這對於河域污染嚴重、天然水量充沛但卻缺乏河域治理能力的印度來說，就足以構成嚴重的威脅。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大陸究竟將水資源視為國家主權的私有財產？還是流域內國家共享的資源？一如德國生態學家 Petra Dobner 在《水的政治》一書所言，在跨界流域上，水是跨國政治的重要課題，在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主權思想和保障下游居民享有乾淨水源的權利之間，衝突根本難以避免。長年研究印「中」跨境河流，現任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很早就把墨脫水電廠視為「針對印度的政治武器」，他在 2011 年出版的《水：亞洲的新戰場》（Water: Asia's New Battleground）一書中就已指出，大陸把水源用作一種「政治槓桿」（political leverage），迫使印度屈服於大陸既定的戰略；他指出，在大陸試圖擾亂國際河流現狀下，印「中」之間的「水戰爭」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

陸、雅魯藏布江非中國大陸所能獨占

依據《國際水法》(international water law) —主要是「國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核心原則—公平合理利用水資源，關切並承認全流域國家對水資源的共用性和競爭性利益，各國自由利用領土內水源之時必須不能對其他流域國家的權利和利用造成重大損害，是今日全球面臨優質水源和跨國水資源日益短缺時代一項重要的原則。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宣稱，「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計畫是「中方的正當權利」，這種說法完全違反當前國際公認關於跨境河流「全流域人民共享」以及「河域開發多國協商」的原則，是對國際水資源秩序的背離和挑戰。換言之，雅魯藏布江不是長江或黃河（境內河域），無論基於國際社會至今已取得的硬法機制或軟法共識，無論大陸再怎麼強大，人民再怎麼愛國，這項涉及「全流域影響」的開發計畫，都非大陸所能獨占。

大陸是南亞七大跨境河流上游的控制者，大陸未經多國協商即片面進行墨脫水電廠的開發，此舉再度引發印度的「恐中」(Sinophobia)情緒。印度警告，大陸極可能採取「河域武器化」的戰略，以控制流入印度的水流做為對付印度的外交手段，塑造大陸在此一區域的「生態霸權」，逼使印度在所有雙邊爭議中全面讓步。

自 2006 年起，大陸就對「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墨脫地區)進行了研究與規劃，但過去幾年均因顧及「中印友好關係」而擱置，唯獨在印「中」邊境衝突、印度積極參與美國印太戰略之後，決定付之行動。毫無疑問，這是大陸在兩國交惡之後對印度的外交報復。大陸仰仗其高踞亞洲水塔—西藏高原的優勢，憑藉「世界水壩大國」的經驗與技術，對印度實施挖地刨根的戰略壓制。

柒、結語

外交是一門藝術，國家的外交手段巧妙而繁多。外交的目的是尋求國家之間的互惠與雙贏，而非衝突或戰爭。國家的外交手段有對話、協商、談判、交易等等多項選擇，而非僅僅是懲罰 (sanction) 或報復

(retaliation)，簡言之，外交旨在「為善」而非「交惡」。但近年來，大陸已把外交降低為一種「叫罵工具」，民族主義的出氣筒，報復與反擊遠多於協商與溝通，對外界的指責毫不猶豫地加倍進行言語反擊，顯然，這是對國際社會的仇視與誤判。所謂「戰狼」的含意就是：凡不利於大陸的，即使只是批評或警告，大陸一律自動升高為敵對行為，無限上綱為外交懲罰，以塑造國際社會對大陸的畏懼與退讓。

17 年來，大陸已經從順應國際秩序的和平參與者，轉變為改造國際新秩序的霸權支配者。這是一個以大陸利益為優先的新霸權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大陸的主權利益將置於國際共享利益之上。然而，中共的社會主義專制體制不可能成為新的普世價值，「中國霸權」崛起也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警惕與防堵。只要「霸」字不除，只要大陸處處以鄰為壑、處處與世界為敵，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謂「中國夢」，終將是一場鏡花水月、李伯大夢。

由 2020 年回顧與展望 兩岸關係的走向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2020 :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顏建發 (Yan, Jiann-Fa)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壹、前言

兩岸關係的發展始終脫離不了臺美「中」三角關係的框架；臺美「中」三角關係又環繞在美「中」的雙邊互動之上。回顧 2020 年，1 月 11 日臺灣的總統與立委選舉以及 11 月 3 日美國的總統及參眾兩院選舉的過程和結果，都對臺灣在臺美「中」三角關係的定性與定位產生動態的校正作用，而此過程連帶讓我們清楚兩岸關係發展的脈絡與走向。

貳、臺灣大選催化兩岸關係趨向疏遠

回顧 2020 年之前的兩岸關係，2018 年 11 月 24 日，臺灣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央執政的蔡總統以慘敗收場，甚至接下來 2019 年引來黨內賴清德參加民進黨總統提名人初選對她連任的挑戰；民進黨乃至於整體綠營出現內部分裂之虞。在此處境下，2020 年蔡總統得以成功連任，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政績，而是國民黨過於親「中」的立場，以及在北京打壓臺灣和香港示威背景下所激起的一種「亡國感」氛圍，讓不少綠營支持者擔心在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一中架構」下，臺灣遲早會「香港化」，而將團結置於優

位，從而擁護追求連任的蔡總統。同於此理，美方挺蔡總統的立場與作為也表露無遺。

我總統大選前，2019 年 1 月 2 日，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構想，讓「亡國感」的憂慮加深。蔡總統把「中華民國」和「臺灣」連結起來，團結民進黨和中間派選民，間接壓制了臺灣的「激進獨派」，同時也讓國民黨「九二共識為表、一個中國為裡」的路線遭致挫敗。統獨勢力呈現大幅消長。根據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臺灣成年人調查 2019」的調查結果，總體上只認同自己是臺灣人的占 66%；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占 28%。而以年齡層分，18-29 歲：臺灣人認同占 83%，中國人 13%。年輕人的認同意味著未來的趨勢。

參、上升的國際反「中」氛圍突出臺灣的戰略地位

有鑑於蔡政府 2016 年執政以來的「去中國化」走勢，大陸再次啟動文攻武嚇的老技倆，但由於在大環境上，大陸成為國際秩序破壞者，因此臺灣雖然連連失去邦交國而外交受挫，但其民主與良治卻獲得美國、日本、歐洲等強國的支持。短短幾年間，美國通過多項對臺法案，提升臺美關係，包括 2018 年的《臺灣旅行法》讓臺美官方高層交流可以制度化、2019 年的《臺灣保證法》讓美國定期對臺軍售常態化，2020 年 3 月 26 日川普簽署的《臺北法案》，讓臺美雙邊經貿關係與國際參與獲美國政府強力支持。而另一方面，北京為打壓香港「反送中」，5 月 28 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 2,878 絶大多數通過「港版國安法」，很快地，大陸在香港設國安公署，而專門法官由特首指派。美、英對香港極度關切，也警惕了它們對於臺灣戰略重要性的更加重視。6 月 10 日美國參議員霍利 (Josh Hawley, R-MO) 提出《臺灣防衛法》(Taiwan Defense Act, TDA) 草案，以遏止中共帝國主義，並捍衛重要利益與夥伴臺灣。美「中」惡化的關係更形增大。

2018 年 3 月，美國對大陸祭出經貿與科技制裁以來，美「中」關係快速向下滑行，美「中」關係惡化已深入美國人心。2020 年 5 月 29 日北京強推出「港版國安法」後，川普很快速地回報，宣布「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對

香港、大陸制裁：停止香港優惠經貿豁免、凍結、沒收中共、香港官員在美國的財產、禁止大陸學生入學美國學府、禁止大陸企業在美國投資。」為了反制大陸的一意孤行並設想大陸全國人大在 7 月 1 日前，將「港版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而成為香港法律，美國參議院提前於 6 月 26 日一致通過《香港自治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再於 7 月 14 日由川普簽署通過。該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得以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大陸及香港政府「官員」及「實體」，內容包括凍結資產、限制入境、甚至「被視為協助侵害」香港自治的企業及金融機構。法案規定，被制裁的企業將被限制商品技術出口、並禁止對美股票、債券等金融證券投資；同時為有關人士處理重大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將被禁止從美國金融機構借貸、參與外匯交易等業務。該法案也要求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 於 90 日內提交制裁名單。大陸全國人大的「港版國安法」和美國參議院的《香港自治法案》都歸納為雙方民意的法律化，在此意義上，這是典型賽局理論的「懦夫博奕」(The Game of Chicken) 的困局。雙方幾已無迴旋空間。

肆、美國大選增強美「中」關係的惡化

美「中」關係這種 L 型的下墜，要回復原狀恐非短時間內能做到，甚至美國做為世界警察與霸主，將大陸打趴使之成為類似俄羅斯者之三流強權，恐怕也是川普心裡的底線思維。當美國積極在對大陸進行軍事壓制與外交圍堵之時，偏偏大陸自身的情勢也不斷地往下滑，包括來自美國在高科技與貿易的制裁所導致的分工鏈的鬆解、斷鏈；不僅如此，先前豬瘟的蔓延、新冠肺炎疫情的封城、澇災大面積與長時間的肆虐，在在導致原已下滑的經濟，雪上加霜。當內外交迫的大陸困境為川普及其五眼聯盟的盟友所識破，自然提供他們結盟圍堵的誘因。

11 月 3 日，美國大選落幕，拜登勝出，但直至 2020 年底，憲政訴訟固屢遭敗仗，川普仍誇言勝券在握。美國政治仍充滿未定，下墜中的美「中」關係仍難止跌。

往前看，即便拜登上任，在共和黨參院席次優勢以及原本兩黨共識的「反中」又被撩到最高點的處境下，惡化的美「中」關係已如沒有回頭的

箭。2020 年是美「中」關係極為惡化的一年，大選前的造勢場合，川普曾說「如果拜登贏了，中國就贏了」，迫使拜登必須更嚴厲地抨擊大陸，稱習近平為「惡棍」而對應大陸須以「強硬手段」。選後，蘭德公司的葛萊斯曼（Grossman）表示，「即便印太戰略出現任何變化，也只是風格而非本質的。」拜登仍會聚焦在印太地區強化與盟國的合作關係，共同遏止大陸勢力的擴張。換言之，今後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大陸仍持續籠罩在「印太戰略」的陰影下。

伍、北京的柔性策略已無力回天

2020 年 11 月 24 日全國人大外事委副主任委員傅瑩投書《紐約時報》，呼籲「『中』美進行平等和坦誠的談判」；「準確判斷對方的意圖」；「即使不可避免競爭也需合作管控，設法發展競合關係」。很明顯，北京企圖將美「中」關係拉回歐巴馬時代對等與雙贏的軌道。只是，美「中」關係恐怕已難回到歐巴馬時代的秩序，畢竟，歐巴馬卸任前兩黨反「中」的共識已逐步形成，而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選戰的激烈、膠著、高潮迭起，「中國議題」已被拉黑，中國共產黨已成公敵。拜登說他的政府不會是「第三任歐巴馬政府」，已做出回應。

12 月 5 日北京再藉傅瑩的文章指出「中」方的兩條紅線是指臺灣與南海問題。北京既劃出底線，也伸出橄欖枝，川普堅信自己已獲勝。以其性喜摔跤看來，勢必以各種方法打到 1 月 19 日才會暫時歇止。他一直強調大陸應為新冠肺炎的傳染負責，大陸在南海島礁上的建物不合國際法，而大陸介入美國選舉的詐欺；這些都是已備好的討伐檄文。以川普有仇必報與不喜歡輸的性格觀之，向大陸討公道應是必然的舉措。果其然，那麼，美「中」關係只會更壞，不會好轉。這樣的美「中」對立氛圍讓未來即使拜登上任，也不敢對大陸驟然讓步，畢竟，對「中」讓步的後果不討好：對內，將犯天下之不諱；對外，將誘使包括澳洲在內的盟友士氣潰散，轉而向大陸叩頭，後續的骨牌效應將嚴重侵蝕美國在印太的領導權與利益，不符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共同願望。而若強硬以對，勢必只能「川（普）規拜（登）隨」，而終成強硬的反「中」政策的執行者。

北京一向主張，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2020 年美國大選期間，民主黨於 8 月 17 日至 20 日的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 2020 年黨綱，刪除「一中政策」，只剩下「恪守臺灣關係法」一詞。2020 年 12 月 12 日國務卿蓬佩奧說，「臺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民主與共和兩黨對臺灣的立場已與北京的「一中」原則脫鉤，再清楚不過。12 月 21 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年度撥款法案，其中包括《臺灣保證法案》，呼籲對臺軍售常態化、支持臺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檢視國務院對臺交往準則，臺美關係再趨緊密。

事實上，兩岸關係的脫鉤並非僅出於政治或經濟因素；疫情也扮演一個自然的障礙因子。自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於 2020 年 2 月 7 日被公開揭露以來，海峽兩岸的航班與人流大幅減少。大陸疫情仍未控制下，迄於 2020 年 12 月下旬，遼寧省再新增 7 例本土確診病例。而另一方面，2020 年 6 月下旬，大陸也在例行針對豬隻監測疫情的報告中，發現豬隻正在流行「G4 EA H1N1」，是 2009 年豬流感大流行的 H1N1 病毒變種。這可豬傳人，可能引發下一波疾病大流行。再加上從 6 月到 9 月為期數月的大陸南方嚴重汛情，以及自春天起雪災不斷的反聖嬰現象、美國對大陸進行貿易與技術制裁而導致經濟衰退、以及大陸對香港與臺灣的文攻武嚇誘使國際強勢介入，北京可說是面臨內憂外患，大陸成為投資者眼中不友善的環境。臺灣在大陸打壓而國際支持的狀況下，料想得到，未來其對外政策與人民的發展，應會逐步往遠離大陸而朝美、加、日、韓、東南亞、澳大利亞或歐洲等方向位移。臺灣在結構上「去中國化」的跡象將越來越明顯，而做為臺灣海峽、第一島鏈的樞紐位置，事關美、日、韓最直接的生命線之安全，也將為利益相關國的嚴重關切。

12 月 25 日，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表示，臺灣的安全是一道紅線，他呼籲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堅定」支持臺灣。可想而知，一旦美、英介入香港或南海問題與大陸衝突時，臺灣所具有的犄角戰略地位，將成為國際反「中」的陣營不可或缺的堡壘，其重要性會越來越受重視。

從「結構」而非「個人」的角度看，當前「反『中』保臺」已是美國兩黨，甚至多數美國人民的共識。同時，此一時彼一時，此刻的美「中」關係的惡化是尼克森時期無法預見的。12 月 13 日在北京舉辦的第 7 屆「兩岸智庫學術論壇」上，大陸學者普遍認為拜登政府一旦上臺，美「中」關係將出

現緩和與改善，是一個新的戰略機遇；北京會希望利用美「中」關係緩和的機會，就臺灣問題進行對話和管控。這很明顯又是北京對臺政策的一次「吹風會」。但這種立於舊典範的政策風向顯然忽視了美「中」爭地盤的零和關係。在利害關係處於零和情勢下，北京既在臺灣與南海問題上劃紅線，又要與美國「就臺灣問題進行對話和管控」，簡直是異想天開。即便拜登上臺，這一態勢仍會延續一段很長的時期，傳瑩所傳達北京對「季辛吉式思維」再現的期待，恐淪於一廂情願。大陸在南海、南太的擴張，以及對第一、二島鏈的突穿已令周邊國家感到憂慮與警惕。美「中」的摩擦加劇，關係惡化呈螺旋式地上升。

陸、習近平的決策風格將臺灣往外越推越遠

回顧 2008 年至 2012 年馬總統執政第一任期和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二者互動過程所建構的兩岸關係形勢，可以說是歷史上最相向而行的：(1) 政治上：胡主張「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馬則接受「九二共識」，主張「一個中國，各自表述」；(2) 經濟上：胡主張「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馬則以開放「三通」直航與簽屬兩岸經貿合作協議配合。(3) 文化上：胡主張「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馬則積極深化兩岸文化交流並做出刪除教科書中的臺獨色彩等動作。(4) 社會上：胡主張「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馬則以「放寬陸生、陸配來臺」、「通盤檢討與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兩會互設辦事處」等積極回應。(5) 外交上：胡主張「維護國家主權，協商對外事務」，馬則以「外交休兵」以及以「與大陸協商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空間」回應。(6) 軍事上：胡主張「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馬則改變過去「境外決戰」為「固守防禦」的消極作為。

上述兩岸關係趨近現象自習近平上臺後，逐漸反向發展，原因固然不能單一歸因於習近平。不過，2013 年接任大陸國家主席以來，大陸崛起與擴張帶來周邊強權的疑慮，卻是促使兩岸對立的張力向上更升一級的主因。北京的不斷進逼讓兩岸幾已到攤牌的地步。2017 年 10 月下旬召開的中共 19 大，除了更進一步強化習近平與黨的權力集中外，也擘劃出大陸 2050 成為世界最強與最富的國家願景，此舉令西方世界深感不安。2018 年 3 月 11

日，習近平透過修憲將國家主席無限期延任，3月27日，川普向大陸發布301條款報告，祭起貿易與科技制裁，自此，大陸與美國，乃至於西方陣營的關係進一步緊張。

柒、親美遠「中」已是臺灣發展的不歸路

身處美「中」對抗風暴的結構化，在美國大選期間，兩岸關係更進一步惡化，而選後一直到12月，臺灣面對大陸的文攻武嚇會仍應接不暇。根據12月12日我國防部的統計，共軍軍機單單在12月上旬已累積9日擾臺的記錄。而12月20日我國防部證實，大陸首艘自製航母「山東號」航母編隊於當天由北往南，通過臺灣海峽前往南海進行遠海長航。共軍海空齊發頻頻出現於臺灣海峽的水域與空域，正好應證了北京12月5日透過傅瑩的投書所劃的「兩條紅線」，也就是臺灣與南海問題。

習近平近來屢在國際及臺灣、香港情勢出現誤判、失策，過激的政策都為其自身引來更大的內部壓力，虛張聲勢或為統一劃大餅將成為其「大內宣」所需。而為了避免進一步刺激香港、臺灣與美國的反「中」情緒持續上升，北京應會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基礎上，依循「一手軟，一手硬」傳統慣性作為不變之下，繼續沿用既有的「單邊主義」思維，既「吸臺入中」又「入臺聯藍」，同時又不會放鬆對臺灣在國際活動場合的外交打壓以及沿岸的軍事騷擾。在北京既有慣性思維不變的狀況下，不難預料，臺灣內部對於安全防護與自主發展的意識會日益增強，而外部美國及周邊自由民主同盟齊力護臺的共識會更提升。在推拉的作用力之下、臺灣已無可避免越來越遠離大陸系統而駛向美國主導的國際航道。

2020 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評析

Comments on the 2020 CPC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李志強 (Li, Chi-Keung)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壹、前言

2020 年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下簡稱「會議」）在 12 月 16 日至 18 日於北京舉行。按照慣例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並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歸納一年來的經濟形勢，部署次年的工作任務，並由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講話中對來年經濟工作做出具體部署並作總結，每年「會議」的內容都透露出翌年的總體經濟政策和發展規劃。2020 年大陸經濟表現深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外部經貿環境也受到疫情蔓延至全球的衝擊，川普把美「中」貿易戰延伸至金融與科技領域，西方社會在疫後籠罩著「反中」情緒，這些因素都牽連到大陸的對外經濟，因此外界相當關注這次「會議」釋放的政策訊息。

貳、2020 年經濟情勢回顧

2020 年大陸經濟可說是內外交困，1 月份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至 2 月初已有超過八十個城市採取程度不一的封城以防止病毒擴散，雖然 3 月初大

部分城市都開始復工，但復工條件極為嚴苛，很多廠區真正的復工率不到六成，生產陷於半停頓狀態，造成第一季 GDP 衰退 6.8%，同時疫情擴散至歐美地區，影響對大陸商品的需求，第一季出口更大幅下降 11.4%（以人民幣計算，下同）。4 月之後各地疫情已經受到控制，不少城市逐步解封以及恢復生產，第二季景氣才走出谷底，GDP 成長 3.2%。第三季延續第二季的反彈走勢，GDP 成長 4.9%，使得前三季 GDP 由衰退轉為正成長 0.7%。由前三季的統計發現，3 月後各種經濟指標的降幅都逐月縮減甚至出現正成長，大陸經濟已領先其他國家呈現 V 型反轉走勢，其中主要還是投資帶動，一是第一季的寬鬆貨幣政策刺激了投資，二是 1 月至 11 月固定資產投資成長 2.6%，其中跟隨政策方向的國有控股企業增長 5.6%，對景氣敏感的民間投資只有 0.21%；分領域看，基礎設施投資只成長 1.0%，房地產開發投資則增長 6.8%；商品房銷售額也上升 7.2%。分產業看，疫情改變了全球民眾的生活型態，不少日常活動都轉為透過網路進行，包括在家工作、線上學習、視訊會議、網路購物等，大舉增加了對各類型電腦以及大螢幕電視等電子商品的需求，上半年科技業的投資及產值都強勁回升。

疫情也導致全球對防疫物資及電子產品需求的大幅增加，大陸 5 月份出口已出現正成長，1 月至 11 月出口金額成長 3.7%，預期出口的強勢至少可維持到 2021 年年中，但內部消費仍相當低迷，1 月至 11 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衰退 4.8%。主要是因為前期疫情衝擊較大，防疫措施的限制人流以及消費信心低落對很多服務業造成很大影響，尤其是旅遊、餐飲和住宿方面的支出下降幅度最大，消費低迷造成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由 1 月的 5.38% 一直下降至 11 月的 -0.5%，為 2009 年 10 月以來首次負成長。

美「中」雙方在 2020 年 1 月達成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但原先美國對大陸進口商品的高關稅並沒有撤除，且川普把戰場伸展至金融和科技領域，不但打壓部分赴美投資陸企如 TikTok 的經營，也封殺大陸手機廠商華為的晶片供應。美國商務部在 5 月 15 日宣布，未來任何半導體製造商只要用到美國的軟體與技術，都必須先取得其許可，才能出貨給華為。此外，川普為了降低對大陸的依賴，決定推動美「中」雙邊產業供應鏈脫鉤。雖然最後拜登贏得了美國總統選舉，估計美國對大陸的政策不會有太大改變，主要是美國認為其霸權已受到大陸的嚴重威脅，拜登上臺後應該仍會走美「中」

經濟脫鉤的大方向。

參、2021 年的八項重點工作

在上述內外經濟環境下，「會議」提出了來年的八項經濟任務，政策方向非常清楚，除了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也顧及到長期的因應策略，不僅是對 2021 年經濟工作的安排，更是為了應付內外環境變化的政策調整和中長期策略部署，重點包括：

- 一、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發揮國家做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以戰略性需求為導向，確定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解決限制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並發揮舉國體制優勢，重要院所高校國家隊也要發揮作用，推動科研力量優化配置和資源分享。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重點布局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
- 二、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構建未來新發展結構的基礎。要統籌推進補齊「短板」和打造「長板」，針對產業薄弱的環節，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打好零組件、技術、關鍵材料等基礎。
- 三、擴大內需為戰略基礎。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基礎，要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各方面進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以促進就業、完善社會保障、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數量等措施擴大消費。提高教育、醫療、養老、育幼等公共服務支出的效率。發展數位經濟，加強此類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擴大製造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推動城鎮老舊社區改造，建設現代物流體系。
- 四、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實施高水準對外開放，推動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深入實施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要放寬市場准入，促進公平競爭，保護智慧財產權，建設統一大市場，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要健全金融機構

治理，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提高上市公司品質。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 五、解決種子和耕地問題。保障糧食安全，落實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和利用，加強種子庫建設。建設國家糧食安全產業帶，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及農田水利建設。提高糧食和重要農副產品的供給能力。
- 六、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國家支援平臺企業創新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支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時依法規範發展，健全數位規則。完善平臺企業壟斷認定、資料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範。加強規制，提升監管能力，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
- 七、解決大城市住房問題。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並舉，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重視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加快完善長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購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務上具有同等權利，規範發展長租房市場。土地供應要向租賃住房建設傾斜，單列租賃住房用地計畫，探討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和企事業單位自有閒置土地建設租賃住房。降低租賃住房稅費負擔，整頓租賃市場秩序，規範市場行為，對租金水準進行合理調控。
- 八、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 2030 年前達到峰值，2060 年前完成碳中和。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加快調整改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發展新能源，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

肆、重點工作的背後意涵

以上的重點工作主軸在強調自主與安全，有了經濟自主才能確保經濟安全。從外在環境來看，美「中」經濟對抗已經長期化，為降低對美國技術和產業標準的依賴，大陸必須「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與美國相比，大陸科技產業大而不強，在許多尖端技術方面仍然落後，例如積體電路，因此在「十四五規劃」期間計劃投資 10 兆

元（人民幣，下同）發展半導體。另外在專利轉化率、高科技企業附加價值、科技人力資源密度等指標來看，大陸與美國也有很大差距。推動科技創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和數位化發展，成為大陸下一階段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助力。「解決種子和耕地問題」也是同樣的自主概念，內部糧食自給自足才可保障糧食安全，降低對進口糧食的依賴。

為了確保經濟自主，擴大內需成為「十四五規劃」中科技自主以外的發展路線，一方面是疫情下大陸內部消費呈現大幅衰退，需求不足成為當前嚴重問題，但消費市場仍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因此改革焦點從供給側轉成需求側。另一方面，疫情嚴重影響歐美民眾的消費支出，未來大陸出口仍充滿變數，加上疫情使大陸和西方國家關係急劇下墜，所以需求側改革成為大陸擴大內需的切入點。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簡稱雙循環）的發展策略，「會議」只是進一步闡述相關做法。

針對美國的產業去中化和脫鈎政策，「會議」提出了「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做為因應措施。大陸已成為 2020 年 11 月 15 日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主要成員，充分掌握在亞太地區的經貿話語權，由於美國不在 CPTPP 內，能加入 CPTPP 可以進一步開拓美國以外的美洲市場，提升大陸在國際經貿組織的地位，降低對美國在外貿上的依賴。此外，為了貫徹雙循環策略，尤其要加強「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實施進口替代是必要的做法，要吸引內外資增加投資，必須降低內需市場體制上的障礙，包括改善經營環境、保障公平競爭、減少准入限制、保護智財權等，爭取跨國企業把產業鏈甚至研發中心遷到大陸。

除了需求側改革外，「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也是歷年「會議」首次出現的經濟任務，雖然主要針對螞蟻金服提出，但其實也和金融安全有關。疫情衝擊導致大陸家庭部門和企業急需資金，已穩定三年的負債比（債務/GDP）大幅從 2019 第四季的 257.6% 上升至 2020 第二季 280.3%。2020 年上半年，螞蟻金服的微型貸款總量占大陸短期貸款的 25%，信貸規模高達 2.15 兆元，影響力不亞於大型銀行，但其自有資本只有約 2% 左右。信貸資金來源之一是本身發行債券，吸收資本以後再貸出去，利差超過 10%，遠高於銀行的 3%；二是來自銀行體系，螞蟻金服平臺撮合了銀行與

民眾或民企的借貸業務，因為貸款利率高達約 15%，銀行在高利潤下很願意把資金貸給民間，但此類民間借貸坐大之後，會影響到國企要從銀行貸款的資金來源，損害到原有的國家金融體制，且如果疫情持續更久，民間微小企業可能因而倒債，螞蟻金服在財務方面或會出現資金斷鏈，為及早防範金融危機爆發，大陸必須加強金融科技方面的監管。因此「會議」特別要求整頓這類借貸平臺，而且螞蟻金服充分利用支付寶的信用機制和使用者資訊才得以壯大，所以「會議」也強調未來要規範資料收集的使用管理等。

「會議」也提到要「解決大城市住房問題」，2020 年在貨幣寬鬆的政策下，部分大城市如深圳等房價明顯上漲，住房供不應求進一步惡化，壓抑人口移入，不利於城市發展。此外，近年租房平臺迅速興起，通常平臺會一次性向租客收取長期租金，然後利用資金進一步尋找與裝修其他房源，不斷擴大自己的市場，再以單月付費方式向房東付款，但在疫情衝擊下這種商業模式出現了危機，比如景氣不好找不到新租客付長期租金，平臺的資金鏈就會出現問題，因此要將解決大城市住房問題提升到重要戰略地位。

氣候協定是大陸與美國、西方國家屈指可數的共同利益，也是大陸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舞臺。「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不僅是為了本身生態環境而推動與發展的任務，而且可實踐對國際的承諾，嘗試與美國爭奪氣候問題的主導權，提升大陸的國際信用和地位。

伍、2021 年總體經濟政策走向

2020 年初疫情爆發後，大陸推出了許多超常規的救助與經濟紓困政策，這些政策是否還會延續為各界所關注。若政策退場太快，可能會抑制經濟復甦的力度。「會議」指出 2021 年總體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並在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且保持總體負債率穩定，可見大陸認為還沒有到要政策退場的時候。不過，至 12 月 10 日，債券市場發行的各類債券達 54.7 兆元，大幅成長 27.8%，顯示債務上升過快，2020 年財政赤字率（財政赤字/GDP）已達到 6% 的歷史高點，持續攀升的可能性不大。加上去年地方債額度急劇成長後，後續大幅增長的空間有限，且已引起大陸中央的重視，要求

「抓實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預估 2021 年的財政政策和上年相較會比較偏緊。

在貨幣政策方面，去年第一季大陸央行使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穩定經濟和幫助重點企業和小微企業渡過難關，包括再貸款再貼現，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引導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下跌等。其中三次降低存款準備率共釋放約 1.7 兆元，另增加 5,000 億元再貸款再貼現額度以支持重點企業，這些強力貨幣政策在第二季開始已經發揮效果，即使下半年政策略為收緊，11 月份 M1 增速仍高達 10%，顯示流動性依然很寬鬆。但是從個體來看，很多企業資金仍然緊俏，例如 11 月大陸半導體國家隊清華紫光集團一筆 13 億元債券違約。因此「會議」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精準表示政策操作會持續直接對企業提供支援，例如之前推出的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畫等，合理適度指市場流動性水準要充足。在 11 月 CPI 轉為負值，已不存在通膨壓力的情況下，央行將會轉向預防性的工作，例如多在金融監管以及防風險上著墨，短期內升息或調高存款準備率的機會不大。

日韓經貿摩擦： 以 GSOMIA 為中心的分析

Japan–South Korea Trade Dispute: An Analysis Centered on GSOMIA

郭永興 (Guo, Yung-Hsing)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與經營系教授

摘要

近來美「中」貿易戰引起全球關注，然而此貿易戰不單純只是兩國間的貿易磨擦問題，而是美「中」科技霸權，甚至是全球領導霸權爭奪過程中的一環。在美「中」霸權爭奪過程中，美國需要穩定自身盟邦，而在太平洋上，美日韓同盟是美國重要的盟友體系。但是這盟友體系卻可能因為 2019 年 7 月開始的日韓貿易摩擦而崩解。本文說明日韓貿易摩擦的起因與發生經過，並且分析此貿易摩擦，如何影響《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 的持續與否，進而動搖美日韓同盟的戰略關係。本文也將說明美國如何介入，並說服韓國暫時停留在 GSOMIA。但這個結果也暗示，未來日韓關係的穩定，將會影響 GSOMIA 的延續與否。

關鍵詞：美國、日本、韓國、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貿易戰爭

Abstract

China-US trade continues to attract enormous attention globally; however, the trade war is not simply a trade dispute. It is part of the ra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oth countries are competing for the advantages of superior technology and global leadership. In this competition, the US has to maintain stable alliances with its partners. In the east Pacific region, the US-Japan-Korea Allianc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However, the Japan-South Korea trade dispute since 2019 might have undermined the Alliance. This paper first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Japan-South Korea trade dispute,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how the dispute is influencing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 and even the tripartite US-Japan-Korea Alliance. This paper also explains how the US intervenes in the dispute and tries to convince South Korea to temporarily stay in the GSOMIA.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future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remains crucial for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GSOMIA.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Japan, Korea,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Trade War

壹、前言

2018 年美「中」之間，除了開始對大範圍商品採取報復關稅的貿易戰以外，美國政府也對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特定科技企業採取了封殺式的「新冷戰」。¹ 雖然新冷戰這種說法，還沒有明確的學術定義，但是美國的媒體已經如此描述，例如《紐約時報》就認為，美國副總統彭斯 2018 年 10 月 4 日在美國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長篇演說，就是美「中」之間進入冷戰的前兆。² 而在這演說中彭斯日如此描繪大陸企業對美國的威脅：³

現在，通過「中國製造 2025」，中國共產黨試圖控制全世界 90% 的最先進的工業，包括機器人、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為了贏得 21 世紀經濟的領導權，北京指導其工業官員和商界以任何方式獲取美國的知識產權。這是我們經濟領導力的基石。北京現在要求很多想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交出他們的商業秘密，也要求並支持對美國公司的併購，以獲取他們的創意。最可怕的是，中國的安全機構掌握了大量竊取美國科技的能力—包括最先進的軍事技術。使用這些偷竊的技術，中國正大規模地化犁為劍……

從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理解，美國認為大陸正透過竊取美國的科技、甚至是軍事技術來成就「中國製造 2025」，發展先進技術，奪取美國的經濟霸

¹ 美國針對大陸科技公司的封殺，最明顯的例子是 2018 年 8 月川普總統簽署成立的《2019 年版的國防授權法》，明訂 2019 年 8 月以後，美國所有的政府機構都禁止採用華為、中興、「海能達通信」、「杭州海康威視數位技術」、「浙江大華技術」這五家大陸企業的通訊與影像監視系統。之後 2018 年 12 月加拿大政府在美國司法單位的請求下，在溫哥華機場逮捕華為高層，也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女兒的孟晚舟。2019 年 5 月起，美國政府規定美國公司若是沒有政府的許可證，不能出口科技產品給華為公司。此外，美國也持續要求其盟國不要使用華為的 5G 系統。Financial Times, “Huawei shrugs off US sanctions as sales grow 18%” (December 31, 2019), visited date: June 30, 2020,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1665bc74-2b0f-11ea-a126-99756bd8f45e>.

² “Pence’ s China Speech Seen as Portent of ‘New Cold War’ ” (October 5, 2018), visited date: June 30, 2020,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05/world/asia/pence-china-speech-cold-war.html>.

³ 「美副總統彭斯演講全文 大力批中國、挺台灣」(2018 年 10 月 5 日)，2020 年 5 月 29 日下載，《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71416>。

權。而美國為了保護國家利益，將會對大陸採取行動，以保障國家安全，不讓大陸掠奪美國的科技能力。

因此我們認為美「中」貿易戰，不單純只是兩國間的貿易磨擦問題，而是美「中」科技霸權，甚至是全球領導霸權爭奪過程中的一環。在美「中」霸權爭奪過程中，美國需要穩定自身盟邦，而在西太平洋上，美日韓同盟是美國重要的盟友體系。但是這盟友體系卻可能因為 2019 年 7 月開始的日韓貿易摩擦而崩解。例如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的亞太策略專家史考特·哈羅德（Scott W. Harold），在韓國宣布退出《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之後，也就是日韓貿易摩擦影響美日韓同盟最嚴重的 2019 年 9 月就為文指出，如果美國無法調停日韓之間的爭議，讓韓國願意重回 GSOMIA，日韓之間的決裂，將影響美國印太戰略中的對大陸方針，亦即是難以槓桿（Leverage）盟友之力與大陸進行霸權競爭。⁴

本文對於臺灣學術界，可貢獻於填補國內學界對於日韓兩國關係，⁵ 或者美日韓三國關係相關文獻的缺乏。由於國內韓國研究本來就不興盛，雖然有一些著眼北韓局勢與大陸因素的美韓關係研究論文，⁶ 要找到有韓國觀點

⁴ Harold, Scott W., "South Korea – Japan Tensions Complicate U.S. Efforts to Leverage Allies in Competition with China" (September 17, 2019), visited date: June 30, 2020, 《Institut Montaigne》,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blog/south-korea-japan-tensions-complicate-us-efforts-leverage-allies-competition-china>.

⁵ 國內關於日韓關係的研究較少，不過有不少學者專家關注到日韓之間竹島（日本名）/獨島（韓國名）爭議：趙國材，「論日、韓關於竹島之法律爭端」，《臺灣海洋法學報》，7 卷 1 期（2008 年 6 月），頁 1-29；許金彥，「日、韓『獨島爭議』研究」，《亞太研究通訊》，第 7 期（2009 年 7 月），頁 151-178；劉坤禮，「促成中日韓 F T A 談判的戰略分析與離島主權爭議的影響」，《中華行政學報》，第 10 期（2012 年 6 月），頁 201-219；荊元宙，「日本與南韓有關獨島問題爭議之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13 期（2006 年 5 月），頁 24-27；王冠雄，「韓、日專屬經濟海域主張爭端之分析：以獨島為觀察」，《戰略安全研析》，第 15 期（2006 年 7 月），頁 33-36。

⁶ 例如，楊雯婷（2019）的文章主要討論美韓在北韓問題上的態度不一致問題。此外，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飛彈所引發美「中」、韓國角力問題，也引發不少專家學者的討論，例如林宗達（2016）、黃柏欽（2016）、劉德海（2016）。楊雯婷，「川金二會及美日韓對朝政策分歧」，《戰略安全研析》，第 154 期（2019 年 2 月），頁 46-56；林宗達，「美韓部署『戰區高空區域防禦』與臺海安全」，《國際軍務》，第 7 期（2016 年 7 月），頁 86-95；黃柏欽，「美韓『薩德系統』部署對俄羅斯戰略安全之影響及其因應作為研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135 期（2016 年 7 月），頁 58-67；劉德海，「美韓部署薩德飛彈影響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25-31。

的日韓關係的文獻是不太容易。⁷ 而就日本研究的角度，雖然國內日本研究較為盛行，但是主要的研究都是美日關係，或者是日「中」關係。⁸ 相較之下，日韓以及歐美的學術界，就有相當多的研究著重於日韓關係。⁹ 因此本文章以 2019 年日韓 GSOMIA 爭議來討論日韓貿易衝突，將可以補缺國內日韓研究文獻的不足。

本文首先分析近年來在美「中」兩強對抗的構圖下，日韓兩國的基本戰略選擇。接下來的第三節到第五節中，將說明日韓貿易摩擦的起因與發生經過，並且分析此貿易摩擦，如何影響 GSOMIA 的持續與否，進而動搖美日

⁷ 例如，國內韓國研究主要的發表園地《韓國學報》，從 2010 年創刊，但是該刊出版不穩定，有時一年出刊四次（如 2018 年），有時一年只出刊一次（如 2016 年）。本文以「日本」為關鍵字，搜尋該刊在「華藝線上圖書館」的資料庫（2020 年 2 月 15 日搜尋），沒有找到任何一篇中文論文，是討論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韓關係。

⁸ 例如：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 4 月），頁 43 - 64；何思慎、楊雯婷、陳舜仁，「為何日本無法追求樞紐位置：美、中東亞角力的政策選擇」，《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7 卷 4 期（2016 年 10 月），頁 43-98；蔡增家，「當同盟不再漂流：安倍再次上台後美日關係之轉變」，《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5 期（2017 年 3 月），頁 25-40；林賢參、郭永興，「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與對象國的反擊策略：中日稀土衝突為例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60 卷 4 期（2017 年 12 月），頁 53-81；何思慎，「雨過天晴乎：日中關係新發展」，《戰略安全研析》，第 150 期（2018 年 6 月），頁 9-19；陳亮智、劉兆隆，「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的政策選擇分析：以美國對『日本崛起』與『中國崛起』之回應為例」，《問題與研究》，58 卷 1 期（2019 年 3 月），頁 89-142。

⁹ 例如日文文獻有：西野純也，「盧武鉉政權期の日韓関係：韓国の新しい秩序認識の台頭」，《法學研究》，92 卷 1 号（2019 年 1 月），頁 97-116；東郷和彦，「竹島・独島問題と日韓関係：日本の視点」，《產大法學》，50 卷 1・2 号（2017 年 1 月），頁 373-387；奥田聰、渡邊雄一，「2018 年の韓国：南北融和の進展と日韓関係の悪化」，《アジア動向年報》，2019 卷（2019 年 10 月），頁 39-68；金栄鎬，「日韓関係における安全保障と歴史問題：同盟のジレンマと移行期正義の視点から」，《広島國際研究》，第 24 卷（2018 年 11 月），頁 1-24。英文文獻有：Ji Young Kim,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factors: the history problem and the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5, No. 3 (September, 2015), pp. 477-503; Young-June Park, "South Korea's Diplomacy and the Evolution of Kore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1965-2015," *Seoul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2, No. 1 (August, 2016), pp. 109-137; Ryo Hinata-Yamaguchi,

"Completing the US-Japan-Korea Alliance Triangle: Prospects and Issues in Japan-Korea Security Cooperation,"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8, No. 3 (September, 2016), pp. 383-402; JaHyun Chun & Daeun Choi, "Japan's Foreign Policy on Postwar Issues Relating to South Korea," *Pacific Focus*, Vol. 33, No. 03 (December, 2018), pp. 455-477; Yanghyeon Jo & Peng Er Lam, "South Korea-Japan Relations in the 2010s: Ambivalent Strategic and Economic Partners?" *East Asian Policy*, Vol. 11, No. 03 (July & September, 2019), pp. 39-49; Taku Tamaki, "It takes two to Tango: the difficult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as clash of realitie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01 (March, 2020), pp. 1-18.

韓同盟的戰略關係。在第六節的結論，我們將討論日韓經貿僵局的未來走向，以及今後美日韓同盟的發展。

貳、美「中」兩強間日韓的戰略選擇

日韓兩國自二次世界大戰與韓戰後，就駐紮大量美軍，傳統上是美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軍事盟友與武力部署重點。然而過去十年間，日韓兩國也並非對美國是完全順從，尤其是隨著大陸實力崛起，日韓國內都出現了要重視大陸的政治聲音，例如 2009 年日本眾議院大選，傾左派的民主黨取得政權，選前民主黨公布選舉之選舉公約（マニフェスト），就表明要建立「緊密對等的日美關係」，以及「強化亞洲外交以建構東亞共同體」，顯示民主黨與保守派自民黨長期以來的完全親美外交，採取不同的態度。事實上，選後的民主黨鳩山由紀夫內閣，在有關沖繩的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上，態度舉棋不定，說法反覆，就實際傷害到美日兩國的信賴關係，導致美方兩次拒絕安排歐巴馬與鳩山之正式會談。¹⁰

2012 年自民黨奪為政權，安倍晉三內閣上臺後開始將對外政策拉回美日同盟中心，並試圖將民主黨的外交殘局轉化為國防改革與對美關係的契機，以重新取回日本外交策略的主動性。安倍一方面除了強化國防改革與美日同盟，同時也推動「地球儀外交」，將日本重新帶回國際舞臺，以營造與中、韓交涉時，較有利的談判環境與籌碼。並且安倍政府在 2014 年以改變憲法解釋的方式，確立日本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進一步深化美日同盟與軍事合作關係。¹¹

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川普總統在上任後強調美國優先主義，但是在 2017 年 2 月 10 日在華盛頓與安倍首相的高峰會中，雙方再度確認了釣魚

¹⁰ 林賢參，「沖繩普天間美軍基地問題與日美同盟」，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7 期（2010 年 7 月），頁 108-118。

¹¹ 細谷雄一，「集団的自衛権と日米同盟—同盟はどのように強化されるのか？」（2015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5 月 20 日下載，《USJI Voice》，<http://www.us-jpri.org/voice/voice8.pdf>。

臺群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美國對日本有防衛義務）。¹² 因此，雖然美國川普總統在貿易議題上，對日本有諸多意見，但是在安全保障上，美日兩國在西太平洋共同合作圍堵大陸的緊密戰略夥伴關係，並沒有任何改變。

相較於美日聯盟將大陸視為共同的外在威脅，美韓聯盟就顯得步調不一致。對韓國而言，美韓聯盟的主要意義在於面對北韓的軍事威脅，韓國對於美國傾向將美韓聯盟的對應對象擴充到大陸與南海問題，則是意興闌珊。因為大陸不僅是韓國的最大貿易夥伴，同時考慮到大陸對於北韓的影響力，韓國也必須倚賴大陸的力量來處理北韓問題。¹³ 在此背景下，韓國政府就算是相對親美的保守派政黨執政，也是呈現搖擺在美「中」之間的狀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保守派政權朴槿惠總統在 2015 年 9 月 3 日，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到北京出席中國大陸抗戰勝利 70 週年活動，與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丁在天安門城樓一起出席閱兵儀式。而一個多月之後的 10 月 16 日，朴槿惠又到華盛頓白宮拜會歐巴馬總統，在共同記者會上表述，韓國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核心伙伴。¹⁴

然而朴槿惠政權想要在美「中」之間兩面討好的策略，卻因為美韓兩國於 2016 年 7 月部宣布署薩德導彈防衛系統（THAAD）而惡化。由於薩德的雷達觀測範圍為 1,500 公里，涵蓋到大陸本土，使大陸往東邊發射的導彈活動一覽無遺地受到監控，因此大陸對南韓部署薩德表示強烈反對，並且在韓國部屬後，透過經濟層面實施報復措施。儘管南韓同意美軍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表面上是說為應對北韓的導彈，但實際上則是美國著眼於其亞太戰略利益，而對南韓長期誘導與大力推動的結果，其結果是南韓深受與大陸外交關係破裂，以及經濟報復之苦。¹⁵

¹² 「日米首脳会談『共同声明』の要旨」(2017 年 2 月 11 日)，2020 年 6 月 10 日下載，《朝日新聞》，<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K2C1DRGK2BUTFK020.html>。

¹³ 李炯喆，「米韓同盟と東アジア関係」，東アジア評論，第 10 号（2018 年 3 月），頁 3-15。

¹⁴ 「落ちぶれた韓国の均衡外交…米日同盟の『下位パートナー』に転落」(2016 年 2 月 22 日)，2020 年 5 月 15 日下載，《韓民族日報日文版》，<http://japan.hani.co.kr/arti/politics/23391.html>。

¹⁵ 陳蒿堯，「中韓針對薩德部署爭議分析」，國防雜誌，第 32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頁 53-76。

2017 年 5 月立場偏左的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文在寅贏得韓國總統大選，他上任後亟欲改善韓「中」關係。而在戰略選擇上，文在寅想恢復與大陸緊密的經貿關係，恐怕必須撤除薩德的部署。但相對的，文在寅想為維持穩定的美韓同盟關係，則需讓薩德繼續建置，此舉必然無法獲得大陸經貿合作的紅利。¹⁶ 在此結構性困境下，2017 年 11 月 22 日南韓外長康京和在北京與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談。雙方達成協議，韓國做出「三不限」的承諾：韓國承諾不追加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不發展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及有限制地使用薩德系統。在此之後，韓「中」之間關係逐漸回暖。¹⁷

綜合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瞭解，近年來日本與韓國在面對美「中」兩強時，不同的戰略思考。雖然日本與韓國都希望與大陸維持良好經濟關係，但是日本因為跟大陸有釣魚臺群島的爭議，也不認同大陸的南海主權宣示，因此在安全保障上，確定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但是南韓在安全保障上並沒有跟大陸有重大議題的直接衝突，並且希望以大陸之力箝制北韓，因此會比日本更顧慮到大陸的國家利益，其結果就是搖擺於美「中」之間的外交態度。

參、日韓貿易摩擦發生原因與過程

一、日韓貿易摩擦的起端

2019 年 7 月 4 日開始日韓貿易戰正式開打，日本對於出口到韓國的關鍵科技材料加強管制。¹⁸ 貿易戰開打之初，對韓國政界與產業界投下非常大的震撼。因為日本政府如果嚴格執行管制措施，短期內就可能讓韓國科技產品，如 OLED 面板、半導體因為缺料而停產，對韓國經濟造成致命性打

¹⁶ 胡敏遠，「薩德系統的『建』或『撤』對南韓國家安全的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1 卷第 6 期（2017 年 12 月），頁 97-107。

¹⁷ 「薩德問題暫封存 中韓關係回暖 文在寅訪華」（2017 年 12 月 13 日），2020 年 6 月 1 日下載，《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2/12/n9950569.htm>。

¹⁸ 「日韓貿易摩擦起端」此章節的主要內容是參照本人在 2019 年 7 月初為《經濟日報》所寫的社論。「日韓貿易戰 看見台灣機會」（2019 年 7 月 7 日），2020 年 7 月 1 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915519>。

擊。韓國第一大報朝鮮日報的社論當時說，這是「(美國對)華為制裁 10 倍的衝擊」。

日本對韓國的出口管制，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7 月開始，聚醯亞胺 (Fluorine Polyimide)、光阻劑 (resists)、氟化氫 (hydrogen fluoride) 三大關鍵電子材料，過去日商出口到韓國，只要第一次出貨通過審查，三年內同一企業免審查；新管制方式下，則是每次出貨都要歷經一次可能長達 90 天的審查。

用於 OLED 面板、半導體的聚醯亞胺、光阻劑、氟化氫，韓國極度依賴日本，從日本進口的比例高達 93.7%、91.9% 與 43.9%，如果韓國想要從其他國家尋找替代來源，也是非常困難，因為這三項原材料，日本占全球生產的七成到九成。

當初制裁方式出來，臺灣輿論非常關心日韓貿易戰對於全球經濟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必且關注日本政府會如何操作管制措施。舉例來說，這三項原材料在 2019 年七月初時三星電子與 SK 海力士手上大約有一個月的庫存，七月初開始管制出口的結果，如果經產省嚴格審查手續，那可能要到十月初才會有第一批通過審查的貨出口。庫存只剩一個月，下次日商出口要等三個月後，意味著三星電子與 SK 海力士可能要停工兩個月。

由於 2019 年的 DRAM 半導體的市況不好，三星電子與 SK 海力士手上記憶體的庫存有三到四個月，因此就算停工兩個月，世界市場的記憶體供貨也不至於會斷貨。但是如果日本經產省讓管制變成實質上的減運或禁運，那韓國的電子產業，恐怕會奄奄一息。

日本第一階段的管制，已經讓韓國從電子巨頭企業到總統府，人人焦頭爛額，而第二階段的管制更恐怖。第二階段是從八月之後，讓韓國從白色國家名單中移除。¹⁹ 一般而言，日本政府將國安友好國家列為白色國家

¹⁹ 日本政府在 8 月初就將白色國家名單改名為 A 集團（グループ A）國家名單，非白色國家名單區分成集團 B、C、D 等三種國家名單。韓國被移除白色國家名單後，在新制中被分類到集團 B（グループ B）國家。本文為了方便討論，A 集團國家也統稱為舊制的白色國家名單。「『ホワイト国』→『グループ A』に 経産省が名称変更」(2019 年 8 月 2 日)，2020 年 6 月 12 日下載，《日本經濟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L02HMW_S9A800C1000000/。

(White Countries) 名單，除了特別限制產品外，企業可以自由出口。一旦韓國脫離白色國家名單，經產省隨時可以國安為理由，指定產品進行最長 90 天的出口審查。簡單來說，讓韓國從白色國家名單中移除後，除了上述三項關鍵原料外，日本政府可以隨時指定產品（化工、電子零件、工具機等），以嚴格審查為名進行實質的出口控管。

二、日韓貿易摩擦的原因與日方的施壓重點

日韓貿易戰起端於二戰期間日本對韓徵用工的賠償問題，日本主張 1965 年簽訂日韓請求權協定時，日本已經一次付清賠款。事實上，過去韓國政府也支持日本政府的說法，並且韓最高法院也技巧性拖延徵用工的法院訴訟。但是文在寅上任後，對此議題態度強硬，甚至對拖延審判的最高法院法官發出逮捕令。

文在寅政權的對日強硬態度下，2018 年韓最高法院判決「新日本製鐵」敗訴，賠款提告者每人約一千萬日幣。²⁰ 2019 年韓方律師成功扣押新日本製鐵在韓資產。韓方律師下一步就是要變賣扣押資產，兌換現金給徵用工。一旦扣押資產被變賣，會對日商造成無法逆轉的實質性傷害，而這超過日本政府的底線。因此在變賣手續的前夕，日本政府發動了出口管制。

2019 年 9 月初日本內閣決議將韓國排除於白色國家名單之外。韓國脫離名單之後，有上千項戰略性零件・成品（含括半導體、汽車、機械業等），今後從日本出口到韓國都可能需經濟產業省個別審查。²¹

韓國為了抵制日本，七月起就到 WTO 的一般理事會去控訴日本的不合理。然而日本政府的出口管制，並非是歧視韓國的不公平貿易措施，只是取消過去優惠，讓韓國變成與臺灣一般的待遇。因此韓國 7 月極力在 WTO 道德控訴日本，並沒有得到 WTO 的任何實質支援。

²⁰ 「新日本製鐵」訴訟起因於二次大戰期間四名被動員到日本境內的日本製鐵工廠工作的南韓人，2005 年在韓國向「新日本製鐵」提出賠償訴訟。「韓国最高裁 新日鉄に 4 千万円賠償命じる＝徵用工訴訟で原告の勝訴確定」(2018 年 10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2 日下載，《聯合ニュース》，<https://jp.yna.co.kr/view/AJP20181030002400882>。

²¹ 「ホワイト国除外」閣議決定迫る 韓国 EV などターゲットに輸出規制か」(2019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下載，《聯合ニュース》，<https://jp.yna.co.kr/view/AJP20190730001100882>。

日韓貿易戰的關鍵點，在於徵用工訴訟被告的日商，其被扣押資產是否會被變賣，造成無法逆轉的實質傷害。如果發生，日本政府就有可能刁難審查，讓出口管制變成實質禁運。到時候韓國到 WTO 控訴才會師出有門。因為 WTO 的爭端處理，初審加上複審最快也要一到兩年，等結果出來，韓國產業界恐已半死不活。

日本在貿易戰中，對韓國電子產業的威脅，並非是要毀掉韓國電子業現在的生產，因為韓國電子業如果產量開不出來，會直接影響日本材料供應商的業績。日本政府的管制戰略，是要毀掉韓國電子業的未來。

以關鍵零組件光阻劑來說，日本對於韓國電子業的主力產品，DRAM、NAND Flash 等記憶體生產所需的光阻劑並沒有列入管制名單。列入管制的是 7 奈米極紫外光 EUV 製程用光阻劑。²²

三星電子在 2019 年 4 月宣布「半導體 Vision 2030」，要在 2030 年前投資 133 兆韓圓，擊敗台積電成為系統半導體的王者。²³ 用於系統半導體生產的最先進製程 7 奈米 EUV，全球在 2019 年也只有台積電進入量產，三星在京畿道華城市的新廠 2019 年底完工，2020 年導入 7 奈米 EUV 生產線。²⁴ 這樣的關鍵時刻，日本管制關鍵零組件，意味著以後三星可能買不到生產用光阻劑，如此一來，以後全球的企業就會猶豫找三星代工 7 奈米。至此，三星的龐大投資恐成為無產量的財務黑洞，三星可能被迫退出晶圓代工的先進製程競賽。

日本政府的管制措施，恐讓三星電子受重傷，拖慢其在晶圓代工製程發展的進度。然而，善於以金錢操控國政的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還因此入獄過），應該是不會坐以待斃。所以日韓貿易戰中的日本施壓，也有日本施

²² 「対韓輸出管理を強化 半導体材料メーカーが拭えない『不安』」(2019 年 7 月 5 日)，2020 年 9 月 1 日下載，《ニュースイッチ》，<https://newsswitch.jp/p/18303>。

²³ 「サムスントップが半導体研究所を訪問『危機状況』強調」(2020 年 6 月 19 日)，2020 年 9 月 1 日下載，《聯合ニュース》，<https://jp.yna.co.kr/view/AJP20200619002800882>。

²⁴ 「三星新 EUV 生產線開始量產，首批 7 奈米晶片 Q1 出貨」(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6 月 10 日下載，《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2020/02/20/samsung-electronics-begins-mass-production-at-new-euv-manufacturing-line/>。

壓韓國企業界，希望韓國企業界幫忙處理日韓僵局的意味。²⁵

肆、日韓貿易摩擦下韓國的反擊措施

2019 年 7 月開始的日韓貿易摩擦，最先出現影響的是，韓國輿論出現了反日情緒。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雖然日韓貿易摩擦發生之後，韓國的政治人物有操作拒買日貨的政治演出，但是韓國輿論對於政府機構過度操作反日情緒還是保持一定的理性態度，而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擔心日本遊客不來韓國觀光。舉例來說，首爾市中心的中區在 8 月 6 日，在區長徐良鎬指示下，在明洞等觀光地區，立起上千支寫有「抵制日本」的旗幟，不過在「對日本觀光客失禮」等批判下，這些反日旗幟，立起數小時後就被撤下。²⁶

雖然韓國輿論保持一定程度理性，不至於讓反日情緒，成為全面性的仇日社會風氣。但是民間自發的拒買日貨、不到日本旅遊等經濟抵制，立刻在 7 月出現了效果。日本汽車在韓國市場從 2014 年之後銷售量就年年增加，但受到日韓貿易摩擦影響，日車在 2019 年 7 月銷售量為 2,674 臺，比去年同期減少 17.2%，八月只剩下去年同期的 56.9%，到了九月只剩下去年銷售量的 1/3。同樣的，日本出口到韓國的啤酒與香菸等民生消費品也從 7 月開始，看到非常明顯的銷售停滯。

日本的觀光業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據統計 2019 年 7 月與 8 月這兩個月到日本觀光的韓國人約為 87 萬人，比去年同期的約 120 萬人，減少了 27.6%。而光 8 月一個月就比去年同期減少了 48%。²⁷ 並且韓國觀光客減少，對於以韓國觀光客為大宗的九州地方城市，例如鹿兒島、宮崎、大分帶

²⁵ 「日韓貿易摩擦的原因與日方的施壓重點」此章節的主要內容是參照本人在 2019 年 8 月初為經濟日報所寫的社論。「國際貿易戰升級 內行看門道」(2019 年 8 月 2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967001>。

²⁶ 「韓國『官製反日』に国民が『NO』自治体トップらに批判」(2019 年 8 月 7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產經新聞》，<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90807/wor1908070024-n1.html>。

²⁷ 辻真一，「『日韓貿易摩擦』から 100 日 ダメージは韓国より日本のほうが大きい？」(2019 年 10 月 11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Yahoo Japan News／辻真一のコリア・レポート》，<https://news.yahoo.co.jp/byline/pyonjiniru/20191011-00146341/>。

來了很大的壓力。以韓國與九州之間的對馬島為例，對馬島人口只有約 3 萬人，但在 2018 年卻有約 54 萬人的觀光客來訪，是該島重要的經濟支柱，來該島的觀光客中約有 3/4 的 41 萬人是來自韓國。日韓貿易摩擦之後，該島的韓國觀光客大量減少，島上旅館的住宿旅客在 2019 年 7 月比去年同期減少五到九成。²⁸

在 8 月初日本內閣決議將韓國移出白色國家名單，韓國立即做出了反應。韓國在八月就放話也要將日本剔除出韓國版本的白色國家名單。南韓產業通商資源部在 9 月 18 日公告，日本正式被排除在名單之外，此後南韓出口部分戰略物品到日本時，接受的審核將比其他名列名單內的 28 個國家更嚴格。日本未被除名前，南韓企業輸往日本的戰略物品審批流程約只需要 5 天，除名後改為逐案審核，作業時程將會遠超過 5 天，需要遞交的文件也由原來的 3 份增為 5 份。²⁹ 然而，韓國媒體也分析，韓國將日本排除在白色國家名單之外，其實實質意義不大。以 2019 年上半年為例，日本從韓國進口只占所有進口商品的 4.1%，與大陸（23.2%）、美國（11.1%）、澳洲（6.4%）相比，韓國所占比例不高。再者，日本從韓國進口商品的八成以上，都是通用的石油化學、鋼鐵製品，可替代性高。這跟韓國依賴從日本進口難以替代關鍵零組件，有很大的差別。³⁰

除了將日本排除在韓國版白色國家名單之外，韓國也在九月中旬正式向 WTO 提出控告。然而根據 WTO 的貿易爭議訴訟過程，韓國必須先與日本進行兩國協商，兩國協商若是沒有達成解決方案，才可以進到下一階段，亦即是將雙方爭議送到紛爭處理小委員會進行仲裁。然而就算進入 WTO 訴訟程序，完成初審與複審，最快也要一到兩年，³¹ 實際是無法對日本造成立即的壓力。

²⁸ 「韓国人観光客激減で対馬の観光に打撃深刻 閑古鳥にも『静かさ取り戻した』の声」（2019 年 9 月 11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產經新聞》，<https://www.sankei.com/region/news/190911/rgn1909110007-n1.html>。

²⁹ 「南韓反擊！正式將日本踢出貿易白名單」（2019 年 9 月 18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4053676>。

³⁰ 「日本『ホワイト国除外、影響ない』…韓国産輸入比率 4.1%」（2019 年 8 月 14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中央日報日本語版》，<https://japanese.joins.com/JArticle/256542>。

³¹ 「韓国が日本を提訴、輸出管理の厳格化で、WTO 発表」（2019 年 9 月 16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日本經濟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9861600W9A910C1PE8000/>。

伍、日韓貿易摩擦對美日韓聯盟的影響： 以 GSOMIA 為中心的分析

在上一節我們提到在日韓貿易爭議中，由於日韓工業技術的差距，日本可以用控管關鍵零組件出口（或者是威脅韓國用此招）的方式，對韓國政府與產業界產生極大的壓力。然而因為韓國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不可替代性不高，韓國除了民間發起的拒買日貨、不到日本旅遊等經濟抵制外，政府所用的方式：將日本排除在韓國版的白色國家名單之外、以及 WTO 正式提告等，都無法對日本造成對等的壓力。韓國在這樣的困境下，選擇使用 GSOMIA 來當作日韓貿易摩擦中的一張牌。

GSOMIA 是日韓雙方在 2016 年 11 月 23 日簽訂，是日韓在二戰之後第一份軍事合作協定。締結的兩國可以藉由 GSOMIA，無須經過美國，直接共享軍事情報。³² 例如南韓方面能夠獲得日本衛星所偵測的資料，藉以掌握北韓的潛艦基地、彈道飛彈基地或是潛射彈道飛彈等情資。過去的合作經驗中，日本也曾提供北韓試射飛彈的資料給南韓；相應的日本也同樣能夠得到南韓的協助，特別是北韓飛彈以及脫北者、被綁架的日本國民等資訊。³³

GSOMIA 協議在 1980 年代末期就已經展開，³⁴ 起初是由南韓所提議，因為南韓軍方缺乏日本所擁有的衛星偵測能力，³⁵ 不過因為日韓之間複雜的

³² 美日之間的 GSOMIA 是在 2007 年 8 月簽訂。在美日簽訂前後，日本學者有針對美國與各國之間簽訂的不同 GSOMIA 進行比較研究，詳細內容可參閱：松村昌広（2003）與福好昌治（2007）。松村昌広，「米国と主要同盟国との二国間安全保障関連条約・協定体制の比較分析--軍事情報に関する一般保全協定(GSOMIA)の重要性」，《桃山法学》，第 1 期（2003 年 3 月），頁 235-297。福好昌治，「軍事情報包括保護協定(GSOMIA)の比較分析」，《レフアレンス》，No. 682（2007 年 11 月），頁 129-147。

³³ 「何のための GSOMIA 破棄なのか懸念される=韓国」（2019 年 8 月 26 日），2020 年 9 月 1 日下載，《中央日報日本語版》，<https://japanese.joins.com/JArticle/256851>。

³⁴ 從朴正熙總統時代開始到近年的日韓外交與安全保障合作關係，可以參閱：Young-June Park, "South Korea's Diplomacy and the Evolution of Kore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1965-2015," *Seoul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2, No. 1 (August, 2016), pp. 109-137.

³⁵ Park, Jaehan and Yun, Sangyoung, "Korea and Japan's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A Final Touch for the Pivot?" (November 24, 2016), visited date: June 15, 2020,《The Diplomat》,<https://thediplomat.com/2016/11/korea-and-japans-military-information-agreement-a-final-touch-for-the-pivot/>.

歷史因素問題，南韓的民意反彈而使得簽訂過程幾經波折。2012 年時在總統李明博任內，原本就準備好簽署協定，但是因為被質疑是黑箱操作，最後在同年 6 月 29 日簽訂前一個小時突然喊停，³⁶ 宣告暫緩。³⁷ 直到 2016 年才正式簽署完成。³⁸

在 2016 年簽訂時，其實也引起南韓國內輿論的激烈爭議，反對者質疑時任總統朴槿惠「賣國」。當時朴槿惠正身陷於好友崔順實干政的醜聞，民意支持度陷入低潮，但對於茲事體大的 GSOMIA 協定，儘管當時有近 6 成民意反對簽訂，朴政權卻極為倉促地跳過國會審核程序放行過關；當時有韓國輿論認為，GSOMIA 掀起的政治風暴是壓垮朴槿惠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就 GSOMIA 的立意而言，美國是希望透過協定促進日韓的軍事合作、保障東北亞局勢的安穩，對於在日韓都有駐軍的美國來說，這也是符合安全利益的同盟協定。GSOMIA 在日韓雙方沒有異議下，每年會自動續約，若要終止，則必須在協定期限，每年 11 月 23 日的 90 天前提出。2017 年與 2018 年的 GSOMIA 都順利自動更新，但是 2019 年的更新卻碰到了日韓貿易摩擦。

日韓貿易摩擦中，GSOMIA 就自然成為南韓做為對日談判的籌碼，而且因為日方的出口限制態度強硬，南韓便以終止 GSOMIA 協定來做為讓日本軟化的可能選項。但是包含《朝鮮日報》等韓國媒體在內，原本預估南韓僅會以 GSOMIA 來加重談判力道，在軍事安全的利益下應該不至於真的終止。沒想到 8 月 22 日傍晚青瓦臺宣布不再續約 GSOMIA，讓外界相當震

³⁶ 林隆司，「日韓軍事情報包括保護協定（日韓 GSOMIA）締結延期の要因分析：署名 1 時間前の土壇場で政策変更された背景にあったもの」，《海幹校戰略研究》，Vol. 4, No. 2 (2014 年 12 月)，頁 76-98。

³⁷ Wiegand (2015) 則是認為 2012 年日韓簽訂 GSOMIA 失敗，最主要的背景因素是日韓之間竹島（日本名）/獨島（韓國名）爭議，使得韓國大眾對日本充滿敵意。Krista E. Wiegand, "The South Korean-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the Dokdo/Takeshima islets disput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8, No. 3 (February, 2015), pp. 347-366.

³⁸ GSOMIA 內容共有 21 條文，詳細內容分析可以參閱：山本健太郎，「日韓 GSOMIA をめぐる動向」，《調查と情報》，No. 1075 (2019 年 12 月)，頁 1-13。

驚；23 日下午，韓國政府的正式通知書就送達日本。³⁹

然而在 8 月 22 日青瓦臺宣布不續約 GSOMIA，到 11 月 23 日凌晨 GSOMIA 正式終止為止，美國、韓國與日本展開了緊密的外交聯繫與策略施壓。最後的結果是，在 GSOMIA（23 日零時開始）正式終止之前的 6 小時，韓國總統府在 22 日下午 6 點宣布，以隨時可以終止 GSOMIA 為前提條件，繼續延長 GSOMIA，並且暫時終止在 WTO 提告日本的手續。GSOMIA 在緊要關頭，因為韓國政府的急轉彎，得以繼續延命。⁴⁰

在韓國政府宣告不續約，到最後宣布繼續延長的三個月中，美國、日本、韓國之間有著緊密的外交聯繫。首先在 8 月 22 日青瓦臺宣布不續約 GSOMIA 之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立即表示失望。美國國務院也發表了「文在寅政府的決定對於，我們在東北亞所面對的安保挑戰，有深刻的誤解」這樣非常嚴厲的批評。⁴¹ 在美國的施壓下，韓國在宣告不續約 GSOMIA 之後，持續對日本釋放友善的訊息，希望能夠以延續 GSOMIA 為牌，交換到日本方面的妥協。舉例來說，韓國總理李洛淵赴日出席 10 月 22 日舉行的德仁天皇「即位禮正殿之儀」，24 日在日本首相官邸與安倍首相舉行會談，並向安倍首相遞交了文在寅總統的親筆信。文在寅在親筆信中指出：韓日兩國作為近鄰，是為了東北亞和平與安定必須合作的重要夥伴，為了早期解決兩國間的懸案，兩國應該相互進行真誠的努力。儘管文在寅的親筆信擺出了和緩態度，安倍在會談中還是強調，必須遵守國與國之間的約定，意思是指韓國有關強徵勞工的判決沒有遵守日韓之間的請求權協定。這也暗示日本方面認為是造成日韓關係冷卻的強徵勞工問題必須由韓國方面解

³⁹ 「日韓走向最惡局面？南韓『終止 GSOMIA』的安保衝擊」（2019 年 8 月 23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下載，《聯合報》，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4006514。

⁴⁰ 「韓國、失効 6 時間前 転換 GSOMIA 失効回避」（2019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9 月 1 日下載，《西日本新聞》，<https://www.nishinippon.co.jp/item/n/561939/>。

⁴¹ 「日本側に傾いた“米国の天秤”が顕在化…韓国は北東アジア戦略構図を十分考慮したか」（2019 年 11 月 25 日），2020 年 6 月 10 日下載，《韓民族日報日文版》，<http://japan.hani.co.kr/arti/politics/35064.html>。

決的一貫立場。⁴²

9月與10月日韓之間冷淡關係，並沒有明顯的改善，到了11月，美國更積極介入日韓關係，尤其是美國的高官陸續飛往韓國，施壓韓國不要終止GSOMIA。而美國壓力似乎也成為韓國最後決定維持GSOMIA的最主要原因。11月上旬，美國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和國務院主管日韓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納柏（Marc Knapper）訪問韓國，呼籲續簽GSOMIA。⁴³ 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14日與南韓合同參謀本部議長朴漢基（Park Han-ki）共同主持韓美軍事委員會（MCM）第44次會議，合同參謀本部戰略企劃本部長李成龍（Lee Seong-yong）以及美國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維森（Phil Davidson）、韓美聯軍司令部司令艾布蘭（Robert Abrams）等美日軍方高階將領皆有與會，會議中GSOMIA也是討論議題。⁴⁴ 15日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與文在寅總統以及鄭景斗國防長官舉行會談，美國直接對最高層進行施壓。而其中可能最具有決定性的，是21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與韓國外交部長康京和的電話會談。日本資深媒體人近藤大介透過日本官員的內部消息，得知這個電話，蓬佩奧是用接近恐嚇的語調威脅韓國外長：「如果與日本的GSOMIA關係結束了，美國今後不會把韓國當作同盟國。與北韓的交涉，將會把南韓排除在外，就美國北韓架構談下去。然後來年的美軍駐韓費用，川普總統的講法，將會成為美方的總體意見，會要求（2020年的）5倍金額」。⁴⁵

韓國輿論一般認為，韓國總統府改變8月的決定，在最後關頭宣布繼續

⁴² 「韓國總理與安倍舉行會談 遞交文在寅親筆信」（2019年10月24日），2020年6月10日下載，《法廣新聞網》，<http://www.rfi.fr/tw/> 亞洲 /20191024- 韓國總理與安倍舉行會談 - 遞交文在寅親筆信。

⁴³ 「美施壓續簽軍情協定 韓外長近期訪美表明立場」（2019年11月14日），2020年6月10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4164458>。

⁴⁴ 「韓美軍委會重申美國對韓堅定防衛承諾」（2019年11月14日），2020年6月20日下載，《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166010>。

⁴⁵ 近藤大介，「急転直下、韓国 GSOMIA 延長の舞台裏」（2019年11月23日），2020年6月20日下載，《JBpress》，<https://jbpress.ismedia.jp/articles/-/58346>。

延長 GSOMIA，美國壓力是主要原因，然而韓國政府出爾反爾受到媒體的嚴厲批評。與文在寅的進步派政權立場不同的韓國保守派媒體，在韓國總統府宣布延長 GSOMIA 之後，所發表的社論極盡諷刺。例如，朝鮮日報的社論明講文在寅政權是「可恥的無能外交」。而與文在寅政權友好的進步派媒體韓民族日報的社論，則是無奈的表示「GSOMIA 問題上，韓國政府受到美國政府單方面的持續壓迫，我們不得不表示遺憾」。⁴⁶

儘管日本與韓國的多數媒體，都認為在日本沒有取消任何出口管制的情況下，而韓國卻不得不縮回不延續 GSOMIA 的這張外交牌，同時還撤下在 WTO 對日本的正式訴訟，這是韓國受美國壓力後的外交挫折。然而曾在韓國延世大學任教的朝鮮半島專家武貞秀士，⁴⁷ 却有不同的看法。武貞秀士認為，在 GSOMIA 爭議中，韓國總統府的最後決定，美方的壓力以及韓國國防部對總統府的遊說，都不是最重要因素，最重要因素是文在寅政權認為繼續維持 GSOMIA 是一個有利的戰略決定。武貞秀士分析，韓國決定維持 GSOMIA 可以獲得以下的戰略利益。⁴⁸

武貞秀士認為，首先日本政府一直不願意，讓 GSOMIA 問題與日本對韓國的出口管制，產生直接的連結。然而經過幾個月的美日韓外交往來，GSOMIA 與日本出口管制已經是實質上連結在一起。而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當青瓦台 22 日下午 6 點宣布繼續維持 GSOMIA 的運作時候，日本的經濟產業省也在同樣的 6 點，宣布日韓之間將重啟輸出管理的政策協商，⁴⁹ 這

⁴⁶ 「韓国 3 大紙も『無能外交で恥ずかしい』と嘆いた“朝令暮改”文在寅政権の GSOMIA 破棄回避」(2019 年 11 月 23 日)，2020 年 6 月 20 日下載，《週刊文春デジタル》，<https://bunshun.jp/articles/-/15762>。

⁴⁷ 武貞秀士精通韓語，長期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任職。退休後，任職韓國延世大學國際學院教授，之後轉任日本拓殖大學。現在為拓殖大學國際協力學研究科的客座教授。

⁴⁸ 此段關於武貞秀士的意見，是由日本雜誌《日經ビジネス》(日經商業) 的副總編森永輔以訪談的方式刊登在其雜誌上。森永輔，「GSOMIA と輸出管理を『リンク』させた韓国の手練手管」(2019 年 11 月 25 日)，2020 年 6 月 25 日下載，《日經ビジネス》，https://business.nikkei.com/atcl/seminar/19/00023/112200115/?n_cid=nbpb_nb_fbed&fbclid=IwAR0yAk7dIL8WIpYLrkbeIl5rs-tjqW5dX7jMLgsNt-im9xUCMN-JkzaA20。

⁴⁹ 7 月當日本開始對韓國進行三項關鍵零組件出口管制時，日方的理由之一，便是日韓之間已經數年沒有舉行出口管制的政策協議，而日方也一直要求韓國舉行，韓國卻是置之不理。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日韓之間重新啟動出口管制協商，也可以說是日方的外交成果。

顯示日韓之間是有默契的。再者，美國要求大幅提高駐韓美軍的費用，韓國因為維持了 GSOMIA，有了可以跟美國「殺價」的談判籌碼。最後，韓國國防部傾向維持 GSOMIA，青瓦臺最後也做了同樣的決定，這是有助於總統府維持與軍方的關係。至於韓國宣布取消 WTO 控告，武貞秀士認為，WTO 控訴需要長時間才有結果，實際效用不高，韓國宣布只要在雙方的出口管制協商期間，就不會在 WTO 提告，其實就只是做個順水人情給日本。

此外，就美國輿論的看法，一般認為韓國決定維持 GSOMIA 是美國施壓的成功，同時這個結果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⁵⁰ 保守右派的華盛頓時報，在 GSOMIA 可能中斷的前一天，就指出如果 GSOMIA 無法延續，將會毀損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而讓北韓與中國兩國得利。⁵¹ 自由派的紐約時報則是批評，川普政權失敗於解決日韓之間的歷史爭議，以及減少兩國之間持續的敵意，幸好在國防部長埃斯珀與國務卿蓬佩奧等專業行政官僚的努力下，贏得了一個「至少短暫的勝利」(at least a short-term victory)。⁵²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韓國最後急轉彎宣布維持 GSOMIA，有兩種說法：美國壓力下的韓國外交妥協、以及韓國的戰略性選擇。筆者認為，這兩種說法其實都有部分道理。首先不可否認的，美國壓力是一個主要因素。但是筆者不認為美國壓力就意味著韓國的外交挫折，甚至我們可以說，美國壓力代表的是韓國的戰略性成功。因為在日韓貿易戰剛開始的時候，美方其實是不太願意介入，但是到了 11 月，美國高官飛往韓國的時候，同時也飛到日本進行溝通。美國除了對韓國施壓以外，對日本也同樣施壓。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對韓國政府要求大幅提高駐韓美軍經費以

⁵⁰ 渡部恒雄，「韓国・文在寅『GSOMIA 延長』は本当に日本の『外交的勝利』か」（2019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6 月 25 日下載，《現代ビジネス》，<https://gendai.ismedia.jp/articles/-/69186>。

⁵¹ Taylor, Guy, "South Korea-Japan tension undercuts U.S., emboldens China and North Korea" (November 21, 2019), visited date: June 20, 2020, 《The Washington Times》,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9/nov/21/south-korea-japan-standoff-undercuts-us-emboldens-/>.

⁵² Rich, Motoko and Wong, Edward, "Under U.S. Pressure, South Korea Stays in Intelligence Pact With Japan" (November 22, 2019), visited date: June 20, 2020,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11/22/world/asia/japan-south-korea-intelligence.html>.

外，也同時對日本政府要求大幅提高，駐日美軍的分擔費用。⁵³ 因此如果就表面上來看，日本政府在沒有修改出口管制措施的情況下，韓國政府就被美國逼著繼續維持 GSOMIA，這是日本的外交勝利。但是如果就韓國政府將日韓貿易摩擦成功的與 GSOMIA 繩在一起，同時把原本旁觀的美國，一起拉進來對日本施壓，以這個角度來看，韓國的戰略是成功的。不過，韓國這個戰略成功背後，有讓在旁等待漁翁之利的北韓與大陸失望的風險，⁵⁴ 因為這兩個國家原本是期待 GSOMIA 的瓦解。⁵⁵ 並且，雖然韓國後來急轉彎讓 GSOMIA 繼續維持，但是韓國也喊出可以隨時停止 GSOMIA，這將會使得美日韓同盟處在一種隨時可能瓦解的不安定狀態，而這應該不是美國所樂意見到的。

陸、結論：美日韓聯盟的今後發展

本文說明日韓貿易摩擦的起因與發生經過，並且分析此貿易摩擦，如何影響 GSOMIA 的持續與否，進而動搖美日韓同盟的戰略關係。日韓貿易戰起端於二戰期間日本對韓徵用工的賠償問題，日本主張 1965 年簽訂日韓請求權協定時，日本已經一次付清賠款。過去韓國政府也未在此議題為難日本。但是文在寅總統上任後，韓國對此議題態度轉為強硬，就在 2019 年韓國法院對被告日本企業進行無法逆轉的財產處分手續前夕，日本發動了貿易戰。日本首先在 7 月對於出口到韓國的三項關鍵科技材料加強管制，並且在 8 月之後，把韓國從友好出口國家的白色國家名單中移除，讓日本政府可以隨時指定產品，以嚴格審查為名進行實質的出口控管。日本發動貿易戰之後，韓國政府雖然施行各項反制措施，韓國民間也有日貨抵制運動，但日

⁵³ 「思いやり予算、4.5 倍に 米政権、80 億 ドル 要求—日本側の反発必至」(2019 年 11 月 16 日), 2020 年 9 月 3 日下載, 《時事通信》, <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19111600320&g=int>。

⁵⁴ Kim, Tong-hyung, “South Korea Will Keeps Its Military Intelligence Pact With Japan – For Now” (November 23, 2019), visited date: June 20, 2020,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1/south-korea-will-keeps-its-military-intelligence-pact-with-japan-for-now/>.

⁵⁵ 森永輔,「GSOMIA と輸出管理を『リンク』させた韓国の手練手管」。

本政府皆無動搖。韓國之後就宣告將退出 GSOMIA。GSOMIA 是日韓雙方在 2016 年簽訂，是日韓在二戰之後第一份軍事合作協定。締結的兩國可以藉由 GSOMIA，無須經過美國，直接共享軍事情報。就 GSOMIA 的立意而言，美國方面是希望透過協定促進日韓的軍事合作、保障東北亞局勢的安穩。因此韓國喊出退出 GSOMIA 之後，美方便積極介入日韓之間的衝突，並且在最後關頭，讓韓國收回要退出 GSOMIA 的宣言。

雖然在美國的影響下，韓國勉強維持了 GSOMIA 的運作。但是韓國方面明言，視未來日方在雙方管制出口協議的態度，GSOMIA 可以隨時停止。這將會使得 GSOMIA，甚至是美日韓同盟處在一種隨時可能瓦解的不安定狀態嗎？

我們認為將來 GSOMIA 的維持並不是一個絕對穩定的狀態，最主要的原因是，日韓雙方在複雜歷史因素背景，以及此次貿易摩擦的影響下，雙方國民的友好程度降至低點。在此情況下，日本與韓國兩國的民意調查，不贊成 GSOMIA 的民意都是居多數。2019 年 11 月 22 日的蓋洛普韓國民意調查，支持放棄 GSOMIA 的有 51%，遠高於不支持的 29%。⁵⁶ 同樣的日本媒體在 11 中旬所做的民調也顯示，68.3% 的民眾認為放棄 GSOMIA 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只有 14.4% 的民眾支持繼續維持 GSOMIA。⁵⁷ 因此若是日韓雙方今後無法改善，低迷的國民之間友好感情，「日韓之間相互不友好／國民不認為 GSOMIA 有必要」，這樣的負面連結持續存在，就容易出現政客加以利用，用來操作反日／反韓國民情緒以獲得政治利益。在這樣的政治操作中，GSOMIA 的續存就可能出現危機。

另一方面，日韓雙方已經出現，朝向包裹性解決問題的動作，亦即是解決日韓貿易摩擦的同時，也解決日韓之間的徵用工歷史問題，進而澈底解決日韓之間歷史爭議，穩定日本與韓國這兩個美國重要盟友之間的外交關係，

⁵⁶ 近藤大介，「急転直下、韓国 GSOMIA 延長の舞台裏」。

⁵⁷ 「日本国民 68.3%、GSOMIA 終了『やむを得ない』」(2019 年 11 月 19 日)，2020 年 7 月 1 日下載，《中央日報日本語版》，<https://japanese.joins.com/JArticle/259730?sectcode=A10&servicecode=A00>。

是美國長久以來的期待，也是美國的重大國家利益。⁵⁸ 在日韓貿易戰中，日方的底牌是，韓國不能以徵用工問題，對日本企業造成實質經濟傷害；而韓國方面則是希望日本能夠取消出口管制，並且日本企業對徵用工作出賠償。這樣雙方的底牌，是似乎是有能力達成妥協的空間。2019 年 12 月韓國國會文喜相議長向國會提出了新法案，這個新的解決方案，主要是透過日韓企業的自由捐款、以及韓國政府的經費，成立新的補償基金，來對徵用工的訴訟者作出補償。⁵⁹ 雖然此法案會不會在韓國國會通過，並且獲得日本政府的認可，還是前途未知，但可以看出韓國方面已經開始提議包裹性解決方案，亦即是從日韓貿易戰源頭的徵用工問題去解決。

此外，日韓貿易戰已經看到和緩趨勢。日韓之間貿易管制的局長級政策對話，已經在 2019 年 12 月 16 日舉行。這是日韓之間事隔三年半後再次舉辦貿易管制問題對話，具有特殊意義。⁶⁰ 會議後的幾天，日方就宣布放寬日韓貿易戰起端之三大管制材料之一的光阻劑出口。日本經產省宣布，只要韓企一年進口光阻劑達到六次，日本供應商就可以申請三年內出口免審查，使得光阻劑管制回到貿易戰前的待遇。雖然三項關鍵材料，日本政府只解禁一項，但解禁光阻劑對於韓國產業界的意義非凡。⁶¹ 就如同我們前面提到，光阻劑的順利進口與否，關係到三星電子與台積電在晶圓代工先進製程的技術競爭，儘管日本在 2019 年 7 月開始宣布管制三大關鍵材料後，韓方只要合乎手續，管制的三大關鍵材料都可以順利從日本出口，⁶² 顯示日本並沒有將

⁵⁸ “South Korea Says It Won't Pull Out Of Japan Intel-Sharing Pact — For Now” (November 22, 2019), visited date: June 6, 2020, 《NPR》, <https://www.npr.org/2019/11/22/781945244/south-korea-says-it-wont-pull-out-of-japan-intel-sharing-pact-for-now>.

⁵⁹ 「韓国議長、元徵用工の基金法案を提出 成立は不透明」(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下載，《日本經濟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3526110Y9A211C1FF8000/>。

⁶⁰ 「日韓、輸出管理の局長級対話の継続で合意 次回はソウルで開催」(2019 年 12 月 16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下載，《產經新聞》，<https://www.sankei.com/economy/news/191216/ecn1912160024-n1.html>。

⁶¹ 「日韓貿易戰邁向和解之路」(2020 年 1 月 20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下載，《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4299447>。

⁶² 「フッ化ポリイミドの韓国向け輸出許可全 3 品目で承認」(2019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下載，《日本經濟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0415740Q9A930C1EE8000/>。

管制變成實質的禁運，但是對於企業經營者來說，在日韓關係不穩定情況下的每次出口審查，都還是一項嚴苛的營運風險，因此日本宣布放寬光阻劑出口，等於是送三星電子與韓國電子業一項大禮，確保今後在七奈米晶圓代工的量產上，不會有斷料的危機。

（109年7月6日收稿、109年8月17日修正、109年9月3日接受）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期刊論文

王冠雄，2006/7。「韓、日專屬經濟海域主張爭端之分析：以獨島為觀察」，戰略安全研析，第 15 期，頁 33-36。

何思慎，2018/6。「雨過天晴乎：日中關係新發展」，戰略安全研析，第 150 期，頁 9-19。

何思慎、楊雯婷、陳舜仁，2016/10。「為何日本無法追求樞紐位置：美、中東亞角力的政策選擇」，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7 卷 4 期，頁 43-98。

林宗達，2016/7。「美韓部署『戰區高空區域防禦』與臺海安全」，國際軍務，第 7 期，頁 86-95。

林賢參，2010/7。「沖繩普天間美軍基地問題與日美同盟」，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7 期，頁 108-118。

胡敏遠，2017/12。「薩德系統的『建』或『撤』對南韓國家安全的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1 卷第 6 期，頁 97-107。

荊元宙，2006/5 月。「日本與南韓有關獨島問題爭議之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13 期，頁 24-27。

許金彥，2009/7。「日、韓『獨島爭議』研究」，亞太研究通訊，第 7 期，頁 151-178。

郭育仁，2014/4。「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頁 43-64。

陳亮智、劉兆隆，2019/3。「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的政策選擇分析：以美國對『日本崛起』與『中國崛起』之回應為例」，問題與研究，58 卷 1 期，頁 89-142。

陳蒿堯，2017/9。「中韓針對薩德部署爭議分析」，國防雜誌，第 32 卷第 3 期，頁 53-76。

黃柏欽，2016/7。「美韓『薩德系統』部署對俄羅斯戰略安全之影響及其因應作為研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135 期，頁 58-67。

楊雯婷，2019/2。「川金二會及美日韓對朝政策分歧」，戰略安全研析，第 154 期，頁 46-56。

趙國材，2008/6。「論日、韓關於竹島之法律爭端」，臺灣海洋法學報，7 卷 1 期，頁 1-29。

劉坤鱗，2012/6。「促成中日韓 FTA 談判的戰略分析與離島主權爭議的影響」，中華行政學報，第 10 期，頁 201-219。

劉德海，2016/8。「美韓部署薩德飛彈影響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8 期，頁 25-31。

蔡增家，2017/3。「當同盟不再漂流：安倍再次上台後美日關係之轉變」，全球政治評論，特集 005 期，頁 25-40。

網際網路

2017/12/13。「薩德問題暫封存 中韓關係回暖 文在寅訪華」，《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12/12/n9950569.htm>>。

2019/7/7。「日韓貿易戰 看見台灣機會」，《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915519>>。

2019/8/2。「國際貿易戰升級 內行看門道」，《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3967001>>。

2019/8/23。「日韓走向最惡局面？南韓『終止 SOMIA』的安保衝擊」，《聯合報》，<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4006514>。

2019/9/18。「南韓反擊！正式將日本踢出貿易白名單」，《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4053676>>。

2019/10/24。「韓國總理與安倍舉行會談 遞交文在寅親筆信」，《法廣新聞網》，<[http://www.rfi.fr/tw/ 亞洲 /20191024- 韓國總理與安倍舉行會談 - 遞交文在寅親筆信 >">https://www.rfi.fr/tw/ 亞洲 /20191024- 韓國總理與安倍舉行會談 - 遞交文在寅親筆信 >](http://www.rfi.fr/tw/)

2019/11/14。「美施壓續簽軍情協定 韓外長近期訪美表明立場」，《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4164458>>。

2019/11/14。「韓美軍委會重申美國對韓堅定防衛承諾」，《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166010>>。

2020/1/20。「日韓貿易戰邁向和解之路」，《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4299447>>。

2020/2/20。「三星新 EUV 生產線開始量產，首批 7 奈米晶片 Q1 出貨」，《科技新報》，<<https://technews.tw/2020/02/20/samsung-electronics-begins-mass-production-at-new-euv-manufacturing-line/>>

日文部分

期刊論文

山本健太郎，2019/12。「日韓 GSOMIA をめぐる動向」，《調査と情報》，No. 1075，頁 1-13。

西野純也，2019/1。「盧武鉉政権期の日韓関係：韓国の新しい秩序認識の台頭」，《法学研究》，92 卷 1 号，頁 97-116。

李炯喆，2018/3。「米韓同盟と東アジア関係」，《東アジア評論》，第 10 号，頁 3-15。

東郷和彦，2017/1。「竹島・独島問題と日韓関係：日本の視点」，《產大法学》，50 卷 1・2 号，頁 373-387。

松村昌広，2003/3。「米国と主要同盟国との二国間安全保障関連条約・協定体制の比較分析 -- 軍事情報に関する一般保全協定（GSOMIA）の重要性」，《桃山法学》，第 1 期，頁 235-297。

林隆司，2014/12。「日韓軍事情報包括保護協定（日韓 GSOMIA）締結延期の要因分析：署名 1 時間前の土壇場で政策変更された背景にあったもの」，《海幹校戦略研究》，Vol. 4, NO. 2，頁 76-98。

金栄鎬，2018/11。「日韓関係における安全保障と歴史問題：同盟のジレンマと移行期正義の視点から」，《広島国際研究》，第 24 卷，頁 1-24。

奥田聰、渡邊雄一，2019/10。「2018 年の韓国：南北融和の進展と日韓関係の悪化」，《アジア動向年報》，2019 卷，頁 39-68。

福好昌治，2007/11。「軍事情報包括保護協定（GSOMIA）の比較分析」，《レ ファレンス》，No.682，頁 129-147。

網際網路

2016/2/22。「落ちぶれた韓国の均衡外交…米日同盟の『下位パートナー』に転落」，《韓民族日報日文版》，<<http://japan.hani.co.kr/arti/politics/23391.html>>。

2017/2/11。「日米首脳会談『共同声明』の要旨」，《朝日新聞》，<<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K2C1DRGK2BUTFK020.html>>。

2018/10/30。「韓国最高裁 新日鉄に4千万円賠償命じる=徴用工訴訟で原告の勝訴確定」，《聯合ニュース》，<<https://jp.yna.co.kr/view/AJP20181030002400882>>。

2019/7/5。「対韓輸出管理を強化 半導体材料メーカーが拭えない『不安』」，《ニュースイッチ》，<<https://newswitch.jp/p/18303>>。

2019/7/30。「ホワイト国除外」閣議決定迫る 韓国EVなどターゲットに輸出規制か」，《聯合ニュース》，<<https://jp.yna.co.kr/view/AJP20190730001100882>>。

2019/8/2。「『ホワイト国』→『グループA』に 経産省が名称変更」，《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02HMW_S9A800C1000000>。

2019/8/7。「韓国『官製反日』に国民が『NO』自治体トップらに批判」，《産経新聞》，<<https://www.sankei.com/world/news/190807/wor1908070024-n1.html>>。

2019/8/14。「日本『ホワイト国除外、影響ない』…韓国産輸入比率4.1%」，《中央日報日本語版》，<<https://japanese.joins.com/JArticle/256542>>。

2019/8/26。「何のためのGSOMIA破棄なのか懸念される=韓国」，《中央日報日本語版》，<<https://japanese.joins.com/JArticle/256851>>。

2019/9/11。「韓国人観光客激減で対馬の観光に打撃深刻 閑古鳥にも『静かさ取り戻した』の声」，《産経新聞》，<<https://www.sankei.com/region/news/190911/rgn1909110007-n1.html>>。

2019/9/16。「韓国が日本を提訴、輸出管理の厳格化で、WTO発表」，《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9861600W9A910C1PE8000>>。

2019/9/30。「フッ化ポリイミドの韓国向け輸出許可全3品目で承認」，《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0415740Q9A930C1EE8000>>。

2019/11/16。「思いやり予算、4.5倍に 米政権、80億ドル要求—日本側の反発

必至」，《時事通信》，<<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19111600320&g=int>>。

2019/11/19。「日本国民 68.3%、GSOMIA 終了『やむを得ない』」，《中央日報 日本語版》，<<https://japanese.joins.com/JArticle/259730?sectcode=A10&service=A00>>。

2019/11/23。「韓国 3 大紙も『無能外交で恥ずかしい』と嘆いた“朝令暮改” 文在寅政権の GSOMIA 破棄回避」，《週刊文春デジタル》，<<https://bunshun.jp/articles/-/15762>>。

2019/11/25。「日本側に傾いた“米国の天秤”が顕在化…韓国は北東アジア 戰略構図を十分考慮したか」，《韓民族日報日文版》，<<http://japan.hani.co.kr/arti/politics/35064.html>>。

2019/12/16。「日韓、輸出管理の局長級対話の継続で合意 次回はソウルで開催」，《産経新聞》，<<https://www.sankei.com/economy/news/191216/ecn1912160024-n1.html>>。

2019/12/18。「韓国議長、元徵用工の基金法案を提出 成立は不透明」，《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53526110Y9A211C1FF8000/>>。

2020/6/19。「サムスントップが半導体研究所を訪問『危機状況』強調」，《聯合ニュース》，<<https://jp.yna.co.kr/view/AJP20200619002800882>>。

辺真一，2019/10/11。「『日韓貿易摩擦』から 100 日 ダメージは韓国より日本のほうが大きい？」，《Yahoo Japan News／辺真一のコリア・レポート》，<<https://news.yahoo.co.jp/byline/pyonjiniru/20191011-00146341/>>。

近藤大介，2019/11/23。「急転直下、韓国 GSOMIA 延長の舞台裏」，《JBpress》，<<https://jbpress.ismedia.jp/articles/-/58346>>。

細谷雄一，2015/7/6。「集団的自衛権と日米同盟一同盟はどのように強化されるのか？」，《USJI Voice》，Vol. 8，<<http://www.us-jpri.org/voice/voice8.pdf>>。

森永輔，2019/11/25。「GSOMIA と輸出管理を『リンク』させた韓国の手練手管」，《日経ビジネス》，<https://business.nikkei.com/atcl/seminar/19/00023/112200115/?n_cid=nbpb_nb_fbed&fbclid=IwAR0yA-k7dIL8WIpYLrkbeII5rs-tjqW5dX7jMLgsNt-im9xUCMN-JkzaA20>。

渡部恒雄，2019/12/16。「韓国・文在寅『GSOMIA 延長』は本当に日本の『外交的勝利』か」，《現代ビジネス》，<<https://gendai.ismedia.jp/articles/-/69186>>。

英文部分

期刊論文

Chun, JaHyun & Choi, Daeun, 2018/12. “Japan's Foreign Policy on Postwar Issues Relating to South Korea,” *Pacific Focus*, Vol. 33, No. 03, pp. 455-477.

Hinata-Yamaguchi, Ryo, 2016/9. “Completing the US-Japan-Korea Alliance Triangle: Prospects and Issues in Japan-Korea Security Cooperation,”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8, No. 3, pp. 383-402.

Jo, Yanghyeon & Lam, Peng Er, 2019/9. “South Korea-Japan Relations in the 2010s: Ambivalent Strategic and Economic Partners?” *East Asian Policy*, Vol. 11, No. 03, pp. 39-49.

Kim, Ji Young, 2015/9.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ntity factors: the history problem and the Japan–South Korea security relationship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5, No. 3, pp. 477–503.

Park, Young-June, 2016/8. “South Korea's Diplomacy and the Evolution of Kore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1965-2015,” *Seoul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2, No. 1, pp. 109-137.

Tamaki, Taku, 2020/3. “It takes two to Tango: the difficult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 as clash of realitie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01, pp. 1-18.

Wiegand, Krista E., 2015/2. “The South Korean–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the Dokdo/Takeshima islets disput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8, No. 3, pp. 347-366.

網際網路

2018/10/5. “Pence’s China Speech Seen as Portent of ‘New Cold War’,” *《The New York Times》* ,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05/world/asia/pence-china-speech-cold-war.html>>.

2019/11/22. “South Korea Says It Won’t Pull Out Of Japan Intel-Sharing Pact — For Now,” *《NPR》* , <<https://www.npr.org/2019/11/22/781945244/south-korea-says-it-wont-pull-out-of-japan-intel-sharing-pact-for-now>>.

2019/12/31. “Huawei shrugs off US sanctions as sales grow 18%,” *《Financial Times》* , <<https://www.ft.com/content/1665bc74-2b0f-11ea-a126-99756bd8f45e>>.

Harold, Scott W., 2019/9/17. “South Korea – Japan Tensions Complicate U.S. Efforts to Leverage Allies in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stitut Montaigne》* ,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blog/south-korea-japan-tensions-complicate-us-efforts-leverage-allies-competition-china>>.

Kim, Tong-hyung, 2019/11/23. “South Korea Will Keeps Its Military Intelligence Pact With Japan – For Now,” *《The Diplomat》* ,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1/south-korea-will-keeps-its-military-intelligence-pact-with-japan-for-now/>>.

Park, Jaehan and Yun, Sangyoung, 2016/11/24. “Korea and Japan’s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A Final Touch for the Pivot ? ” *《The Diplomat》* ,

<<https://thediplomat.com/2016/11/korea-and-japans-military-information-agreement-a-final-touch-for-the-pivot/>>.

Rich, Motoko and Wong, Edward, 2019/11/22. “Under U.S. Pressure, South Korea Stays in Intelligence Pact With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11/22/world/asia/japan-south-korea-intelligence.html>>.

Taylor, Guy, 2019/11/21. “South Korea-Japan tension undercuts U.S., emboldens China and North Korea,” 《*The Washington Times*》,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9/nov/21/south-korea-japan-standoff-undercuts-us-emboldens-/>>.

Media Warfare: How Taiwan Can Win the Battle for the Cognitive Domain

Kerry K. Gershaneck

Professor & Taiwan Fellow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s *Media Warfare* against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ose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this island-nation and its democracy. Also called *Public Opinion Warfare*, *Media Warfare* involves using public opinion as a weapon by propagandizing and coercion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media to weaken the adversary’s will to fight while ensuring strength of will and unity on one’s own side. As one of the foundational *Three Warfares* that underpin the PRC’s general *Political Warfare*, *Media Warfare* is a powerful manifestation of Beijing’s *Sharp Power* and a vital weapon in Beijing’s drive to achieve global hegemony. Beijing’s ultimate goal is to absorb Taiwan into communist China. To achieve this goal, its primary objectives are to destroy Taiwan’s democracy and to deter any attempt by Taiwan to formally seek what Beijing calls “independence”. To these ends, the PRC employs *Media Warfare* to divide and demoralize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strategies such as military threats, diplomatic containment, and economic absorption.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help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C (Taiwan)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identify and combat PRC *Media Warfare* so that it can retain its hard-won democracy, sovereignty, and freedoms.

An Overview of PRC Media Warfare Overview

The PRC's version of *Media Warfare* is expansive: it entails persuasion, incitement, buying, coercion, online terror, and propaganda, as well as false messages via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And that is just a start.

According to the *Prospect Foundation*'s Yu-yen Chien, “studie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purchases of media stocks, system operators’ stocks, and news content through media replacement, the PRC also exerts its sharp power using anonymous IP addresses to set the agenda, influence news trends, do news laundering, and get fabricated news into Taiwan Media.”¹

¹ These media manipulations, in turn, suppress Taiwan’s “consciousness” which “impacts elections in Taiwan, Taiwanese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ir feelings about China”.²

Dr. Chia-Lung Lin, former chairman of the *Taiwan Thinktank*, reports:

China is exploiting Taiwan's democratic and open system, via the raising of multiple wedge issues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intent of causing contradiction,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within Taiwanese society.

In addition, China is facilita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control of newspapers, television, radio, and online media in

¹ Yu-yen Chien,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Sharp Power on Taiwan’s Media” (March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The Prospect Foundation*》, <https://www.pf.org.tw/files/6477/E2F99601-AEDC-48C9-89D6-660C73C968EA>.

² Yu-yen Chien,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Sharp Power on Taiwan’s Media”.

Taiwan.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at China has directly supported pro-China forces within Taiwan to speak on behalf of Beijing.

*This piercing, infiltration, or penetr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llows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to use sharp power to infiltrate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democratic system, and incite as well as widen the existing differences, and is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 currently facing Taiwan.*³

While the origins of the PRC's *Media Warfare* extend back before the adv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1920s, it was propelled far beyond any previously imagined capabilities beginning in 2009. As part of an overhaul of China's external propaganda structure caused by perceived "discourse power" failures leading up to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the CCP devised its "Grand Overseas Propaganda Campaign." In 2009, China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be investing 45 billion RMB (approximately \$6.6 billion USD) into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presence of party-state media outlets.⁴

Si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scended to power in 2012, he has led a massive expansion in political and *media warfare*, investing new energy,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to achieve once-hidden-but-now-openly-expressed global ambitions.⁵ He has framed the importance of *Media Warfare* as part of his broader push to achieve China's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CCP's *Two Centenary Goals*. Both are ambitious

³ Chia-Lung Lin, "How to Face China's Sharp Power Collaboratively between Taiwan-US: Welcome Remarks" (2018 2nd Annual TTT-GTI Conference on Taiwan-US Relations, 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Taipei City, Taiwan, December 2, 2018).

⁴ David A. Gitter & Brock M. Erdahl,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 Targeting American Chinese-Language Media Outlets" (Center for Advanced China Research (CACR), June 15, 2020), pp. 1-2.

⁵ Szu-Chien Hsu & J. Michael Cole, *Insidious Power: How China Undermines Global Democracy* (Manchester, UK: Eastbridge Books, 2020), pp. xxix–xxxix.

programs for reaching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achieving strength and domina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y the 21st century's midpoint. Further, both programs entail absorbing the free republic on Taiwan into the CCP's cold embrace, either via Political Warfare or through military assault.⁶

As stated, *Media Warfare* is one of *The Three Warfares* that lay the tradi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mal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of the PRC.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ofessor Stefan Halper describes the Three Warfares as “a dynamic three dimensional war-fighting process that constitutes war by other means.” Of great concern, notes Halper, “this weapon is highly deceptive.”⁷ *Media Warfare*--combined with the other two pillars of the Three Warfares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Legal Warfare*, also called *Lawfare*) and the recently developed concept of *Cognitive Warfare*--poses a unique threat to Taiwan’s continued freedom, sovereignty, and democracy. Before examining the PRC’s *Media Warfare* against Taiwan, though, it is essential to examine *Media Warfare*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the CCP’s *Political Warfare*.

Media Warfare: A Pillar of CCP Political Warfare

The CCP wages *political warfare* for control and influence, using coercion, corruption, and violent covert operations. The CCP claims that this war is meant to “rejuvenate” China to its former imperial grandeur as the *Middle Kingdom*—to once again be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⁶ Gitter & Erdahl,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 Targeting American Chinese-Language Media Outlets,” pp. 2-4.

⁷ Stefan Halper, *China: The Three Warfare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3), p. 11.

the all-powerful hegemon power. It is, as well, a war to ensure the CCP's total control over the PRC's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Taiwan is Beijing's immediate target for acquisition, but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CCP seeks control of those of foreign nations that the Chinese have historically called "barbarian states," both nearby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⁸

Much like the emperors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at its peak, the CCP classifies these barbarian nations as either *tributary states* that recognize the PRC's hegemony or *potential enemies*. Despite the lofty pretext of peaceful national rejuvenation reflected in PRC ruler Xi Jinping's *China Dream*, the CCP has no desire for equality among nations. Nor, in the case of Taiwan, does the CCP have any intention of allowing a fiction it once described a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ather, Beijing seeks to impose its all-encompassing civilization on other lesser state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Xi's China Dream is ultimately totalitarian, Leninist, and based on Marxist principles.⁹

For the CCP, this is a total war for regional and global supremacy, and it incorporates elements of military, economic, informational, and political warfare. PRC political warfare (especially the media warfare component), is both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in nature. It takes the form of *unrestricted warfare* and it is conducted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¹⁰

⁸ Steven W. Mosher,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CA: Encounter Books, 2000), pp. 1-2.

⁹ Mosher,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 p. 3; "Full Text of Xi Jinping's Report at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November 4, 2017),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China Daily*》,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19thpcnationalecongress/2017-11/04/content_34115212.htm; Bill Birtle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Pushing a Marxist Revival—but How Communist Is It Really?" (May 3,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05-04/china-xi-jinping-is-pushing-a-marxist-revival/9724720>.

¹⁰ Qiao Liang & Wang Xiangsui, *Unrestricted Warfare: Assumptions on War and Tac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Beijing: PLA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9).

The Nature of the PRC Regime Matters!

It matters greatly which side wins this “unrestricted war”—a point missed by those enablers who have been co-opted by PRC’s global malign influence campaign to appease the PRC, apologize or explain away its brutal expansionist objectives and actions, and even actively support the CCP’s expansionist ambitions.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tters! Accordingly, as a prelude to this study, it is crucial to answer these key questions:

- *Why does it matter that the PRC seeks regional and ultimately global hegemony?*
- *Why can’t the world accept and tolerate a “rising China,” a seemingly nonthreatening term so often used by PRC propaganda outlets and Beijing’s foreign advocates?*
- *What is there to fear about “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the CCP’s goal of a “Chinese-led world order?”¹¹*

The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is simple--and the same:

The PRC is a coercive, expansionist, hyper-nationalistic, militarily powerful, brutally repressive, genocidal, fascist, and totalitarian state.

“The world has seen what happens when expansionist totalitarian regimes such as [the PRC] are left unchallenged and unchecked,” testified an expert on the PRC, retired U.S. Navy Captain James E. Fanell. “In the world of this type of hegemon, people are subjects—simply property—of the state, and ideals such as democracy, inalienable rights, limited

¹¹ The terms are used in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5), p. 16;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1998* (Beijing: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8).

government, and rule of law have no place.”¹² The people in the PRC--the CCP’s “subjects”--are as much victims of this totalitarian regime as are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ies that the PRC targets globally.

The PRC embodie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itarianism*,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ividuals as merely subjects of the state; control of media outlets, economic sector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ontrol by a single political party with a separate chain of command alongside that of the government; a lack of checks and balances; personality cults; militarism; and a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humiliation leading to hyper-nationalism and an entitlement to aggression. These ar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world witnessed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ountries such as Vladimir Lenin and Joseph Stalin’s Soviet Union, Adolf Hitler’s Germany, Benito Mussolini’s Italy, Imperial Japan, and Pol Pot’s Cambodia. Such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narratives established a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for empires and dictatorships like the PRC long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CCP. There is nothing new or inherently Chinese about totalitarian fascism.

The danger of contemporary totalitarian Sino-fascism, however, is unprecedented. The power of modern technology is especially evident in the PRC’s *Media Warfare*, and in the CCP’s swift convergence of massiv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 position it to be, according to Canada’s prestigious Fraser Institute, “world freedom’s greatest threat.”¹³

By successfully employing *Media Warfare* as one of its key strategies, the CCP has proven that it can effectively leverage the openness of

¹² James E. Fanell, “China’s Global Naval Strategy and Expanding Force Structure: Pathway to Hegemon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72, No. 1 (2019).

¹³ Fred McMahon, “China—World Freedom’s Greatest Threat” (May 10,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Fraser Institute》, <https://www.fraserinstitute.org/article/china-world-freedoms-greatest-threat>.

democratic systems to achieve hegemony over those democracies. It prefers to achieve this hegemony peacefully if possible--not entirely *without a struggle* but ideally without kinetic combat. Nevertheless, the PRC has continually indicated that it is now strong and confident enough to fight a war to achieve that hegemony, even if it must pay a very large price.¹⁴

Media Warfare supports Beijing's political war aimed at "fracturing and capturing regional institutions that could otherwise raise collective concerns about China's behavior" and "intimidating countries in maritime Asia that seek to lawfully extract resources and defend their sovereignty, according to Ely Ratner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¹⁵

Media Warfare in Support of the PRC's Internal Repression

One priority for Beijing's *Media Warfare* is to conceal the extent of its brutal internal repression.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PRC has been criticized by organizations such as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d government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for imprisoning at least a million ethnic Uighurs in "re-education camps" under particularly cruel circumstances.¹⁶ In fact, the repression of Uighurs and other Muslim sects

¹⁴ Jonas Parello-Plesner & Belinda L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 How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hould Respond* (Washington, DC: Hudson Institute, 2018); Discussions with senior Republic of China political warfare officers at Fu Hsing Ka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018-19; Tara Copp & Aaron Mehta, "New Defense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Warns China Nears Critical Military Milestone" (January 15,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Defense News》, <https://www.defensenews.com/news/your-military/2019/01/15/new-defense-intelligence-assessment-warns-china-nears-critical-military-milestone/>.

¹⁵ Ely Ratner,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February 15,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20, 2020,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17364?seq=1#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

¹⁶ "Up to One Million Detained in China's Mass 'Re-Education' Drive" (September 24,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20, 2020, 《Amnesty International》,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9/china-up-to-one-million-detained/>.

is part of a much more insidious trend—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 Post*, “China’s systematic anti-Muslim campaign, and accompanying repression of Christians and Tibetan Buddhists, may represent the largest-scale official attack on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world.”¹⁷ Further, *The Washington Post* calls Beijing’s suppression in Xinjiang “genocide”¹⁸ as do other organizations--but to read PRC-controlled news media, both in China and globally, one only sees that such accusations are the “biggest lies of the century”.¹⁹ These accusations are “groundless” and merely reflect the West’s “deep-rooted egotism and prejudice towards China”.²⁰ Despite these indignant denials, the PRC’s internal political repression is long standing, and it involves a brutality much more lethal than religious suppression and thought control of the mass population. It involves mass murder.

The CCP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during disastrous large-scale reigns of terror such a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62)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and smaller atrocities such as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Hong Kong-based historian Frank Dikötter confirmed, based on findings in the PRC’s archives, tha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lone, “systematic torture, brutality, starvation and killing of Chinese peasants” was the norm. More than 45 million people were “worked, starved or beaten to death” in China during those four years, whil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sulted in the murder of at least 2 million

¹⁷ “China’s Repressive Reach Is Growing”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7, 2019.

¹⁸ Editorial Board, “What’s Happening in Xinjiang Is Genocide” (July 6, 2020), visi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whats-happening-in-xinjiang-is-genocide/2020/07/06/cde3f9da-bfaa-11ea-9fdd-b7ac6b051dc8_story.html.

¹⁹ “China Calls U.S. Accusations ‘Biggest Lies of the Century’” (July 17, 2020), visi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Xinhua*》,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7/17/c_139218277.htm.

²⁰ Xin Zhang, “Smearing Won’t Deny China’s Concrete Human Rights Progress” (July 7, 2020), visited date: October 23, 2020, 《*Xinhua*》,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view/2020-07/07/content_9848322.htm.

more, and another 1 to 2 million were killed in “other campaigns, such as land-reform and ‘anti-rightist’ movements” in the 1950s.²¹

This murderous repression also includes plausible reports that the PRC currently execute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othe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on a mass scale “in order to harvest organs that can be monetized for substantial profits by [CCP] officials.”²² Estimates of those in China kill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CCP actions against the people of China are strongly debated, but during Mao Zedong’s reign alone they range as high as 70 million deaths.²³ But within China’s *Great Firewall* that censors online media, and through its domination of many newspapers and broadcast organizations worldwide, one sees and hears nothing in PRC-owned or controlled media of these holocausts.

The CCP employs *Media Warfare* to make it nearly impossible to access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systematic campaigns of mass murder and terror within the PRC.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censorship both within its borders create a vacuum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even remotely be considered criticism of the CCP. *Media Warfare*--in the form of social media, the state-controlled news media, and the manipulation and suppression of foreign news media--plays a massive role in this thought

²¹ Arifa Akbar,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Killed 45 Million in Four Years’” (September 17, 2010),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Independen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ooks/news/maos-great-leap-forward-killed-45-million-in-four-years-2081630.html>; Ian Buruma, “The Tenacity of Chinese Communism” (September 28,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09/28/opinion/sunday/china-communist-party-confucianism-70-anniversary.html>; Ian Johnson, “Who Killed More: Hitler, Stalin, or Mao?” (February 5,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https://www.nybooks.com/daily/2018/02/05/who-killed-more-hitler-stalin-or-mao/>.

²² Matthew P. Robertson, “Examining China’s Organ Transplantation System: The Nexus of Security, Medicine, and Predation, Part 2: Evidence for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 from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May 15, 2020),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examining-chinas-organ-transplantation-system-the-nexus-of-security-medicine-and-predation-part-2-evidence-for-the-harvesting-of-organs-from-prisoners-of-conscience/>.

²³ Johnson, “Who Killed More: Hitler, Stalin, or Mao?”

suppression.

In her seminal work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Louisa Lim details the extraordinary lengths to which the CCP employs *Media Warfare* to enforce “collective amnesia” to suppress any memory of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from Chinese consciousness.²⁴ As simple examples of the pervasive CCP program of “whitewashing” the massacre through *Media Warfare*, Lim writes:

The authorities' national reflex has been to simply clamp down, banning sensitive words on Weibo,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witter, and deleting posting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Every June 4th, the authorities' level of paranoia can be charted by increasingly lengthy lists of banned words. Terms deemed sensitive enough to be forbidden include “today”, “tomorrow”, “that year”, “special day”, and “sensitive word”sensitive images are also often scrubbed from the Internet, including birthday cake candles featuring the numbers 4 and 6; photos of chrysanthemums, which are traditional flowers of mourning; anything with the slightest similarity to a tank, including LEGO tanks.....(and) even yellow rubber ducks.”²⁵

Although the CCP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amounts to mass murder in its own country, it still tightly holds the reins of power in the PRC, and its media idolizes the man who presided over its deadliest repression: Mao Zedong. Evidence of the CCP's continued admiration for Mao is reflected nearly daily through state media. One example is the China Daily's fawning description as “unprecedented” respect and “piety” that Xi Jinping and the CCP displayed for Mao during celebrations for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²⁴ Louisa Li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2, 80, 85–86, 88, 96, 98–100, 129, 132, 136, 145, 156, 173, 210.

²⁵ Louisa Li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pp. 99–100.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October 2019.²⁶ Unlike Russia, with its eventual denunciation of Stalin’s murderous reign, the CCP has proven ideologically incapable of acknowledging and atoning for its genocidal history. Through *Media Warfare*, the CCP tries to ensure the CCP’s subjects in the PRC will never know the truth of Mao’s murderous reign.

While *Media Warfare* is simply one weapon in the CCP’s complex political warfare apparatus, it has a monumental impact.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the PRC’s *Media Warfare* machine “has mastered the power of symbol and symbolism in the mass media and social media era.” As a consequence of relentless exposure to PRC media, many Chinese eagerly embrace the CCP’s hyper-nationalistic “patriotic education” programs. Also, as part of this internal *Media Warfare*, those residing in the PRC face censorship and thought control unimaginable to most citizens of liberal democracies.²⁷

Externally, through its extensive propaganda and influence outlets, Beijing savages rules or actions that, in the CCP’s view, “contain China’s power” or “hurt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Meanwhile, PRC foreign ministry and propaganda organs lambast as “immoral” those who criticize its egreg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as “racist” those who object to overseas Chinese malign influence activities.²⁸

²⁶ Laurence Brahm, “Nothing Will Stop China’s Progress” (October 2,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26, 2020, 《*China Daily*》,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910/02/WS5d940a3aa310cf3e3556e93d.html>.

²⁷ Li Yuan, “China Masters Political Propaganda for the Instagram Age” (October 5,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26, 2020,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05/technology/china-propaganda-patriotism.html>.

²⁸ Liu Chen, “U.S. Should Stop Posing as a ‘Savior’” (September 27,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26, 2020,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aily*》, <http://faujireporter.com/blogs/us-should-stop-posing-as-a-savior/>; Amy King, “Hurting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ebruary 15, 2017),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Wilson Cente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hurting-the-feelings-the-chinese-people>; “China Slams Use of Bringing up Human Rights Issues with Political Motives as ‘Immoral’” (December 12,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Xinhua*》,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12/11/c_137666717.htm; Ben Blanchard, “China’s Top Paper Says Australian Media Reports Are Racist”.

Media Warfare in Support of the PRC's Hegemonic Ambitions

Since 2004, the CCP has directly linked *Media Warfare* (especially involving foreign media) to its national security. Beijing seeks to “guide the international narrative on important issues like Taiwa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 and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overseas”.²⁹ In a May 2020 report to Congress,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highlighted the global impact of PRC *Media Warfare*: “China’s party-state controls the world’s most heavily resourced set of propaganda tools. Beijing communicates its narrative through state-run television, print, radio, and online organizations whose presence is prolifera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³⁰

The narratives these media platforms present promote positive views of a peaceful “Rising China” as well a benign perspective of *The China Model* (the CCP’s totalitarian regime);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the PRC and openness to PRC investment and strategic engagement abroad; and suppress or curtail negative coverage of PRC’s political system. The PRC’s latest addition to its narratives presents the CCP’s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style” as not simply benign: it is now the mode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lleng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both democracy and U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³¹ The breadth and scope of activities to convey these narratives is expansive and should be of urgent concern to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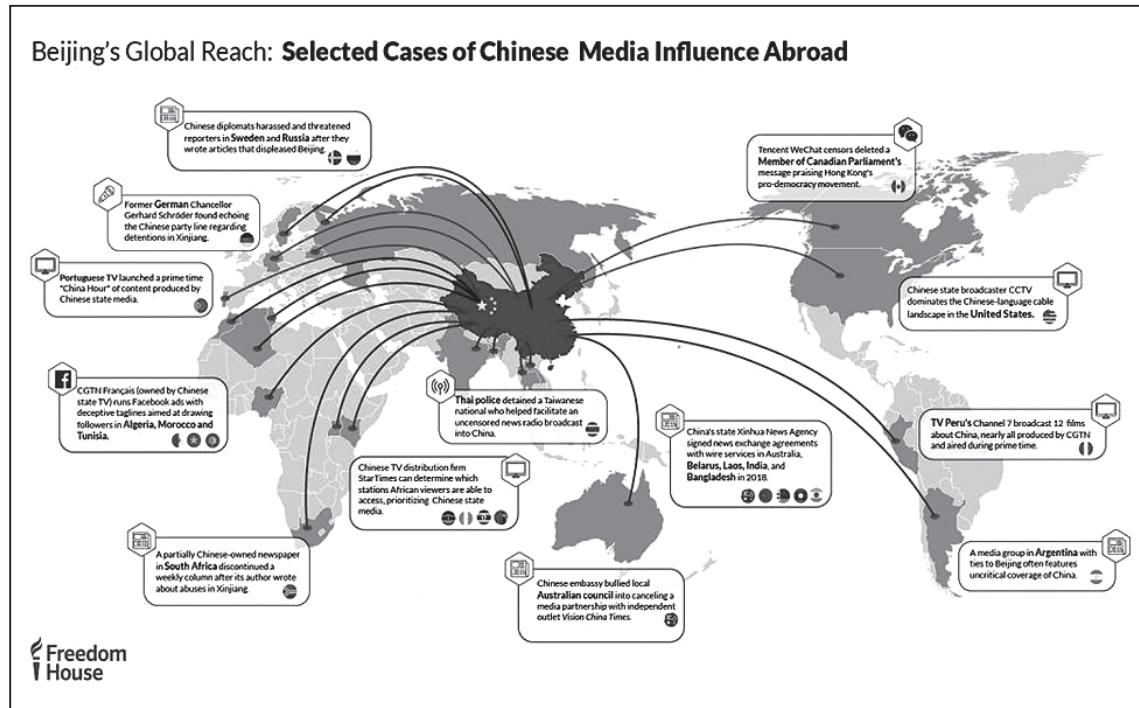
²⁹ Elizabeth Bachman, “Black and White and Red All Over: China’s Improving Foreign-Directed Media” (August 2020),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20, 《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 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DRM-2020-U-027331-1Rev.pdf.

³⁰ Donald J. Trump,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20,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³¹ Sarah Cook, “The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of China’s Globalizing Media Influence,”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Freedom and Media Report 2019》,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and-media/2019/media-freedom-downward-spiral>.

and democracies worldwide. Figure 1-1, from the *Freedom House 2019 Freedom and Media Report*, depicts examples of the scope of these activities.³²

Figure 1-1: Selected Cases of Chinese Media Influence Abroad



Source: Sarah Cook, "The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of China's Globalizing Media Influence," *《Freedom and Media Report 2019》*,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and-media/2019/media-freedom-downward-spiral>.

Freedom House highlights these current trends in the CCP's global *Media Warfare* aspirations: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various proxies have rapidly expanded their influence over media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channels abroad. As a result, the*

³² Cook, "The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of China's Globalizing Media Influence".

CCP has enhanced its ability to interfere aggressively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it choose to do so.

- *Chinese authorities influence news media content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hree primary strategies: promoting the CCP's narratives, suppressing critical viewpoints, and managing content delivery systems.*
- *These efforts have already undercut key feature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best practices for media freedom by undermining fair competition, interfering with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ies, weakening the rule of law, and establishing channels for political meddling.*

The report concludes (perhaps over optimistically) that policymakers and media development donors in democracies “will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coming years in countering the potential negative impact of Beijing’s foreign media influence campaigns”. In the meantime, Beijing’s *Media Warfare* forces continue to shape the media environment worldwide, to include censoring and co-opting news media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on foreign soil.

The CCP’s censorship ensnares the news media on Taiwan, of course, as examined later in this study. It also ensnares American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 chastised in *The Washington Post* for “essentially impor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denial of free speech.” In fact, the CCP routinely censors world-famous brands including Marriott, United Airlines, Cathay Pacific Airways, Givenchy, and Versace, as well.³³ Beijing is quite clear in conveying its coercive

³³ “The Day the NBA Fluttered before China” (October 7,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the-day-the-nba-fluttered-before-china/2019/10/07/21638f14-e926-11e9-9c6d-436a0df4f31d_story.html; Amy Qin & Julie Creswell, “China Is a Minefield, and Foreign Firms Keep Hitting New Tripwires” (October 8,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08/world/asia/china-nba-tweet.html>.

censorship requirements, as reflected in a *Global Times* headline: “Global Brands Better Stay Away from Politics.” The article condemned “so-call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carried explicit and implicit threats to those who did not toe the CCP line.³⁴

Like Taiwan, America’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s a major target and tool for PRC *Media Warfare*. Hollywood has been co-opted “to avoid issues that the CCP would consider sensitive and produce soft propaganda movies that portray China in a positive light to global audiences.”³⁵ Through Hollywood, the CCP influences American and other foreign audiences to accept the PRC’s narratives on such issues as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ccording to cyber security policy expert Dr. Ji-jen Joseph Hwang.³⁶ Dr. Hwang cites TV series such as the *Netflix* series “Away”, which conveys PRC propaganda narratives that will be subliminally assimilated by American, overseas Chinese, and other audiences. By the PRC influencing these audiences this way, PRC *Media Warfare* aims to have Americans, overseas Chinese, and other foreign audiences ultimately influence Taiwan.

Economic coercion is another means by which the PRC exports its *Media Warfare*, while *Media Warfare* helps Beijing open the door for its economic expansion. As one example, the CCP uses the promise of its global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lso known as One Belt One Road) to build what the *China Daily* describes as “a new platform for world

³⁴ “Global Brands Better Stay Away from Politics” (October 7,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20, *《Global Times》* ,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66183.shtml>.

³⁵ Ross Babbage, *Winning Without Fighting: Chinese and Russian Political Warfare Campaigns and How the West Can Prevail, vol. I*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9), p. 36.

³⁶ Ji-jen Joseph Hwang, Associate Faculty,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Interviews by the author in Taipei, Taiwan, September 21 and October 16, 2020.

economic cooperation.”³⁷ China’s global news media coverage of BRI presents a relentless refrain of BRI’s promise. One small but significant example is a widely distributed *China Daily* article in July 2020, in which PRC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praised Xi Jinping for proposing BRI in 2013, and claimed BRI is “a new public good for the worl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common development”. Wang boasted that “by the end of January, 138 countries and 3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signed 200 cooperation documents with China on joint buil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³⁸

The BRI story is not so rosy, of course. David R. Stilwell, the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characterizes the BRI and other PRC economic coercion schemes less charitably than *China Daily* and Wang Yi. Stillwell reports that, through BRI, Beijing employs “market-distorting economic inducements and penalties, influence operations, and intimidation to persuade other states to heed it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agenda.”³⁹ Former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ficial Robert Spalding describes the BRI as “infrastructure warfare.” It may be, he writes, “the most subtle and most corrosive of China’s unrestricted aggressions. Though it is always packaged in PRC media as generous ‘win-win’ development deals, the ultimate goal is a bait-and-switch in which infrastructure is provided but full control of the platform is never fully

³⁷ Yang Han & Wen Zongduo, “Belt and Road Reaches out to the World” (September 30,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com.cn/global/2019-09/30/content_37513299.htm.

³⁸ Desheng Cao, “Xi’s Thought on Diplomacy Shares Visions” (July 21, 2020) , visited date: October 20, 2020, 《*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2007/21/WS5f1624d8a31083481725ad84.html>.

³⁹ David R. Stilwell, “U.S. Polic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ong Kong,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Other Issues” (September 18,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United States Senate*》,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hearings/us-policy-in-the-indo-pacific-region-hong-kong-alliances-and-partnerships-and-other-issues>.

given. It remains in the hands of Beijing.”⁴⁰ But the statements by Stillwell and Spalding received far less public attention than that allowed Wang, as a result of the PRC’s massive global media reach.

Of equal concern, the PRC employs *Media Warfare*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its borders “to undermine academic freedom, censor foreign media, restric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curb civil society.”⁴¹

The PRC employs an extensive and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United Front strategy to divide Taiwanese society by attempting to “sow divisions in Taiwan” and “lure Taiwanese people to support pro-China ideas and unification with China.”⁴² In 2015, the CCP issued the first official regulation issued that “comprehensively governs United Front work and more importantly seeks to institutionalize, standardize, and establish procedures regulating this work.” The regulation explicitly links “the unification of Taiwan to the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hina dream’.”⁴³ Taiwan authorities estimate that the PRC spends more than \$337 million annually on UFWD recruiting efforts in Taiwan, and there might be additional “invisible funding,” as well.⁴⁴ The *Taipei Times* notes that the PRC uses economic incentives to target “local townships, young people and students, Chinese spouses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pro-China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temples, descendants of

⁴⁰ BGen Robert Spalding, USAF (ret), *Stealth War: How China Took Over while America’s Elite Slept* (New York: Portfolio/Penguin, 2019), pp. 162–63.

⁴¹ Ratner,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⁴² Discussions with senior Republic of China political warfare officers at Fu Hsing Ka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2018-19.

⁴³ Russell Hsiao, “China’s Relations with U.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Europe and the Asia Pacific” (April 5, 2018),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115th Congress.

⁴⁴ Chung Li-hua & Sherry Hsiao, “China Targets 10 Groups for ‘United Front’” (January 15,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20, 2020, 《*Taipei Times*》,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8/01/15/2003685789>.

Chinese who retain roots in China, labor groups, farmers' and fishermen's associations, and military veterans.” Those who collaborate with the CCP are given public recognition in the media and/or economic rewards.⁴⁵

But Taiwan is only one democracy of many impacted by the CCP. As President Trump reported to Congress, “Beyond the media, the CCP uses a range of actors to advance its intere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open democracies. CCP United Front organizations and agents target businesses, universities, think tanks, scholars, journalists, and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offic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attempting to influence discourse and restrict external influence inside the PRC.”⁴⁶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Europe, Ocean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South America, the Arctic nations, and Africa have all belatedly awoken to the remarkable degree to which the PRC’s malign influence, particularly *Media Warfare*, has infiltrated their regions in pursuit of Beijing’s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terests.⁴⁷ Canada and the United

⁴⁵ Chung & Hsiao, “China Targets 10 Groups for ‘United Front’”.

⁴⁶ Trump,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⁴⁷ John Garnaut, “Australia’s China Reset” (August,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20, 2020, [《Monthly》](https://www.themonthly.com.au/issue/2018/august/1533045600/john-garnaut/australia-s-china-reset#mtr); Didi Kirsten Tatlow, “Mapping China-in-Germany” (October 2,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15, 2020, [《Sinopsis》](https://sinopsis.cz/en/mapping-china-in-germany/); Austin Doehler, “How China Challenges the EU in the Western Balkans” (September 25,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20, [《Diplomat》](https://thediplomat.com/2019/09/how-china-challenges-the-eu-in-the-western-balkans/); Grant Newsham, “China ‘Political Warfare’ Targets U.S.-Affiliated Pacific Islands” (August 5,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20, [《Asia Times》](https://asiatimes.com/2019/08/china-political-warfare-targets-us-affiliated-pacific-islands/); Derek Grossman et al., *America’s Pacific Island Allies: The 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and Chinese Influenc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9); C. Todd Lopez, “Southcom Commander: Foreign Powers Pose Security Concerns” (October 6,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2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1981449/southcom-commander-foreign-powers-pose-security-concerns); Heather A. Conley, “The Arctic Spring: Washington Is Sleeping through Changes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eptember 24, 2019),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Foreign Affairs》](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ommons/2019-09-24/arctic-spring); Andrew McCormick, “Even If You Don’t Think You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a Has a Big Relationship with You” (June 20, 2019),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Columbia Journalist Review》](https://www.cjr.org/special_report/china-foreign-journalists-oral-history.php).

States have had equally rude awakenings regarding the efficacy of PRC united front operations, *Media Warfare*, and other forms of coercion, repression, and violent attacks within their borders.⁴⁸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also alerted many nations to the PRCs harmful intentions and influence, despite Beijing's extraordinarily aggressive global propaganda campaign.⁴⁹

Of equal concern, as the PRC has co-opted maj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exercising extraordinary control and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UN),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OIC),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Beijing's "decade long campaign to secure more clout at the United Nations is now helping shield Beijing from international scrutiny," according to a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⁵⁰

John Garnaut, a former senior advisor to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B. Turnball, notes the nature of many countries' long-overdue awakenings concerning PRC political warfare as well as the lack of consensus on how they should respond:

Belatedly, and quite suddenly, political leaders, policy makers and

⁴⁸ Tom Blackwell, "How China Uses Shadowy United Front as 'Magic Weapon' to Try to Extend Its Influence in Canada" (January 28, 2019),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National Post*》, <https://nationalpost.com/news/how-china-uses-shadowy-united-front-as-magic-weapon-to-try-to-extend-its-influence-in-canada>; Alexander Bowe,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8).

⁴⁹ "World against the CCP: China Became the Target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May 21, 2020),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Chinascope*》, <http://chinascope.org/>.

⁵⁰ Yaroslav Trofimov, Drew Hinshaw & Kate O'Keeffe, "How China Is Taking Ov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ne Vote at a Time" (September 29, 2020),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china-is-taking-ov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one-vote-at-a-time-11601397208?st=znpa21rp9j7kf75>; Kenneth Roth et al.,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20: China's Global Threat to Human Rights*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HRW), 2020), pp. 8-9.

*civil society actors in a dozen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scrambl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a form of China's extraterritorial influence described variously as 'sharp power,' 'United Front work'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He adds that "a dozen [other nations] are entering the debate.....but none of these countries has sustained a vigorous conversation, let alone reached a political consensus.*⁵¹

The use of *Media Warfare* is not unique to the PRC, of course. All nation-states conduct influence operations that include *Media Warfare*, such as public affairs, public relations, and public diplomacy, to secure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During the Cold War,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artners and allies engaged in an ultimately successful political warfare effort, a major part of which involved *Media Warfare*, to bring down the Soviet Union's brutal Iron Curtain that divided much of the world. During China's civil war, the KMT also employed *Media Warfare* operati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s, and continued to employ it for decades against the PRC following the ROC's retreat to Taiwan in 1949. The ROC included in this battle a means of communicating with and combatting the PRC that it called *Media Diplomacy*.⁵² These opera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broader propaganda efforts, were sophisticated if not always effective. They have been conducted through an array of organizations and through traditional (print, internet, TV and radio news broadcasts) as well as non-traditional means (video news releases, satellite broadcast, movies, TV entertainment programming), and targeted *Overseas Chinese* as well as audiences within the PRC and in Taiwan.⁵³

⁵¹ Garnaut, "Australia's China Reset".

⁵² Gary D. Rawnsley, *Taiwan's Informal Diplomacy and Propoganda, Studies in Diplomacy*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p. 106-112.

⁵³ Rawnsley, *Taiwan's Informal Diplomacy and Propoganda, Studies in Diplomacy*, pp. 22-135.

But the PRC's version of political warfare is different than that of other nations, and the goals and intensity of its *Media Warfare* are unique, according to Singaporean diplomat Bihahari Kausikan. A highly respected expert of PRC malign influence, Kausikan notes that the PRC is a totalitarian Leninist state that takes a “holistic approach which melds together the legal and the covert” in conjunction with “persuasion, inducement and coercion.” Importantly, he argues that the aim of the PRC is not simply to “direct behavior but to condition behavior..... In other words, China does not just want you to comply with its wishes. Far more fundamentally, it wants you to think in such a way that you will of your own volition do what it wants without being told. It’s a form of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⁵⁴

As it wages global *Media Warfare* to achieve its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military goals, the PRC exports authoritarianism, as detailed in studies by respect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and Human Rights Watch*. Beijing intentionally undermines the credibility of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 freedoms to bolster support for its own totalitarian regime, which it calls the *China Model*.⁵⁵

To this end, the PRC continues its *Media Warfare* to take control of the territory and people of Taiwan.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people of Taiwan must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combat PRC *Media Warfare* so that it can retain its hard-won democracy, sovereignty, and

⁵⁴ Bihahari Kausikan, “An Expose of How States Manipulate Other Countries’ Citizens” (July 1, 2018),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an-expose-of-how-states-manipulate-other-countries-citizens>.

⁵⁵ Juan Pablo Cardenal et al.,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 Roth et al.,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20: China’s Global Threat to Human Rights*, pp. 1-20, 130-42; Cook, “The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of China’s Globalizing Media Influenc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eedoms.

Taiwan has seen significant successes in the past 12 months. Most important is President Tsai Ing-wen's personal leadership in this effort, behind the scenes in mobilizing assets and most publicly visible in speeches such as her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⁵⁶ Also of particular note are the legislative achievements designed to assist the courts and law enforcement and intelligence officials. Nevertheless, there is more to do.

Legal Foundations: Improving But Still Lacking

Eight years of the Ma administration's pro-Beijing policies allowed the PRC a wide range of *media warfare*, espionage, and other corrosive malign influence successes against Taiwan.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were ill prepared and, in some cases, not interested, in taking on the fight. Consequently, despite being well aware of this existential threat, it took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government until 2019 to begin to fight back effectively. J. Michael Cole attributes the delayed response, in part, "to forces in the opposition, which used democracy against itself to create a 'moral equivalence' by depicting any measure and legislative amendment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address hostile external influences as 'undemocratic.'"⁵⁷

When Tsai assumed the presidency, the existing laws that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xecutive branch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illegal

⁵⁶ Ing-wen Tsai, "President Tsai Ing-Wen Inaugural Address" (May 20, 2020), visited date: November 10, 2020,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https://english.president.gov.tw/News/6004>.

⁵⁷ J. Michael Cole, "Democracy Under Fire: China's Political Warfare Against Taiwan During President Tsai Ing-Wen's First Term" (July, 2020),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deslibris*》, <https://www.deslibris.ca/ID/10104436>.

acts in support of the PRC include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the *Political Donations Act*, and the *Organized Crime Prevention Act*. While there were some successful prosecutions, these legal foundations proved insufficient and it was clear that new laws would be required to empower the courts and intelligence and law-enforcement agencies to effectively confront the PRC's highly sophisticated political warfare. One major problem that had to be overcome was, posed by the ROC Constitution: Taiwan authorities were unable to categorize the PRC as an “enemy state”.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legal limitation was that media owned by PRC-controlled entities and pro-Beijing groups could not be prosecuted for aiding the PRC in its *Media Warfare* against Taiwan.

In 2019, the Legislative Yuan amended the *Criminal Code* to help law enforcement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act against individuals who collude with enemy forces in PRC, to include Macau, Hong Kong, and elsewhere.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also addressed weak laws that, for example, imposed small penalties for passing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o CCP agents. This longstanding failure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was a tremendous political warfare victory for the PRC, as it not only allowed it to more easily recruit spies in Taiwan but it also corroded U.S. faith in the value of working with Taiwan’s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o the Criminal Code, bills gov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that were amended included the *Act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Mainland Area*, the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As important, on December 31, 2019, the LY passed the *Anti-Infiltration Act*. This act prohibits intervention in Taiwan’s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through “infiltration sources” such as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or organizations affiliated with or sponsored by a government, political party or other political group of a foreign hostile force”. Under this act, a hostile foreign force is defined “as a country or political entity at war or engaging in a military standoff with Taiwa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hina”.⁵⁸

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C and *Media Warfare* attacks poses a problem for Taiwan’s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hough, due to limited assets. This allows Beijing “plausible deniability”.⁵⁹

Also, there remains an “absence of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to govern the media, especially the ‘grey zones’ involving new media and social media.” Punitiv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against media outlets that willingly generate or distribute false content are insufficient. One problem is the funding of these outlets: the businesses that fund them “have billions of dollars in their bank accounts and which receive large subsidies from China”. Some have already accused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of instituting a “Green Terror” as a result of its efforts to improve legal authorities to confront PRC political warfare with stronger laws. If its actions are not properly explained to the public and justified if, the administration may appear to be “excessively harsh”, which “would give Beijing what it wants by undermining Taiwan’s democratic values”.⁶⁰ Consequently, Taiwan has not yet pushed hard for regulating PRC-affiliated *Media Warfare* platforms.

⁵⁸ “Anti-Infiltration Act Passed by Taiwan’s Legislature” (January 2, 2020),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Taiwan Today*》, <https://taiwantoday.tw/news.php?unit=2,6,10,15,18&post=168755>; “Taiwan Passes Law Targeting Chines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December 31, 2019),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Associated Press*》, <https://apnews.com/article/43e9cf4cd5190c6c296854f88cfbef78>.

⁵⁹ Aaron Huang, “Combatting and Defeating Chinese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2020 Elections”.

⁶⁰ Cole, “Democracy Under Fire: China’s Political Warfare Against Taiwan During President Tsai Ing-Wen’s First Term”.

Stronger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required, as is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usefu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Nine major recommendations to address strategic shortfalls in Taiwan’s battle against PRC *Media Warfare* follow.

Recommendations

- 1. Mand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Taiwan strategy to counter general PRC political warfare, with appropriate organization, training, manpower, and funding.** *Media Warfare* must be confron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general PRC *Political Warfare* it supports. Accordingly, through legislation,
 - a. mandate a national counter-Political Warfare strategy,
 - b. appoint a highly respected coordinator for Political Warfare within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c. establish a strategic operational center of gravity with broad authority to execute the strategy, such as a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gency* in Recommendation 2.
 - d. develop counter-political warfare primary and/or secondary career paths in diplomatic and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generally aligned with the existing military career path.
 - e. as part of the strategy, mandate systematic whole-of-society education programs (See Recommendation 4).

As first steps, Taiwan must first state its goals in combating political warfare, and then develop a “theory of victory” and an end state.”⁶¹ Part of this strategy should focus on building a coalition of democratic allies

⁶¹ Ross Babbage, *Winning Without Fighting: Chinese and Russian Political Warfare Campaigns and How the West Can Prevail*, vol. I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9), p. 80.

to jointly counter such PRC warfare and win this battle of ideas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2. Establish a 21st Centur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gency (SCA) to execute the Counter-Political Warfare strategy, under direct control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SCA would help focus the many useful-but-diffused counter-*Media Warfare* activities within the government, such as MOFA’s successful education and fake news debunking programs and MND’s superb online work by elements of the Political Warfare and Cybersecurity staffs. The SCA should be staffed with carefully selected personnel from all key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through recruiting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and in partnership with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e breadth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ability must span Strategic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Economic & Commercial, Legal, Law Enforcement, Intelligence, Foreign Policy, and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Political Warfare functions. Augmentation from private enterprise, such as expertise from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creative” and media data professionals, is essential for success, as these “out of the box thinking” capabilities do not normally reside in civil service or the media. Such an organization should be mandated and resourced on an urgent basis. A standard, mandatory *Mission and Functions Orientation Course* for all newly joining SCA personnel is essential: the rationale is that Taiwan no longer has education programs to prepare personnel to fulfill the crucial counter-Political Warfare/*Media Warfare* functions, so such an orientation is necessary to align all new SCA personnel from across the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civil society, the legal community, and the news media.

3. Institutionalize 2020 counter-election interference successes to ensure capacity to undertake such whole-of-society responses over the long term.

- a. Codify ministry/agency policies and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 that should have been written within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based on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the past two election cycles.
- b. Improve the policies and SOPs with periodic workshops and test them periodically with table-top exercises and war-games. *Media Warfare* is an art even with an SOP in place, and it requires practice. To develop decision-making skills and 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agility, regular training programs must include workshops, tabletop exercises, and war games for those officials engaged in the effort.

4. Establish systemat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within its government, business, industry, academic,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communities regarding PRC political/media warfare operations.

- a. Perhap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pose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gency,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National Defense, Justice, Education, and Commerce, with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should cooperate to systematize courses of varying lengths for senior-level and intermediate-level professionals. Entry-level courses should also be planned for students within the Foreign Service, military, intelligence, commerce, public affairs,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 b. This education program would be voluntary for individuals within private-sector industri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ut

compulsory for government workers, federal contractors, and students attending Taiwan-governmen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imilarly, the private sector and civic groups should initiate public information programs in coordination with news media organizations.

- c. The focus of these courses will be on building internal defenses within the most highly valued PRC target audiences: elected officials, senior policy makers, thought leaders, national security managers, and other information gatekeepers. Retirees and those soon to be retired are also key audiences for this education program, based on PRC successes co-opting this influential segment of Taiwan's population. Similar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al, and public education programs were employed successfully during the Cold War, with threat briefs and public discussion a routine part of each.
- d. Part of the training, as addressed in Recommendation 3, must include workshops, tabletop exercises and wargames for those officials and civil society representatives engaged in the effort.

5.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USG) to improve each other's ability to deter, detect, confront, and defeat PRC Media Warfare.

- a. Part of this cooperation should entail continuation of the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GCTF) conferences on media literacy and combating disinformation. Push for broader participation from countries such as the Baltic States, which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combatting Russian *Media Warfare*, as well as Japan and Sweden which have also officially joined the effort.

- b. Seek USG support to establish consist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U.S.-based social media companies an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The most popula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Taiwan* are U.S.-based companies. Facebook and YouTube were the top two social media outlets for Taiwanese internet users as of January 2019, and Facebook Messenger, Instagram, Twitter, and WhatsApp were also in the top eight.⁶²
- c. Pursue cooperation with the USG to more effectively emplo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 counter PRC Cognitive Warfare in general and *Media Warfare* in particular. Taiwan has already begun to use AI to identify Social *Media Warfare* by automatically identifying and deleting content. The PRC emphasizes using AI to generate and spread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so it is critical for Taiwan to accelerate its efforts in this technological race if it is to preserve its independent media environment.⁶³
- d. Establish an information exchange mechanism with the U.S. that provides systematic passing of information gleaned from each country's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n PRC *Media Warfare* globally. Taiwan demonstrated superb abilities to monitor *Media Warfare in Taiwan* in the last election cycle, but it has less capacity to do so abroad. Both Taiwan and the U.S. have unique capabilities to monitor and assess the PRC's *Media Warfare* activities, but there is currently

⁶² Linda Zhang, “How to Counter China’s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in Taiwan” (September-October 2020), visited date: November 15, 2020, 《**Army University Press**》, <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Journals/Military-Review/English-Edition-Archives/September-October-2020/Zhang-Disinformation-Campaign/>.

⁶³ Zheng, “How to Counter China’s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in Taiwan”.

little systematic, consistent exchange of the information. This routine exchange would require more effort in the diplomatic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to monitor these *Media Warfare* operations abroad, to include trends, characteristics, and people and entities involved, but the payback would be substantial. The exchange would allow discussion of current efforts to combat *Media Warfare* and best practices. This collection function regarding *Media Warfare* will be new for both countries, but it will be worth the effort as it will expand each country's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of the threat and allow for more effective whole-of-society responses by each government. Further, this exchange mechanism should also afford the means to request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monitoring and assessing mission.

- e. Work with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and State Department to sanction PRC *Media Warfare*-related entities under applicable laws and orders. As proposed by U.S. diplomat Huang, sanctions could be used to block these entities from hiring local agents and intermediaries in target countries for *Media Warfare* purposes.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are often created and spread not by the attacking entities, but local intermediaries funded by these entities. In Taiwan's case, notes Huang, these intermediaries are compromised media outlets. Without local knowledge, expertise, and support, these attacks will likely be easier to identify and less effective in manipulating public opinion and discourse.⁶⁴

6. Establish a regional Asia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enter of Excellence (ASCCE). Taiwan showed it is capable of global leadership

⁶⁴ Huang, "Combatting and Defeating Chinese Propaganda and Disin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Taiwan's 2020 Elections".

as it led the way in combatting COVID-19: it can show global leadership in combatting PRC *Media Warfare* as well. It should establish the ASCCE, which would be similar to the Finland-based *European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 and the NATO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entre of Excellence*. By establishing the ASCCE, Taiwan will build more powerful capacity in support of its own preservation; by focusing the ASCCE *outward* with an international focus, Taiwan helps build the capacity of like-minded nations and partially circumvents the PRC's diplomatic isolation campaign. The ASCCE would be a whole-of-government effort, but in practice its primary Taiwan government sponsors would be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National Defense, Justice, Education, and Commerce, with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7. **Pass legislation that allows for more aggressive prosecution of Media Warfare-related activities in order to diminish the offensive power of PRC news media and social media.** Freedom of the press must be scrupulously safeguarded in Taiwan's democracy, but allowing the totalitarian PRC to dominate Taiwan's news media is the path to national suicide. Taiwan passed the vitally important *Anti-Infiltration Law*, but reportedly has not yet focused on regulating the media platforms; discussions with academics indicate this may be because Taiwan had success focusing on crowd-sourced fact checking, rapid government debunking, and raising media literacy for susceptible groups. But ultimately stronger laws and regulations will be required. As stated, punitiv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against media outlets that willingly generate or distribute false

content are insufficient.⁶⁵ It is, therefore, imperative to develop and pass stronger legislation, perhap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 a. Based on the U.S. experience with failed enforcement regarding PRC mal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preparation for developing this legislation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review existing laws,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that apply to PRC *Media Warfare* to ensure the existence of clear mission statements, requirements for action, assessments of success, as enhanced analytical, investigative, and legal training.⁶⁶ If thes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are lacking, they should be included as mandates in the legislation.
- b.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each play key roles in investigating, disrupting, and prosecuting PRC *Media Warfare*. In the legislation, task these and other relevant ministries, bureaus, and agencies with investigating, disrupting, and prosecuting *Media Warfare* activities, and hold these organizations accountable for success.
- c. Legal experts should examine legislative remedies to protect Taiwan citizens from interference by PRC-affiliated news media and businesses with free speech, censorship, and intimidation through direct threats to corporate business interests and physical harassment of individual journalists and their families.

8. Raise the cost of the PRC's Media Warfare, both to the CCP organs

⁶⁵ Cole, “Democracy Under Fire: China’s Political Warfare Against Taiwan During President Tsai Ing-Wen’s First Term”.

⁶⁶ Peter Mattis, “U.S. Responses to China’s Fore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March 21 2018),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15th Congress.

and to those in Taiwan that engage in such malign influence or facilitate it. To this end, publicly expose covert and overt PRC political warfare operations on a routine basis.

- a. Through legislation and/or executive order, Taiwan should mandate an annual,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led, Ministry of Justice-supported publicly disseminated report on the CCP's Political/*Media Warfare* conducted against it.
- b. The annual report would focus on PRC united front interference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It would include practical advice for ordinary citizens about how to recognize and avoid those threats. Such an annual report on the CCP's activities would force Taiwan's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to come together to discuss the problem and make decisions about what information needed to be released for public consumption. It would also help raise awareness within the disparate parts of Taiwan's government that may not cooperate together on a routine basis. A classified annex could be produced for internal government consumption.⁶⁷ This annual report could be part of a broader annual report on PRC Political Warfare activities against Taiwan.
- c. To operationalize the public exposure of PRC *Media Warfare*, Taiwan's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work with academic institutions, journalists, think tank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o map out PRC *Media Warfare* assets and operations and expose those that can be publicly uncovered without harming national security.
➤ One approach is to design a “PRC Narrative Tracker” that can

⁶⁷ Mattis, “U.S. Responses to China’s Fore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expose PRC *Media Warfare* fronts, enablers, and operatives and hold them accountable, similar to the efforts by Doublethink Lab during the COVID-19 “Infodemic”. This tracker could, for example, reveal news organizations that routinely parrot PRC talking points and narratives: this information could be objectively provided to the public so the public could see the patterns and make decisions accordingly. As Cole points out, the media organizations may not be capable of being shamed into stopping support for PRC *Media Warfare*, but public exposure is useful to protect the credibility and viability of Taiwan’s democracy.

➤ Other step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clude publicly identifying those involved in foreign censorship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s media. For example, many people in Taiwan are likely unaware that PRC-based news organizations are organs of the CCP and that their reporting is directed by the CCPs Propaganda Department, as opposed to the reporting of most commercial news media organization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ubliciz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and law firms involved in supporting PRC *Media Warfare* enterprises, as well as academics and universities that facilitate and defend PRC *Media Warfare*.

9. Encourage academic study and thesis development at government and public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at focus on PRC Media Warfare and how to contain, deter, and/or defeat the threat.

- a. The Taiwan government, with Ministry of Justice in the lead, should support research into this existential challenge and how to combat it. To this end,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other ministries should provide

funding to students researching the subject, and offer internships, assured government employment if qualified, and special high-level recognition and awards to encourage superior students to pursue this field of study.

- b. This government-funded push should cause Taiwan'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to re-think thei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curriculum to encompass a more multi-disciplinary focus. Fields of study that, when clustered, support counter-*Media Warfare* include Law Enforcement-related major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Crisis Communications, Data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lligence/Counterintelligence, National Security, and Advertising/Marketing/Public Relations.

從拉達克到太平洋：印「中」邊境衝突與對「中」包圍網的形成

From Ladakh to Pacific: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ncirclement of China

廖哲偉 (Liao, Zhe-Wei)

陸軍中尉輔導長

壹、前言

2020 年 5、6 月間印「中」兩國陸續於邊境地帶爆發衝突，其中以 6 月 15 日發生在拉達克 (Ladakh) 加勒萬河谷 (Galwan Valley) 的衝突最為嚴重，造成雙方前線士兵嚴重傷亡，¹ 衝突發生後兩國更相繼調兵進入爭議地區展開對峙。²

本文將從 2019 年印度將拉達克與查謨和克什米爾邦 (Jammu and Kashmir) 分治開始，闡述此次印「中」邊界衝突的根本原因並分析雙方緊張關係的加劇，終將迫使印度開始積極尋求亞洲地區周邊盟友的支持、實質鞏固美國的印太戰略，最終遠從拉達克地區到太平洋一線的廣大地帶上，將

¹ AJAI SHUKLA, "How China and India Came to Lethal Blows" (June 19, 2020), visited date: July 12, 2020,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9/opinion/China-India-conflict.html?_ga=2.156077816.2122203080.1594515807-1722049562.1593427098.

² 葉宣，「中印軍方邊境會談實控線兩側調兵遣將」(2020 年 6 月 22 日)，2020 年 7 月 12 日瀏覽，《德國之聲中文網》，<https://www.dw.com/zh/%E4%B8%AD%E5%8D%B0%E5%86%9B%E6%96%B9%E8%BE%B9%E5%A2%83%E4%BC%9A%E8%B0%88-%E5%AE%9E%E6%8E%A7%E7%BA%BF%E4%B8%A4%E4%BE%A7%E8%B0%83%E5%85%B5%E9%81%A3%E5%B0%86/a-53897509>。

會形成一個巨大的國際對「中」包圍網，對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產生重大的地緣政治威脅。

貳、印「中」邊境衝突的根本原因

印「中」兩國於邊境地帶長期存在領土爭議，並數次爆發衝突與對峙事件，從 1980 年代鄧小平向印度提出的「一攬子解決方案」開始談起，³ 概述其如何做為維繫印「中」邊界近 30 年相對穩定的根基，並說明印度於 2019 年將拉達克與查謨和克什米爾邦分治一事，如何影響印「中」邊境的平衡，造成一系列的衝突事件。

一、鄧小平方案與印「中」邊界的穩定

印「中」邊境長期存在的領土爭議，一直是印「中」關係的主軸，並數次發生戰爭、衝突與對峙，鄧小平掌權後，曾於 1979 年對赴「中」訪問的印度外長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提出以「大陸在東線讓步，印度在西線讓步」為基礎；彼此互相擱置爭議的一攬子解決方案。⁴ 印度方面雖未表態接受，但雙方即在 1981 年開始就邊界問題展開一系列定期談判，其中雖於 1986 到 1987 年間印「中」曾短暫於桑多洛河（Sumdorong Chu）一帶發生邊境對峙事件，但時任印度總理的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1988 年赴「中」訪問，在邊界問題上取得了部分進展：雙方商議並成立了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取代原先的副部長級會談；後續在 1990 至 2000 年代，印「中」雖依舊未在領土主權問題上取得實質進展，但就技術細節跟軍事互信方面達成了多項共識，並簽署諸如《關於在中印邊界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

³ 陳牧民，解讀印度：不確定的崛起強權（臺北：五南，2016 年 9 月，初版），頁 149。

⁴ 關嶺，「史海鉤沉 | 吸取毛澤東單方後撤教訓 中印邊界博弈鄧小平不讓步」(2020 年 6 月 23 日)，2020 年 7 月 5 日瀏覽，《香港 01》，<https://www.hk01.com/%E8%AD%B0%E4%BA%8B%E5%BB%B3/489420/%E5%8F%B2%E6%B5%B7%E9%89%A4%E6%B2%89-%E5%90%B8%E5%8F%96%E6%AF%9B%E6%BE%A4%E6%9D%B1%E5%96%AE%E6%96%B9%E5%BE%8C%E6%92%A4%E6%95%99%E8%A8%93-%E4%B8%AD%E5%8D%B0%E9%82%8A%E7%95%8C%E5%8D%9A%E5%BC%88%E9%84%A7%E5%B0%8F%E5%B9%B3%E4%B8%8D%E8%AE%93%E6%AD%A5>。

平與安全的協定》、《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等協議。⁵

期間雙方雖零星有衝突及對峙事件，但大體而言仍以實際控制線為邊界，實質擱置東西兩段的爭議；在東段大陸接受麥克馬洪線 (McMahon Line) 作為臨時邊界，在西段印度默認大陸對阿克賽欽 (Aksai Chin) 地區的控制，⁶ 意即「大陸在東線讓步，印度在西線讓步」的鄧小平方案，雖在名義上不被接受，實質上卻維持了印「中」邊界自 1990 年代以來相對的長期穩定。

二、拉達克分治與平衡的打破

此次發生衝突的印屬喀什米爾過去在印度《憲法》第 370 條的保護下，長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和獨立地位，印度為強化對喀什米爾地區的控制，取消《憲法》第 370 條賦予印屬喀什米爾的獨立地位，並於 2019 年 8 月通過《查謨和克什米爾邦重組法》(Jammu & Kashmir Reorganisation Bill) 將原先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分割為查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兩個直屬中央政府的聯邦屬地。⁷

一方面印度雖得以將中央政府的意志直接貫徹到喀什米爾地區，一方面卻又同時惹惱了在該地區跟印度有著邊界爭議的巴基斯坦和大陸。⁸ 其中因拉達克地區緊鄰大陸實際控制的阿克賽欽地區，且大陸亦宣稱拉達克是大陸領土的一部分，大陸因而視此舉為印度單方面改變西段現況並發出強烈譴責，不予承認。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強調：「對印度片面修改國內法

⁵ 陳牧民，解讀印度：不確定的崛起強權，頁 149-150。

⁶ Sushant Singh, “Line of Actual Control: where it is located, and where India and China differ”(June 1, 2020), visited date: July 5, 2020,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line-of-actual-control-where-it-is-located-and-where-india-and-china-differ-6436436/>.

⁷ K. Venkataraman, “Explained | How the status of Jammu and Kashmir is being changed”(August 5, 2019), visited date: July 5, 2020, 《The Hindu》,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other-states/explained-how-the-status-of-jammu-and-kashmir-is-being-changed/article28822866.ece>.

⁸ 康世人，「印度廢除克什米爾特殊地位 再度引爆南亞火藥庫」(2019 年 8 月 10 日)，2020 年 7 月 5 日瀏覽，《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090135.aspx>。

律，繼續損害中方的領土主權，這一做法不可接受，也不會產生效力」並警告印度政府「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導致邊界問題複雜化的舉動」。⁹面對大陸的抗議，印度外交部發言人庫瑪（Raveesh Kumar）則表示「印度不評論他國內政，同樣也希望其他國家這樣做」指出拉達克分治為印度內政問題，「中」方無權評論。¹⁰

三、無可避免的邊境衝突

2017年6月，大陸企圖在與不丹有領土爭議的洞朗(Doklam)地區築路，引發印度憂慮，因此派軍進行干預，在短暫的對峙事件後，大陸軍隊越界的事件開始頻繁增加，從2016年的273次增至2017年的426次；在2018年雖因莫迪總理與習近平在武漢峰會後減至326次，但在2019年又暴增至660次以上。由此可見，大陸自2017年後對於「中」印邊界問題的處理態度已逐漸轉向更為強硬的「戰狼」模式。¹¹

在戰略上大陸更透過「一帶一路」計畫，逐步擴大在南亞的戰略影響力，面對大陸戰狼式的進逼，迫使印度需要強化邊界地區的防禦能力與基礎建設進行防堵；雙方對邊境地區投入資源與兵力的增加，最終致使緊張態勢持續升高。¹²此次印度加深對拉達克地區控制的行動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要由中央直接治理及建設當地，以強化處理邊界問題的能力，但副作用即是開始打破了原先雙方長期存在的「大陸在東線讓步，印度在西線讓步」的默契，其中衝突前夕印度於北拉達克地區修築的DSDBO公路(Darbuk-

⁹ 康世人，「特派專欄 拉達克劃為印度中央直轄區 牽動中印敏感神經」(2019年8月14日)，2020年7月5日瀏覽，《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8110090.aspx>。

¹⁰ 康世人，「克什米爾直轄分治 印度稱內政北京無權評論」(2019年10月31日)，2020年7月5日瀏覽，《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310401.aspx>。

¹¹ 方天賜，「【中印戰了嗎】方天賜：衝出喜馬拉雅防線的中國戰狼」(2020年6月20日)，2020年7月24日瀏覽，《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00620/GBD2LC5CZLGB5XIEQELYSQWIA/>。

¹² Minnie Chan, "China-India dispute highlights both sides' growing military presence at border"(June 4, 2020), visited date: July 6, 202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3087494/china-india-dispute-highlights-both-sides-growing-military>.

Shyok-DBO Road)，被視為是造成此次衝突的直接原因，¹³此舉導致大陸勢必更為加強在西線的軍事存在以做出回應。¹⁴平衡一但打破，引發衝突的門檻就會降低：雙方的敵對態勢一但升高，接著只要一些意外與摩擦便可能引發衝突，2020 年 5 月發生在班公湖（Pangong Lake）及乃堆拉山口（Nathu-La Pass）的鬥毆事件，¹⁵以及 6 月在加勒萬河谷的流血衝突，都可視為是在上述的大背景下所導致的無可避免的邊境衝突。

參、印太戰略的穩固與對「中」包圍網的形成

近年大陸積極對外擴張，試圖加強對外影響力，美國為制衡大陸，陸續提出亞太再平衡（Asia - 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等主張，試圖保持於東亞地區的優勢，¹⁶惟印度自身的「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與美國所推動之「印太戰略」雖有部分共同利益，但過去印度為避免過度刺激大陸，一直刻意低調；雖在原則上同意與配合，但又並不積極參與。¹⁷

而在印「中」衝突發生後，巴基斯坦隨即違反停火協議，對印度進行炮擊，似以此呼應大陸。而尼泊爾在 2020 年 6 月 13 日通過《憲法》修正

¹³ Sushant Singh, “India builds road north of Ladakh lake, China warns of ‘necessary counter-measures’”(May 21, 2020), visited date: July 6, 2020,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builds-road-north-of-ladakh-lake-china-warns-of-necessary-counter-measures-6421271/>.

¹⁴ Pravin Sawhney, “Here's Why All's Not Well for India on the Ladakh Front”(June 10, 2020) , visited date: July 5, 2020, 《The Wire》, <https://thewire.in/diplomacy/heres-why-all-s-not-well-for-india-on-the-ladakh-front>; Sushant Singh, “Chinese bring more boats to lake in Ladakh, Indians a road”(May 20, 2020), visited date: July 6, 2020,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ladakh-china-border-aksai-chin-pangong-tso-army-road-construction-6418370/>.

¹⁵ Man Aman Singh Chhina , Krishn Kaushik, “Indian and Chinese troops clash in Sikkim, Ladakh”(May 11, 2020), visited date: July 6, 2020,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n-chinese-troops-clash-sikkim-ladakh-6403854/>.

¹⁶ 葉長城，「美國印太戰略的形成、發展及其對臺灣經貿之意涵」(2019 年 8 月 15 日)，2020 年 7 月 7 日瀏覽，《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https://web.wtocenter.org.tw/Mobile/page.aspx?pid=328192&nid=126>。

¹⁷ 李明勳，「2018 年東協與印度關係進展之研析－以東協－印度紀念高峰會及相關會議為例」，東協瞭望(臺北)，第 18 期(2018 年 12 月 28 日)，頁 4-5。

案，將與印度有領土爭議的地區劃入國家地圖中；這種直接挑戰印度的不尋常舉動也被認為背後有大陸的支持。¹⁸ 從 1962 年的「中」印邊界戰爭後，印度便面臨大陸與巴基斯坦結盟的兩線戰爭威脅；巴基斯坦的炮擊與尼泊爾的挑戰必然加深印度的擔憂，可以想見印度勢必將加大其東進力度，透過強化「軟平衡」的作為：更積極參與「印太戰略」及強化美印日澳四邊安全合作，並結合周邊國家共同應對大陸威脅，¹⁹ 作為報復及遏止大陸與強化自身安全保障的手段。

一、印度積極尋求外交合作

2014 年印度由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執政後為發展經濟、擴大外交影響力和制衡大陸，印度積極推動東進政策，加強並深化與東南亞乃至太平洋地區國家的互動與合作，惟自建國以來，印度即奉行「不結盟」的獨立外交政策，致使「東進」雖與美、日兩國在同一地區的相同努力有許多戰略利益重合，但印度迄今仍未與美國或日本有實質而明確的結盟關係。²⁰

然而於 2017 年洞朗對峙事件後，伴隨印「中」緊張關係的加深，印度開始更加積極尋求與週邊國家的合作，2018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Damodardas Modi) 接連訪問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並獲致豐碩成果：例如印度與印尼決定共同在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入口的沙璜港 (Sabang) 推動並投資可作為軍港的深水港與自由貿易區，一方面有助印度擴大在東南印度洋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與印度的結盟也能協助印尼平衡大陸在南海上的強勢作為所引發的國安擔憂。²¹

而此次與大陸的邊境衝突更加深了印度透過外交結盟對抗大陸的趨勢，例如印度國防部長辛赫 (Rajnath Singh) 與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 (Mark T.

¹⁸ 「單挑中巴尼泊爾 印度週內與 3 鄣國邊界糾紛」(2020 年 6 月 18 日)，2020 年 7 月 25 日瀏覽，《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6180220.aspx>。

¹⁹ 方天賜，「【中印戰了嗎】方天賜：衝出喜馬拉雅防線的中國戰狼」。

²⁰ 張棋忻，「印度對外政策剖析：從『東望』邁向『東進』」(2016 年 7 月 1 日)，國際與公共事務 (嘉義)，第 4 期，頁 91-92。

²¹ 李明勳，「2018 年東協與印度關係進展之研析－以東協－印度紀念高峰會及相關會議為例」，頁 4。

Esper)，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透過電話討論印、美國防合作，誓言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印美國防夥伴關係；同時印、澳兩國總理在 6 月 4 日舉行視訊高峰會，把 2009 年達成的戰略夥伴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同時簽署後勤支援、國防科技合作等多項戰略性協定。而印度對臺灣也做了一次不尋常的外交舉動。印度執政黨人民黨的國會議員雷奇 (Meenakshi Lekhi) 和卡斯旺 (Rahul Kaswan) 以視訊方式參加蔡總統的連任就職典禮，並對蔡總統表達祝賀，強調臺灣與印度共享民主價值將繼續加強印度與臺灣的全面關係。²²

在軍事方面印度也開始積極加強戰備、提升軍事實力並獲得了美、俄兩國的支持：俄羅斯除積極回應印度提出要其加速交付印度向俄國所採購的導彈、彈藥和突擊步槍的要求外，²³ 俄國更承諾要和印度合造第五代戰鬥機，並且直接把部分超音速導彈與戰鬥機技術轉讓給印度。²⁴ 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John Trump) 也於 2020 年 2 月訪問印度時宣布將向印度出售先進軍用直升機，並支持轉讓先進軍事技術，同時持續深化美、日、印、澳四方關係；印、美兩國的聯合聲明更宣布將致力於在印太地區進行更緊密的合作並加強防務聯繫、發展戰略夥伴關係。²⁵

印「中」衝突過後，除了原先已持續強化的軍事合作外，印度更於 2020 年 7 月 20 日與美國舉行名為「航道演習」(Passage Exercise) 的海上聯合軍演，《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 與《印度快報》(Indian Express) 等印度媒體稱這場印美海上聯合軍演是對大陸近期軍事擴張發出的強烈戰略

²²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India expands diplomatic efforts amid border standoff with China” (June 5, 2020), visited date: July 9, 2020,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expands-diplomatic-efforts-amid-border-standoff-china-67365/>.

²³ Manu Pubby, “India requests quick delivery of missiles, ammo from Russia; Amethi factory to launch before summit” (June 25, 2020), visited date: July 9, 2020, 《The Economic Times》，<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india-requests-quick-delivery-of-missiles-ammo-from-russia-amethi-factory-to-launch-before-summit/articleshow/76620736.cms?from=mdr>.

²⁴ 「俄國與中國印度三角關係與俄羅斯套娃」(2020 年 6 月 26 日)，2020 年 7 月 9 日瀏覽，《BBC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3198280#>。

²⁵ Manu Pubby, “Trump India visit: US, India agree to jointly develop arms” (February 26, 2020), visited date: July 9, 2020, 《The Economic Times》，<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trump-india-visit-us-india-agree-to-jointly-develop-arms/articleshow/74310419.cms>.

反制訊號。²⁶ 顯見印度為反制大陸，從戰略與軍事合作上均已開始與美國有一定程度的默契存在，成為美國「印太戰略」賴以鞏固的重要一角。

二、從拉達克到太平洋的包圍網

除了與印度的摩擦外，大陸近年的擴張性外交政策也讓週邊國家深感威脅。

（一）日本與東海

2013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國會施政理念演說中，將大陸在東海的獨斷行為視為對日本主權的挑戰；隨後安倍在施政方針報告中明確表示為因應大陸威脅，將以日美同盟為樞軸，深化與澳洲、印度、以及東協國家的合作。其後安倍積極展開與澳、印兩國的領袖外交，達成共同建構日澳／日印雙邊、日澳美／日印美三邊的軍事合作共識，讓「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逐漸形成；²⁷ 直至2019年2月日本防衛省公布的2019年版《防衛白皮書》，更已經明確把大陸定義為日本面臨的最大威脅。²⁸

（二）東協國家與南海

在南海方面，東協國家因地緣關係與彼此之間的歧異，而不願或不能集體對美「中」的戰略競爭做出明確的選邊。²⁹ 惟大陸近年來在南海日漸強硬的主權要求與擴張已喚起不少東協國家的危機意識，2020年4月正值「新冠肺炎」全球盛行，大陸除在臺海動作頻頻外，在南海亦是；4月初越南一艘漁船被兩艘大陸海警船攔住並撞沉，越「中」兩國在外交上開始起衝突；4月18日，大陸國務院宣布海南省三沙市在有主權糾紛爭議的西沙、南沙

²⁶ 康世人，「對抗中國威脅 印度美國舉行海上聯合軍演」(2020年7月21日)，2020年7月25日瀏覽，《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07210167.aspx>。

²⁷ 林賢參，「日本對南海議題之態度」，全球政治評論（臺中），第53期（(2016年1月1日），頁26。

²⁸ 林彥宏，「日本之安全情勢發展」，在李哲全、王尊彥編，2019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臺北：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19年12月6日），頁43。

²⁹ 李俊毅，「東協之安全情勢發展」，在李哲全、王尊彥編，2019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頁47。

群島上設置「西沙區」、「南沙區」，區政府分駐永興島及永暑礁，³⁰此舉引發越南及菲律賓兩國強烈抗議，並各自重申對西沙及南沙群島擁有主權。³¹

6 月 26 日東協 10 國舉行年度高峰會後，更由向來對「中」態度相對強硬的越南以東協名義發布聲明，³²強調包括南海在內所有的海洋和海上活動都必須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的框架執行，並反對大陸以歷史為由聲稱擁有南海幾乎所有海域的主權。³³

(三) 澳紐與太平洋地區

大陸在南太平洋的擴張行為也引起澳洲、紐西蘭兩國的反彈；大陸於 2017 年提出《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構想》，內容指出要經南海向南進入太平洋，共建「中國 - 大洋洲 - 南太平洋」藍色經濟通道；近年更隨著大陸不斷強化在南太平洋的經濟援助，不斷弱化了澳紐對南太平洋的影響力，目前大陸已經是繼澳洲之後南太地區第二大援助國，面對大陸在南太地區影響力的擴大，紐澳兩國積極推動南太新政，加強在南太地區的區域安全、經濟、軍事合作乃至各式援助，內容包含針對區域安全議題澳紐於 2018 年在「太平洋島國論壇高峰會」(Pacific Islands Forum Summit) 上簽訂的《波耶宣言》(Boe Declaration)，澳洲承諾將對南太地區提供 13 億澳幣援助，並由澳洲「出口融資與保險公司」(Export Finance and Insurance Corporation) 提供總值 20 億澳幣的基礎設施融資的「提升太平洋」(Pacific Step-up) 政策及紐西蘭為與澳、美、法協力加強與南太島國關係的「重啟太平洋」

³⁰ 「南海風波再起：中國在三沙市設行政區，越南抗議，美軍演習」(2020 年 4 月 23 日)，2020 年 7 月 11 日瀏覽，《BBC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382529>。

³¹ 陳妍君，「中國在南海設行政區 菲律賓強烈抗議」(2020 年 4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11 日瀏覽，《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04300406.aspx>。

³² 李俊毅，「東協之安全情勢發展」，在李哲全、王尊彥編，2019 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頁 51。

³³ 「東盟國家齊聲反對中國以歷史為由宣稱的南中國海主權」(2020 年 6 月 28 日)，2020 年 7 月 11 日瀏覽，《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asean-takes-position-vs-china-s-vast-historical-sea-claims-20200628/5480642.html>。

(Pacific Reset) 政策等。³⁴

澳洲長期與美國有軍事同盟關係，並在防止大陸於南太地區擴張上與美國有共同利益，一直是美國印太戰略堅定的支持者，³⁵ 而紐西蘭雖未與美國有直接同盟關係，但與美澳間三方仍有著《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Australia, New Zeal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 存在，而紐西蘭更在《2018 年戰略防禦政策聲明》(Strategic Defence Policy Statement 2018) 首次明示，大陸在南太平洋的擴張已對紐西蘭的國家安全構成重要威脅。³⁶

(四) 美國的明確宣示

自「印太戰略」推行以來，美國早已視大陸為潛在的戰略競爭者。「新冠肺炎」全球爆發後，伴隨大陸「以疫謀霸」的戰狼式外交作為，美國對「中」態度漸趨強硬；³⁷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chael Richard Pompeo) 先後在 2020 年 7 月 13 日及 23 日發表措辭強烈的《南海聲明》(U.S. Position on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³⁸ 及《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³⁹，稱大陸在南海大部分區域的主權聲索均無法理依據，並在 23 日的演說直接將大陸定義為「美國國家安全的真實威脅」和「當前自由世界的最大挑戰」呼籲美國盟友及自由世界國家共同應對大陸挑戰，以「確保我們的自由不受中共破壞」美國的明

³⁴ 黃恩浩、蔡榮峰，「澳紐與南太區域之安全情勢發展」，在李哲全、王尊彥編，2019 印太區域安全情勢評估報告，頁 53-57。

³⁵ 林士清，「美國印太戰略正排擠一帶一路倡議」(2019 年 3 月 13 日)，2020 年 7 月 12 日瀏覽，《北美智權報》，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ditorial/IPNC_190313_1501.htm。

³⁶ 賴怡忠，「沿著五眼五強與 CPTPP 開展的印太戰略新局」(2019 年 1 月 22 日)，2020 年 7 月 12 日瀏覽，《思想坦克》，<https://www.voicettank.org/single-post/2019/01/22/Indo-Pacific-in-2019>。

³⁷ 吳明杰，「中共趁虛而入「以疫謀霸」，美中軍事對峙將全面升溫」(2020 年 4 月 15 日)，2020 年 7 月 25 日瀏覽，《聯合報》，<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906/4491178>。

³⁸ 南海聲明全文，參見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Position on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uly 13, 2020), visited date: July 25, 20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https://www.state.gov/u-s-position-on-maritime-claims-in-the-south-china-sea/>.

³⁹ 蓬佩奧的演講全文，參見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July 23, 2020), visited date: July 25, 20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https://www.state.gov/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確宣示，標誌著美「中」關係的決定性改變，亞太地區的政治格局亦將隨美「中」對抗持續升溫的大格局而波動。

印「中」衝突後印度的外交政策與立場不能不結合美「中」對抗加劇的格局做考量，印度加深對「印太戰略」的參與和跟週邊國家的合作，亦與美國冀望聯合盟友及自由世界國家抗衡大陸的意圖不謀而合，加之以週邊地區國家對大陸近年霸權擴張的警醒；於是沿著大陸邊境，盯衡從拉達克到太平洋的廣大地帶：以美國為首的印度、越南、臺灣、日本及紐、澳等國，在圍堵及抗衡大陸在印太地區的擴張上都有著共同利益，各國雖仍與大陸有著不同程度的經貿往來和合作，但是一個在政治上為共同抗衡大陸而形成的實質包圍網已經悄然成形。

肆、結論

印「中」對峙情況目前仍在持續，不論後續是否以談判協商結尾，雙方的敵對態勢一旦強化固化，必將迫使印度更加積極向東尋求盟友協助，不管有意無意都會在無形中實質鞏固美國提出的「印太戰略」。而大陸近年在亞太地區的擴張，早已讓週邊國家深感警惕，伴隨美「中」對抗激化，⁴⁰ 印度、東海、南海及臺海局勢逐漸升溫，⁴¹ 要遏止大陸持續擴張，甚至進一步採取過激行動；相關國家能否更為堅定地在地緣政治上組成一個可以對大陸形成巨大壓力的實質同盟將會是關鍵所在。

⁴⁰ Thomas L. Friedman, “China and America Are Heading Toward Divorce” (June 23, 2020), visited date: July 12, 2020,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3/opinion/china-united-states-trump.html?_ga=2.54298731.2122203080.1594515807-1722049562.1593427098.

⁴¹ 吳妍，「臺海危機升溫 罕見被 ICG 列全球情勢惡化區」(2020 年 7 月 9 日)，2020 年 7 月 12 日瀏覽，《鏡週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00709edi011/>。

展望與探索月刊第 18 卷

研究論文索引

Article Index of the Prospect & Exploration

Vol. XVIII, No. 1-12 (Jan. 2020 – Dec. 2020)

壹、時評

一、兩岸關係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 版	頁
				年 月	

2019 年兩岸關係回顧與展望	吳 漢	18	卷 1 期	10901	8
2020 年中共對臺工作會議與兩岸情勢觀察	郭 瑞 華	18	卷 2 期	10902	15
我二合一選舉對未來臺美「中」關係的影響與觀察	黎 寶 文	18	卷 2 期	10902	31
COVID-19（武漢肺炎）對兩岸關係影響評析	劉 燈 鐘	18	卷 3 期	10903	18
近期臺梵「中」關係評析	劉 國 興	18	卷 4 期	10904	1
中國大陸暫停學生來臺就讀之影響評析	曾 于 繁	18	卷 5 期	10905	24
亂中是否能求穩？520 後的兩岸關係展望	王 韻	18	卷 6 期	10906	32
美「中」中東地緣政治競爭牽動兩岸關係發展評析	陳 能 鏡	18	卷 7 期	10907	31
美國衛生部長訪臺的政治意義與外溢效果	張 宇 韶	18	卷 9 期	10909	20
第 12 屆「海峽論壇」之評析	王 智 盛	18	卷 10 期	10910	9
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訪臺意涵研析	陳 亮 智	18	卷 10 期	10910	16

二、國際關係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 版	頁
				年 月	

從北約 70 週年峰會聲明看中國大陸在歐洲的影響力擴張	鄭 家 慶	18	卷 1 期	10901	29
2020 年日韓「中」三國的合作前景	柯 玉 枝	18	卷 2 期	10902	23
近期美國友臺法案對臺美「中」關係之影響	蔡 東 杰	18	卷 4 期	10904	9
美國限制中國大陸官媒在美員工的分析	賴 祥 蔚	18	卷 4 期	10904	17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對中國大陸外交關係影響與	孫 國 祥	18	卷 6 期	10906	16

回應

北韓「金與正」的變臉：朝鮮半島和平情勢將不再？	楊 鈞	池	18 卷 7 期	10907	9
2020 年歐「中」峰會與雙邊戰略互動	楊 三	億	18 卷 8 期	10908	1
俄「中」兩國競合構建的中亞與阿富汗區域安全關係	侍 建	宇	18 卷 8 期	10908	32
美「中」近期爭端：美國限制中國大陸孔子學院發展之研 析	李 佩	珊	18 卷 9 期	10909	1
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出訪歐洲評析	林 泰	和	18 卷 10 期	10910	1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的美「中」新局	黎 寶	文	18 卷 12 期	10912	24

三、政 治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版 年 月 頁

從 COVID-19（武漢肺炎）事件看中國大陸的訊息管控	張 裕	亮	18 卷 3 期	10903	9
從 COVID-19（武漢肺炎）事件看中國大陸的治理	宋 嘉	瑄	18 卷 3 期	10903	25
	蔡 文	軒			
從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看中國大陸的「大外宣」 走向崩壞之途	顏 建	發	18 卷 5 期	10905	10
2020 年中國大陸「兩會」評析	張 執	中	18 卷 6 期	10906	26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面臨接二連三的挑戰	郭 武	平	18 卷 7 期	10907	1
美國川普政府的香港政策	董 立	文	18 卷 8 期	10908	14
中共 19 屆 5 中全會評析	郭 瑞	華	18 卷 11 期	10911	1
習近平深圳講話評析	陳 華	昇	18 卷 11 期	10911	23
中共治港新策略：貫徹「底線思維」評析	張 五	岳	18 卷 12 期	10912	8

四、法律與法制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版 年 月 頁

中國大陸通過《港版國安法》影響評析	張 仕	賢	18 卷 7 期	10907	16
	蕭 睿	圜			
中國大陸《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意 涵研析	吳 明	澤	18 卷 10 期	10910	22
中共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評析	蔡 文	軒	18 卷 11 期	10911	9
中國大陸《海警法》草案及《國防法》修訂對兩岸及區域 安全之影響	沈 明	室	18 卷 12 期	10911	16

五、財 經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版 年 月 頁

2019 年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評析	李 志	強	18 卷 1 期	10901	1
由歐美防堵措施看陸企境外投資之發展與限制	溫 芳	宜	18 卷 1 期	10901	23
武漢肺炎對在中國大陸臺商之影響	陳 建	甫	18 卷 2 期	10902	8

COVID-19（武漢肺炎）對中國大陸經濟影響評析	王國臣	18 卷 3 期	10903	36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對日本政經情勢的影響	林賢參	18 卷 4 期	10904	23
COVID-19（武漢肺炎）對兩岸與全球供應鏈影響分析	謝承評	18 卷 4 期	10904	30
數位人民幣開啟數位貨幣暨電子支付金融之影響	聶建中	18 卷 5 期	10905	1
暴風雨前的寧靜，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下的中國大陸金融	陳鴻達	18 卷 5 期	10905	32
中國大陸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策略與發展隱憂	吳若璋	18 卷 7 期	10907	23
從中國大陸上半年度經濟數據看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李志強	18 卷 8 期	10908	8
近期中國大陸「穩就業」政策評析	王國臣	18 卷 8 期	10908	20
日本企業移出中國大陸生產事件之評析	張弘遠	18 卷 9 期	10909	7
臺灣如何因應亞洲 15 國成員組成的 RCEP：兼論未來可能變化的情景	林若雩	18 卷 12 期	10912	1

六、社會文化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版年月	頁
中國大陸設立「再教育營」的新疆治理策略與國際反應	侍建宇	18 卷 1 期	10901	36			
如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違反了馬克思主義？一對中國大陸大學思想控制工作的評論	歐陽新宜	18 卷 2 期	10902	1			
從 COVID-19（武漢肺炎）事件看中國大陸防疫體制	王任賢	18 卷 3 期	10903	31			
近期中國大陸糧食安全與物價問題觀察	溫芳宜	18 卷 9 期	10909	14			
近期中國大陸民族語言教育的爭議探討	劉燈鐘	18 卷 11 期	10911	15			

七、軍事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版年月	頁
共軍與 COVID-19（武漢肺炎）：軍改後後勤動員的挑戰	丁樹範	18 卷 3 期	10903	2			
美「中」近期臺灣周邊軍事較量意圖與影響	沈明室	18 卷 5 期	10905	17			
近期太空制霸競賽共軍長征失事頻仍	鍾堅	18 卷 6 期	10906	1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期间中國大陸南海戰略布局 對印太安全影響	翁明賢	18 卷 6 期	10906	8			
近期共軍軍演的意涵與觀察	林穎佑	18 卷 10 期	10910	29			

貳、專題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版年月	頁
2019 年 APEC 年度重要成果以及年會取消造成的影響	林映均	18 卷 1 期	10901	75			
農糧財團崛起下的中國大陸糧食安全治理	林義鈞	18 卷 2 期	10902	96			
人工智慧與政府治理：以反貪腐工作為例	楊惟任	18 卷 3 期	10903	90			
解讀共軍 2019 年高階將領人事變化	林穎佑	18 卷 5 期	10905	70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衝擊與全球供應鏈重整	高 長	18 卷 6 期	10906	63
東亞戰爭和衝突死傷事件反思：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 2018 年	陳 鴻 瑜	18 卷 7 期	10907	42
中國大陸 5G 行動通訊技術之發展與挑戰	劉 宗 翰	18 卷 8 期	10908	81
從長期民調趨勢看兩岸關係	陳 陸 輝	18 卷 9 期	10909	27
中國大陸在歐洲影響力之變動	鄭 家 慶	18 卷 10 期	10910	104
East Asia's Newly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scendant China and Japan	竹 內 俊 隆	18 卷 11 期	10911	62
中共南海艦隊遠海長航戰略意涵	陳 彥 名	18 卷 11 期	10911	103
2020 年 APEC 年度重要成果及後 2020 願景的影響	林 映 均	18 卷 12 期	10912	32

參、學術論著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版 年月	頁
美國「霸權治理」之實踐：以美「中」南海競爭為例 從辯證法邏輯看中共領導人更替之指導思想一否定觀之揚 棄定律	胡 敏 邱 延	遠 正	18 卷 1 期	10901	45	
中國大陸農村集體產權變遷的政治經濟學探索—兩權分離 與三權分置	劉 衛	邦	18 卷 2 期	10902	73	
「一帶一路」倡議下空間資料基礎建設之研究：從經濟治 略視角分析	歐 陽	城	18 卷 3 期	10903	45	
跨越族群邊界：探討越南新住民小吃店之文化意義與文化 認同	洪 淑	容	18 卷 5 期	10905	41	
從陳同佳案談我國與香港間之刑事司法互助法制	李 啟	瑞	18 卷 6 期	10906	41	
從兩岸與美國之原產地規則探討我商對美「中」貿易戰之 因應	張 華	維	18 卷 8 期	10908	43	
美「中」科技戰之情境分析與臺灣產業因應策略研究	林 浩	鉅	18 卷 10 期	10910	37	
何 志 峰						
中共 2006 至 2020 年參與聯合國黎巴嫩維和行動之探析 論中國大陸與哈薩克關係之發展：從「絲綢之路」到「光 明之路」	陳 建 貝	宋 嘉 璞	18 卷 10 期	10910	64	
			18 卷 11 期	10911	30	

肆、論壇

篇	名 作	者	卷	期	出版 年月	頁
「轉世」與印度「第 3 次流亡藏人特別大會」略述	蘇 嘉 宏	18 卷 1 期	10901	86		
香港第 6 屆區議會選舉觀察及政治新情勢研析	蕭 睿 圜	18 卷 1 期	10901	102		
中國大陸推動「宗教中國化」評析	廖 劍 峯	18 卷 4 期	10904	113		

臺商在中國大陸受《外商投資法》、《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施行及《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修正之影響	莊國鼎	18卷5期	10905	94
蓬佩奧「全國州長協會」演講析論中共對美統戰工作	賴顥任	18卷6期	10906	80
爭奪貨幣霸權？中國大陸利用「區塊鏈」打造數位貨幣	楊宗新	18卷6期	10906	90
India-China Relations: A Shaky Road Ahead	Hasija Namrata	18卷7期	10907	72
中國大陸招攬臺灣人才趨勢評析	劉暉華	18卷7期	10907	91
中國大陸實施《社區矯正法》評析	莊國鼎	18卷8期	10908	99
Contesting for Supremacy in the Asia-Pacific in the Time of COVID-19: How the Pandemic May Have Already Unravelled China's Long-term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	James Char	18卷9期	10909	132
九二共識的深化與轉型	高孔廉	18卷10期	10910	126
美國印鈔，解了中國大陸資金的渴	鄧岱賢			
	陳鴻達	18卷12期	10912	124

伍、其他

「2020年選後兩岸關係走向」學術研討會

政黨起落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胡祖慶	18卷4期	10904	40
2020年大選與兩岸關係之變化	沈有忠	18卷4期	10904	44
從2020年大選看藍綠基本板塊的移動與兩黨在選舉策略的思考	劉兆隆	18卷4期	10904	52
中共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發展的續與變	唐永瑞	18卷4期	10904	63
與談稿	楊三億	18卷4期	10904	76
冷和僵持的兩岸關係：以蔡總統時期為例	蔡榮祥	18卷4期	10904	81
選後兩岸與亞太關係的新契機	林子立	18卷4期	10904	92
當前國家安全相關法規對選後兩岸關係之影響：以《反滲透法》為例	蔡維心	18卷4期	10904	100
與談稿	趙文志	18卷4期	10904	108

「新冠疫情下中國大陸公共治理」座談會

佛光大學楊校長朝祥 開幕式致詞	楊朝祥	18卷9期	10909	57
展望與探索月刊呂發行人文忠 開幕式致詞	呂文忠	18卷9期	10909	59
新冠疫情下中國大陸地方治理變異：以大理徵用重慶口罩為例	柳金財	18卷9期	10909	61
中國大陸疫情防控與維穩：融媒體之功能與作用	曾于蓁	18卷9期	10909	76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國大陸「大外宣」-透過社群媒體「推特（Twitter）」操作策略分析	趙成儀	18卷9期	10909	86
中國大陸SARS與新冠病毒防疫比較：人事安排與調整的觀點	陳鴻章	18卷9期	10909	98
宋秉仁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國大陸「穩外資」政策評析	張淳美	18卷9期	10909	115
展望與探索月刊黃副發行人義村 閉幕式致詞	黃義村	18卷9期	10909	130

「兩岸外交競逐：現狀、機會、挑戰」 學術研討會

開幕式致詞	呂 文 忠	18卷12期	10912	51
兩岸關係4.0時代及其挑戰	蔡 東 杰	18卷12期	10912	53
各自表述與各自不表述的ECFA	廖 舜 右	18卷12期	10912	58
從軟實力變銳實力？論孔子學院在「中國」崛起中的 角色	沈 有 忠	18卷12期	10912	67
中國大陸海權發展下的兩岸太平洋外交競逐	楊 宗 新	18卷12期	10912	76
「一國兩制」與國際互動異變	劉 文 斌	18卷12期	10912	86
港版國安法和香港的一國「兩治」	張 峻 豪	18卷12期	10912	90
美「中」外交競逐：論《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與美 國人權制裁法案的影響	周 映 柔	18卷12期	10912	98
兩岸在國際組織互動情形研究：以亞太防制洗錢組織 為例	林 可 凡	18卷12期	10912	110